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43

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71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8印张 160千字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500册

---

ISBN 7-80023-458-4/K·447

定 价：3.50元

# 目 录

## 文 献

张闻天文电三篇..... ( 1 )

## 回 忆 录

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 赛福鼎·艾则孜 ( 6 )

## 人 物 介 绍

毛主席谈方志敏 ..... 汪东兴 ( 24 )

周恩来在山西前线 ..... 穆 欣 ( 29 )

博古传略 ..... 陈 夕 ( 62 )

## 专 题 资 料

一、二战时期的河北农民运动 ..... 俞 悦 ( 99 )

赤石暴动始末 ..... 林 强 ( 116 )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 ..... 夏振铎 ( 125 )

张闻天在东北的知识分子工作 ..... 施松寒 ( 154 )

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商谈对华经济援助

- 问题纪事 ..... 陈志凌 (169)
-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 ..... 李福泽 李元正 (193)
- 所谓整理江青“黑材料”的始末 ..... 陈虹 (223)

会议介绍

- 中共中央洛川会议 ..... 王秀鑫 (240)

## 张闻天文电三篇

### 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sup>①</sup>

(1935年10月22日)

(一) 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到达某一苏区，长途行军就是完结了。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应使战斗员了解：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政治部虽已有训令，但战斗员尚不清楚，应作深入解释。

(二) 实行新的任务。如何来看粉碎当前的“围剿”，我只讲一个问题。阿比西尼亚<sup>②</sup> 的战争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

---

①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作报告。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本文就是这篇发言的记录，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 即今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

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政治上的休息情绪可能发生，有的已经发生。应说明我们新的任务，提高部队对巩固、扩大苏区的自信心。

(三) 应加强与组织我们的军力。组织我们部队及二十五、二十六军力量的工作应切实进行。同时应组织游击战争。过去中区<sup>①</sup>游击战争成绩不好。现在陕北游击队很活跃，应加强对这些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在扩大红军时，对有历史意义的游击队不应加以并吞，而应在政治上、武装上加以帮助。

(四) 后方工作。任务是：建立、巩固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党的建立亦应包括在内。关于这里的土地关系，现在尚不清楚。不出租田的地主亦有，应深入研究。

(五) 白区工作。白区工作配合不好亦是过去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之一。当前如何使反帝斗争以及水灾造成的白区群众运动与红军保卫苏区相配合，是一个很大的任务。

(六) 打通国际路线<sup>②</sup>。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为取得政治帮助，要与之发生直接联系。在最近派一位同志去是可以的，但只靠一个同志去不够。在红军苏区扩大的环境下与之直接联系是完全需要的。特别是现在世

---

① 中区，即中央苏区。

② 指打通我党我军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通路。

界形势剧变，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但要取得国际的政治帮助，而且还要取得技术帮助。

(七) 红军的名义与组织应与二十五、二十六军同志商定以后决定，此事委托常委来做。

### 为建议优待被俘东北军军官

#### 致毛泽东电<sup>①</sup>

(1935年11月26日)

毛主席：

(一) 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

(二) 同高桂滋<sup>②</sup> 谈判已〔有〕初步成绩。协定草约已由双方代表同意后送上级批准。

(三) 今日有一封信转送给你，还有一同志派往。

洛甫

二十六日

---

① 1935年11月上旬，张闻天率领党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即同当时在前线的毛泽东不断有电报和书信往来。这份电报是其中的一件。

② 高桂滋（1891—1959），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驻陕西绥德地区。1949年拒绝去台湾。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 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sup>①</sup>

(1935年12月29日)

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sup>②</sup>。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这项工作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工作，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他去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目前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了北平之外，还要加强对热河、满洲的领导。在游击战争方面，直南<sup>③</sup>与豫晋游击队要向西发展，与我们东进<sup>④</sup>取得联系。

去了之后要大胆的运用党的策略，同时还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如城市不能

---

① 瓦空堡会议后，党中央为贯彻新的策略路线，进行了一系列具体部署。本文是会议结束不久在一次专门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上张闻天讲话的记录。原标题即为“北方局工作”，现标题是编者另拟的。

② 北方局当时主要负责人是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章3人。

③ 指河北省南部。

④ 指红军一方面军即将举行的东征。

站脚，可到乡村或游击队中去。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要找出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利用。

因为我对北方情形不熟，难以给以具体的指示。我想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

(张闻天文集组供稿)

## 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赛福鼎·艾则孜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有 16 个年头，但人民没有因时光的消失而冲淡对毛主席的怀念。1990 年冬天，我去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看到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一片生机，除一些边远山区外，人民生活已向小康水平迈进。更使我惊喜的是，这些地方的一些办公室、商店、出租汽车、农民家里，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问起原因，他们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等人的领导，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真诚的感情呀！它使我真正地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越加怀念毛主席，越加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越加珍惜目前的大好时光。

毛主席在自己的一生中，做出了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光辉的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他有 6 位亲人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他的弟弟毛泽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

毛主席的一生，是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战斗不息的

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国各族人民，他呕心沥血操劳了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有了他，中国人民今天才能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16年后的今天，人民仍然以感激的心情思念毛主席，是非常自然的。

从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我和毛主席有过无数次接触。除了向他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之外，我还多次在毛主席家做客，拉家常。每次接触，都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回想起来，40多年来，我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这和毛主席的关心、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每当我回忆起和毛主席相处的时刻，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一阵阵热流在我心中涌动，久久不能平静。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引起我不尽的思念和回忆，现在主要谈谈使我感受最深的几件事。

### (一)

1949年9月，以新疆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各族代表团，应毛主席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途中，不幸飞机遇难牺牲。以后，又应毛主席的邀请，于9月15日，我率领第二个代表团来到北平。

新疆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和苏联共

产党的帮助下，为了在新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而爆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精神 and 毛主席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还听到有关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大量传奇般的传说，早已在我们的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因而，我急切地盼望尽快见到毛主席。

9月17日晚，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中间。演出开始，在阵阵锣鼓声中，只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轻盈地迈着碎步，步入戏台中央。她的出现，引起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她的唱、念、作，是那样的动人、传神，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使我入了迷。这时，陪同我们的一位同志指着戏台上的女子说：“他叫梅兰芳，是个男的。他以善长男扮女装演京戏而出了名。”他的话，更使我惊奇不已。他的介绍和眼前的现实怎么都协调不起来。我半信半疑，谛听着梅兰芳的唱腔和审视他的每一个动作，想找出属于男子的特征，但都是徒劳的。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正在我看不到台上的演出而焦急时，周总理出现在他的身边。对我说：“毛主席看你们来了！”

我定睛细看，只见毛主席面带笑容，慈祥地向我们走来。我急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他说：“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我由于紧张、激动而又兴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谢谢！”

在毛主席身边又出现了一位笑容可掬的人，把手向我伸过来：“欢迎你们！”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总理热情和蔼的态度使我无比感动。我由于过分激动，除了不断地重复着“谢谢”外，一时未找到比这更好的语言。

毛主席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后对我说：“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告别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周总理一边向我告别，一边说：“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并握着我的手说：“明天见。”说完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走了。

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代表阿里木江看着毛主席他们的身影，呆呆地站在那儿，许久说不出话来。当他反应过来后，深有感触地说：“呀！他就是毛泽东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留学美国，在苏联工作过一段的代表涂治教授用钦佩的口气说：“布尔什维克人都是这么和蔼可亲，心胸宽广的人！”

大家都陷入幸福的遐想之中，却忘记了是在看戏。我的思想情感完全被毛主席吸引着了。我的心在急速地跳动着，久久平静不下来。我想：蒋介石、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对各个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毛主席、共产党不仅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存在，而且给予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同等的权利。我们做为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代表，被特邀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我越想，心情越加激动。

戏演完了，人们往外走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来看戏的，但戏的情节和结局，我什么都说不上来。在返回住处的途中和回到住处以后，大家仍激动地谈论着自己的感受。

夜深了，我还不能入睡，便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一难忘的感受。看看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第二天，周总理谈了昨天晚上毛主席来看望我们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毛主席非常喜欢看京戏。当演出开始，场内的灯熄灭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才入场就座。毛主席问我们是否也来看戏了。周总理告他，我们已经来了。毛主席就起身要来看望我们。周总理提醒说：“不是已安排明天接见吗？”毛主席边走边说：“我知道，先去看看他们。”这时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也跟着过来了。

听了周总理的讲述，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来看我们，这是对新疆各族人民和三区革命的亲切关怀和重视，对我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怎能不使我们感动呢？这更使我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可爱。当然，这一殊荣是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和三区革命的。

9月17日下午3时，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中南海接见厅。早已等候我们的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见到我们来了，便离座肃立，以沉痛的心情，向阿合买提江等死难烈士们致哀。整个接见厅，变得极为庄严、肃

穆。入座后，毛主席悲痛地说：“阿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10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毛主席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如此悲痛，如此真诚。也没有想到，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看作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我更没有想到，对三区革命给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部分”。听到这些，我内心的感激之情由衷而生，激动的泪水如泉涌。这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

毛主席的话，使我这颗既感激又激动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下来。我不断用毛主席的话告慰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所有在三区革命中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们，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是光荣的。你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请你们安息吧。我急于想返回新疆，向三区人民和全疆各族人民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对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哀悼之情和对三区革命高度公正的评价。以此来鼓舞教育各族人民，使他们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由于长期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早在三区革命时期，我就渴望做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因为无法与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而且在新疆没有党的组织，我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如愿。这次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第一次接触后，我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心情更加迫切了。10月23日，我正式向毛主席呈递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毛主席看后很高兴，立即建议批准吸收我为正式共产党员。并批示彭德怀同志待新疆分局成立后再办理组织手续。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毛主席是我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 (二)

1950年，毛主席在一次接见王震同志和我谈新疆的工作时，对王震同志说：“在新疆的任务是要为各族人民服务。”毛主席不仅指示王震同志这样做，而且从他的讲话、文章中，和我接触、谈话中，经常指示要注意加速发展新疆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可见毛主席是如何为新疆各族人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了。

1950年夏，我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会址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闭幕后，不少外地来的同志都去和毛主席握手告别。我也想去和毛主席告别，听听他对新疆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我看毛主席一边往外走，一边和人们握手告别，其间他不停地左顾右盼，好象在寻找什么人。

见此情景，我不敢去打搅他了。就在这这时，他发现了，径直向我走来，我也急忙迎上前去。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问：“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明天就回去。不知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说：“没有什么，我们谈谈吧！”毛主席边说边往外走，我在后相随。没想到，毛主席一直将我领到他的家里。一进院门，江青迎了出来。

毛主席将我和江青互相作介绍，然后问江青：“饭好了吗？”江青说：“都已摆好了，可以吃了。”毛主席接着说：“把现在的菜都撤下去，准备清真菜，请赛福鼎同志一起吃饭。”江青面有难色，欲言又止。

毛主席为了尊重我的生活习惯，把做好的饭菜全都撤下，并重新为我做清真菜，这使我既感动，又不安。我一再表示谢意，提出回饭店吃饭。但毛主席并未考虑我的话。他说：“这好办。你给北京饭店打电话，请派位回族厨师，带上牛羊肉过来做。”

毛主席这热情又真诚的款待，使我过意不去。我对毛主席说：“主席，你今天太累了。不用管我了，你休息吧。”“随便聊聊，这也是一种休息的好办法。”毛主席点燃了一支烟，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新疆是块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宝地。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它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自己强大的汗国，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曾多次派远征军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现在北大任教的翦伯赞就是你们维吾尔人，他是湖南桃源人，但

祖籍是新疆，是明朝年间受朝廷之命平息武陵叛乱后，定居在湖南的维吾尔人的后裔。你可到湖南看看那里的维吾尔人。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的习俗、服饰、语言中，仍可找到维吾尔民族的特征。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人民突出的美德。其它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毛主席讲到这里心情显得沉重地说：“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和国民党，还有一个盛世才，长期以来，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族人民处在悲惨的境地。”接着他充满信心地说：“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

毛主席的话，使我既惊奇，又激动，更使我钦佩。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新疆的历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那樣的熟悉和了解；使我激动的是，他根据大量史实，讲了许多赞扬维吾尔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话，使我增添了做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使我钦佩的是，他把新疆各族人民看作是骨肉同胞，看作是自己的父老兄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情怀。他那一颗金子般的爱心比海洋都宽阔，这怎么不使人钦佩呢？

工作人员进屋报告：“可以开饭了！”我们同桌用饭的除了毛主席、江青、我、尹善同志外，还有毛岸英、毛岸青、毛远新，还有一位毛主席亲属的孩子。“这是赛福鼎·

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一开始，毛主席就将我介绍给孩子们，并指着毛岸英对我说：“他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用俄语和他对话，询问他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和他对苏联的印象等等。我们对话时，毛主席注意听着，显出满意的神色，并问：“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我满意地说：“完全及格，讲的流利而标准，而且充满了俄罗斯人的性格。”但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毛岸英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对毛岸英说：“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说完，毛主席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对毛岸英说：“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首先你要学会维吾尔语言、文字。”

“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的心象哈蜜瓜一样的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主席和我的一席话，在毛岸英心中激起巨大波澜。他急切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我想要给他肯定的答复，但又不知毛主席是否已下决心。所以我用祈望的眼神看看毛主席，希望他能给以启示。毛主席有所安排似地说：“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说完，毛主席的视线移向毛远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显得有些悲哀地说：“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我对毛远新说：“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

为了改变一下气氛，毛主席问毛岸英：“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象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毛岸英考虑了片刻，用没有把握的口气回答：“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毛主席又问毛远新：“你说呢？”毛远新眨了眨眼睛，想了想，摇摇头，表示答不上。毛主席说：“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哈密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16%，最高可达20%。赛福鼎同志，我讲得对吗？”“对！对！”我急忙用佩服的口气说。这天在毛主席家里，我既是客人，又是学生。毛主席给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课。而且这一课是在非常轻松的谈话中进行的。除此外，我还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是全国各族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平时对孩子们要求很严。为了防止孩子们产生优越感，脱离群众，他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们上学，尽量让孩子们住校和同学在一起生活，树立集体观念。孩子们回家时，一般不让孩子和自己同桌吃饭，而让孩子们去食堂和工作人员一起吃。这天他特意让毛岸英等人与我们同桌吃饭，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气氛，也是为了让我和孩子们互相认识。我完全没有想到，毛主席竟把和孩子们一起吃饭，这样极平常的事，同培养教育革命接班人联系在一起，可见毛主席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和革命。实际上，毛主席这样做，也是对孩子们最大的疼爱。

### (三)

1950年我们访苏期间，苏方告我，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尸体已找到，做好了装运处理，拟移交我方。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请示他们怎么处理。毛主席指示说：“将烈士们的尸体运回新疆安葬。让新疆各族人民不要忘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英雄们。”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要求苏方帮助将烈士遗体运回新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将他们安葬在三区革命的摇篮——伊宁市。依照家属和群众的要求，达列力汗的遗体葬在他的家乡（阿勒太市）。自那以后，到伊宁市视察工作的朱德、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烈士陵园向烈士墓默哀致意。正如毛主席所讲的，新疆各族人民没有忘记

为了他们而献出了生命的烈士。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经常去烈士陵园扫墓，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以表达对烈士们的怀念之情。烈士陵园已成为对各族人民，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1957年，我参加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9周年庆祝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活动结束后准备回国之前，毛主席问我：“你打算从北京回新疆，还是从这儿直接回新疆？”我回答说：“我打算从这儿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毛主席说：“也好。俄罗斯人过去压迫过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给了这些少数民族人民一些什么？我们汉族反动统治者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一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新疆。”毛主席指示我学习苏联的好经验，尽快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毛主席多次指示我们说：“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新疆和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接壤。新疆有的民族，在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也有，因此关系比较密切，互相往来会亲访友的比较多，但双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那时新疆的各族人民是以羡慕的眼光看待和谈论苏联中亚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的。针对这一点，毛主席具体指示我们：“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

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毛主席不仅明确指示了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且教给了我们达到目标的办法。这就是在新疆要反对和克服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要加强民族团结，为此，关键是要加强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毛主席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1959年，一次毛主席听完王恩茂同志和我关于新疆工作的汇报后，再次指示我们说：“在新疆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为此，首先要搞好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里的关键是要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为了这三个“搞好”，毛主席进一步具体地说：“你（指王）要做好汉族干部的工作；你（指我）要做好民族干部的工作。”真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

在新疆，我们努力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使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与此同时，在一些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和官僚主义作风，以致发生了拜城饿死人和边民外逃事件。这些情况引起了毛主席极大的关注。1963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决定派罗瑞卿、谢富治去新疆检查工作。他们在新疆各地视察了一两个月。不久，我到北京参加人代会。一天，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见到了毛主席。他说：“罗瑞卿和谢富治专程到上海向我汇报了新疆的工作。你们工作有成绩，也



有缺点……”说到这儿毛主席稍微考虑了一下继续说：“汉族干部要谨慎，民族干部要畅所欲言。”毛主席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新疆当时的情况，指出了要害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但毛主席仅仅说是个“缺点”，这包含着对下级干部的爱护和体谅。他只是把问题点出来，让我们自己去认识思考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作风。

#### (四)

由于有毛主席掌舵，新疆这条航船躲过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暗礁”，顺利地向着彼岸航行。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新疆各族人民，他将一颗伟大的爱心无私地奉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能有如此伟大的情怀。由于毛主席的关心、爱护和领导，正如他所希望的，新疆的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各族人民更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共产党使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所以他们用一切美好的语言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在新疆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让天下的森林都变成笔，  
让天下的海洋都变成墨，  
让天下的人都变成诗人，  
也写不完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

由一个农奴变成国家主人的库尔班吐鲁木，日夜思念恩人毛主席。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特意精心培育了两个大甜瓜，不畏路途遥远，骑上小毛驴，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献上甜瓜，表达维吾尔人民的心意。这是多么感人的行动，完全是维吾尔族人民纯朴感情的表露，是对毛主席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回报。

毛主席曾多次表示想去新疆，亲眼看看新疆发生的变化，看看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一次他还风趣地对我说：“我还要去王母娘娘洗过脚的天池洗个澡呢！”

各族人民也都盼望毛主席能来新疆看看他们的生活，多么希望毛主席去他们家做客，用自己最美好的食品招待毛主席。但是毛主席终因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新疆之行一推再推，未能如愿以偿就离开了我们，这成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憾事。

每当我回忆起在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和毛主席相处的时刻，他对我的关怀，对我的谆谆教诲，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都使我的心情激动不已，他的音容笑貌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的形象，是永远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的。在毛主席诞辰 97 周年的那天，我怀着无限思念和无限崇敬的心情去毛主席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当我缓步走到毛主席的遗体前，见到毛主席安详地仰卧在翠柏和鲜花丛中时，往事便闪电般地映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眼湿润了，深深地向毛主席鞠了一躬……同时，我见到广大群众，其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个体经营

者……他们也排着队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情景，使我得到极大的慰藉。

回到住所，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提起笔来，将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写成了一首诗，以寄托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念：

我以敬仰的心情  
默立在毛主席遗体前。  
我的心充满了  
对毛主席无限尊敬和  
无限思念之情。  
我在沉思，我在默念：  
啊，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你安息吧！  
你战斗不息的勇敢精神，  
你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将世世代代铭记人民心中。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一心声，  
发自陕北农民心底深处，  
反映了  
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深厚感情。  
这一响彻中国大地的歌谣，

一直在激励人民继续战斗。  
我仰望碧蓝的天空，  
见到空中高悬着  
用火红的大字组成的语句：  
啊，毛泽东！  
你仍活在人民心中。  
你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垂不朽！  
你是马克思的忠实学生！  
你是中国伟大的列宁！  
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从这些灼热的文字  
迸发出闪闪星光射向了九霄。

## 毛主席谈方志敏

汪东兴

毛主席对人民英雄、爱国志士、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和为正义、为真理、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徐有功传》时，对徐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为法而献身的精神甚为赞赏。在批注中赞扬徐有功的同时，说，方志敏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方志敏出生于1899年，是江西弋阳县人。他年轻时投身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入党。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发动弋阳、横峰两县举行暴动。纵横百里，红旗漫卷。1928年在赣东北建立第一支工农正规武装，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在中华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大会对他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功绩，授予勋章一枚。1932年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连成一片，改建为闽浙赣省，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这年的11月，他率红七军团和红

十军合编的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翌年1月，陷于10倍于己的敌人重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俘。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

毛主席一直很怀念方志敏同志。

1953年4月，毛主席去浙江省视察工作。一天，毛主席应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负责同志的邀请和安排，由杭州乘汽车到莫干山。

莫干山位于浙江德清县城西北13公里。这天天气很好。车到半山腰毛主席就下车了，边走边沿途观赏莫干山景色。莫干山周长50余公里，主峰塔山绿荫环绕。登山四望，群峰罗列叠翠，太湖碧水漪涟，壮丽山河，尽收眼底。毛主席兴致勃勃，漫步走到住地。

午饭后，我陪毛主席散步。他边走边指着西南方向对我说：“爬到山顶，向前看就是你们江西弋阳县了。”他沉思地说：“弋阳县出了一个人民英雄方志敏。他曾率领抗日先遣队打到皖南、浙西，震动了上海、南京的敌人，掩护了主力红军长征。”

毛主席边走边说：“方志敏同志是主张依靠赣东北苏区做根据地，稳步前进的。但曾洪易却要部队远离根据地<sup>①</sup>，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使一部分红军遭到失败。”毛主席一再强调依靠人民、稳步前进的重要性。

---

<sup>①</sup> 曾洪易在赣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主要推行“左”的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未查到他带领红军远离革命根据地问题。在他来根据地之前，有红军远离根据地之事，但不是曾洪易搞的。

曾洪易曾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1931年7月到赣东北苏区，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方志敏的正确领导，给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1933年12月，闽浙赣省委对曾洪易的错误开展了批评。1934年冬，曾洪易逃离苏区，后叛变投敌。

毛主席回忆到方志敏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时说：“方志敏同志本来已带领部分部队冲过封锁线，可以突出包围，但考虑到他是先遣队主要负责人，为了救援别人，等待后面的大部队，才被敌人重重包围的。虽几经浴血奋战，但被敌人打散而不幸被俘。”毛主席讲到这里，停留了片刻。然后，他难过地说：“方志敏同志被押到南昌后壮烈牺牲了。”

毛主席对方志敏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极为赞扬。毛主席说：“方志敏同志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受尽了折磨和残酷的迫害。他不怕死，不考虑个人的命运，而是很镇静地对付敌人，一心一意想着党，想着人民，想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党、为人民应尽的责任。”毛主席看看云雾飘绕的山峰，又眺望远处长平波如镜的太湖，深情地说：“方志敏同志在敌人的监牢里写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等著作。这些著作是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是不朽的佳作。”在讲到方志敏同志牺牲才36岁时，毛主席叹了一口气，带着惋惜和称颂的口气说：“方志敏同志是个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烈士。他

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毛主席讲完后，怀着对方志敏深深的思念返回住所休息。

1956年5月，我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井冈山上，他和几位同志谈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历时，又提到方志敏同志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主席说：“方志敏同志是位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他领导的苏区，由于路线、方针对头，广大群众拥护他，赣东北苏区很快扩大成闽浙赣皖苏区，红军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了。”毛主席还说，他自己过去对赣东北的工作有过表彰。

那是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除了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闽浙赣苏区的财政经济政策外，还在大会所作的结论中，称赞“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毛主席说：“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去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sup>①</sup>这是毛主席对方志敏和赣东北苏区工作的高度评价。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4页，《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主席曾多次对我谈及方志敏同志。现在我根据回忆将上述两次谈及的内容写出来，以纪念方志敏英勇就义 57 周年。

# 周恩来在山西前线

穆欣

## (一)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八一三”日本侵略者又大举进攻上海，全国掀起了抗战高潮。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战场，当时正是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伟大战争中最主要的战场，也是我军战略上最机动的战场。关于山西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周恩来这年9月曾在一份电报中说：“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太行向东越平汉，跨津浦迄达渤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蒙古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鲁、豫，再与山东、华中、华南连结，而成抗日战争的重心。山西群众基础好，人口稠密，物产丰盛，有红军主力，阎与我合作抗日，将可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毛泽东也在这时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

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部署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基本方针。”

自从全面抗战开始，中共中央一直密切注视着山西战场的局势。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周恩来于8月29日到达西安，原来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8月30、31日，毛泽东两次来电说：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关于作战问题，准备在谈判中提出：八路军拟在恒山山脉以涑源、阜平、灵丘三县为中心根据地，东至宛平、涑水、唐县；西到五台、繁峙；南抵孟县、平山；北达阳原、涿鹿的区域布防活动，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9月3日夜晚，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山西，乘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派的一个专列火车离开西安。同行的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等；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他也到太原去。这时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三大战略部队，已开始从陕北渡越黄河，开赴山西前线。专车到达侯马车站的时候，刚从黄河西岸过来的第一一五师第二梯队——师司令部和第三四四旅正停留在那里，聂荣臻等下了火车，率领部队北上。

这个时候，平绥线上的日军已经攻破了南口、张家口，正向晋北地区进犯，企图乘势攻破长城各口，逼取太原。敌人在平汉线上也正积极进攻保定，期与平绥线的敌人相互呼应，进而夺取石家庄，西图井径、娘子关。如果敌计得逞，太原有失，将会影响整个华北的战局。面对长驱直入晋北的日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入晋增援的蒋系中央军，少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大部则是一遇日军便望风而逃，犹如退潮一样溃败下来。阎锡山为了推卸失败责任，平息人民的愤怒，挽回溃退的局势，枪毙了他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但仍然未能压住阵脚，无法阻止山西旧军溃退的局势。那些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会搜刮民脂民膏的旧政府官员，绝大部分也都在敌人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就席卷而逃。人民在遭受日军屠杀的苦难中，还要经受这些溃兵和逃官们的洗劫和伤害。山西大祸临头，阎锡山主观上有了进一步依靠共产党的愿望。尽管他仍然心怀鬼胎，疑虑重重，但是他对于周恩来的到来，也象对于八路军入晋一样，还是表示欢迎的。正如同行的聂荣臻所说：“由于晋北战局吃紧，阎锡山处于不打一仗就不能向山西人民交代，打又没有把握的矛盾中，愿意八路军早点开上去，好给他顶住。所以，在迎接我们的安排上，表现是积极的。”<sup>①</sup>周恩来一行从潼关渡过黄河到达风陵渡的时候，阎锡山派来他的亲信梁化之和专列火车，已在那

---

<sup>①</sup>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册第345页。

里等候。周恩来和梁化之略事寒暄，就乘火车续行。火车开到临汾，停下来住了一夜，于9月5日下午抵达太原。他们受到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和秘书长贾景德等人的迎接。梁化之安排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一行在太原绥靖公署的高级宾馆下榻。这里设备豪华，盛情款待。但周恩来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内部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雪枫那里住吧！”大家表示赞成。第二天，就搬到东坝陵桥成成中学内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彭雪枫）。

当时阎锡山已到晋北代县雁门山麓太和岭口行营，指挥前方战事。9月6日，周恩来等在太原先同赵戴文、贾景德、梁化之谈话。他们对周恩来热情欢迎，但在谈到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时，不能作主，须由阎锡山拍板。周恩来看到“山西一切事无阎作主不能做”，为抢时间同阎锡山会谈，当天晚上就偕同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离开太原，于7日凌晨到达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直接和阎锡山谈判。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周恩来一行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这时身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正在行营，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周恩来首先谈到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对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希望他能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

民众，共同抗战。”关于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部署、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的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八路军拟以太行山脉和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主要依托的恒山山脉地跨山西和河北两省边境。阎锡山在谈判中表示：同意八路军在太行山北端进行游击运动战。凡二战区我管的地方，在前线地区可以按你们所说的办；至于河北等地的事，需要去找刘峙、徐永昌他们谈。双方还商谈了平型关、雁门关防御问题。周恩来提出：拟将第一一五师前出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在平型关翼侧待机歼敌。阎锡山表示同意。这次还曾提出八路军入晋部队的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我军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应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薄彼。阎锡山答应得满干脆。他说，先给你们30门炮、4000发炮弹，我下令由兵站运输给你们。但是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均未落实。

周恩来这时还向阎锡山提出开放民运，发动群众，实现战争的全面动员问题。周恩来说：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要动员广大群众，使得这次抗战真正成为全面的全民的战争。山西已有牺牲救国同盟会等群众团体，更应扩

大做动员工作。如果再不动员民众，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敌人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毫不迟疑地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山西和华北的持久游击战。当时在座的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和续范亭等，都对动员民众问题发表意见，进行了热烈的商谈。

阎锡山听了大家的话，也当场说：我早已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前在南京开会时，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武装民众500万。到现在尚未得到具体指示。在这紧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

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及晋北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其任务是实施战争全面动员及组织游击战争；该会由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晋察绥三省政府、战地各军及牺盟会等群众团体代表共同组成；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派代表公开参加领导；其工作纲领由周恩来主持拟定、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在商谈过程中，阎锡山感到需要发动群众进行抗战，但又不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代表公开参加领导战动总会，表现出明显的疑虑和戒心，迫于当时形势，阎锡山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在商谈中，阎锡山希望八路军在山西省内不更换县长。周恩来表示：八路军在山西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

9月14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八路军在第二战区驻地即成为政权力量，因此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动总会最适宜，这样可使新政权组织逐渐替代旧行政机关。

当时刘峙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徐永昌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均在保定。徐永昌过去长期在山西军政界做事，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他是续范亭的崞县同乡，国民联军时代又曾同在第三军共事，两人是多年的朋友。因此当周恩来决定前往保定时，南汉宸建议请续范亭一同前去。

这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他以第六十一军镇守晋东北的天镇、阳高，屏障大同。赵承绶骑兵军及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王靖国第十九军，都集中在大同附近。傅作义是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当时曾以绥远省主席名义电阎锡山请求回绥守土抗战，阎却令其守护山西。阎锡山对他吃不透，不放心，希望周恩来等去见见傅作义，疏通关系，与晋军共同准备大同会战。周恩来原就准备同傅作义商谈，当即表示同意。9月8日，在同阎锡山的谈判告一段落时，周恩来一行由续范亭陪同前往大同、雁门关地区勘察，在大同见到傅作义。傅作义负责守大同，他的部队在雁门关以南，他自己没有作战的信心。雁门关的地形很好，但是修的国防工事不能打仗：有炮掩体，没有道路，炮运不上去；都是在城墙上挖了三层射孔，没有遮避。看来雁门关是守不住的。以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这次大同之行时说：“当晚我们即赶到大同，与傅作义谈



了两三个钟头。他给我的印象，忠厚，谦虚，友好，对我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因国民党害怕发动群众抗日，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一定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与正规军共同作战。周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当晚，我们返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即回太原。”<sup>①</sup>

周恩来和彭德怀9月9日回到太原。当天电告朱德、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关于雁北13县发动群众的工作，阎锡山答应同八路军合作。同时，根据这次在行营协商结果，领导起草战动总会《工作纲领》。《工作纲领》的核心内容是：一、积极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二、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等。还提出，战动总会应由各省政府代表、各地军队代表以及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县区一级动委会应有县政府、区公所的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中应有民众选举的过半数代表参加。

这时，他曾多次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北方局委员交谈，确定参加政权的原则。并且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中心，同时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在河北南部、山东南部以及山西应以武

---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77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为最急，“以吕梁山脉为后路”。<sup>①</sup>

9月13日，周恩来派南汉宸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向阎指出时局的危机，建议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脉；不应死守雁门关，宜实行出击，以侧击和抗击的方式作战。同时建议：应扩大战动总会为晋、绥、察三省战区动员委员会，中心应放在雁门关以内，不应再事迟疑；立即开始建立政治工作，改造部队，特别是依靠国民兵军官训练团9000人为干部，组织新的部队。并向阎锡山提交战动总会《工作纲领》。阎锡山亲自对《工作纲领》作了几点修改，批准了这个纲领。同日，周恩来、彭德怀将同阎锡山谈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洛甫，提出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依傍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情况，可依山西向南发展。“阎欢迎我们派队伍到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并说拟由聂荣臻或邓小平代表八路军方面主持战动总会的工作，请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成立政府组织等。

9月16日至19日，周恩来和彭德怀、续范亭到河北省保定、石家庄，会见国民党在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刘峙、徐永昌、程潜、冯治安等人，商谈八路军准备入河北境内作战的有关事宜。他们到达保定后，即与徐永昌、刘峙等商谈八路军依恒山山脉展开活动问题。徐、刘都表示同意。其

---

<sup>①</sup> 见1937年9月14日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电。

时日军正向保定逼近，保定秩序很乱。徐永昌请周恩来等吃饭，敌机来了，有人就在他们吃饭的地方周围打信号弹。接着，他们又经石家庄到娘子关勘察，随后返回太原。此行所得的印象是：徐永昌、刘峙也和傅作义一样，对抗日信心不足，兵力部署松散，河北军队主力布防在石家庄以南地区；傅作义主力远离大同，都在雁门关内外；雁门关、娘子关的国防工事都不坚固，看来石家庄、太原难保。

他们于9月19日回到太原。这个时候，同阎锡山几经磋商，组建战动总会的有关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对于安排委员会的各个职位问题，双方也曾经多次协商才定下来。阎锡山当然不会同意共产党人担任常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也不会同意由阎锡山随便安排一个旧官僚来担任这个职位。因此，周恩来建议由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续范亭担任这个职务。他是全国闻名的爱国将领，在第二战区任高级参议，这时已是共产党的诚挚的朋友，确是理想的人选。阎锡山对于这一提议不好反对，尽管非常勉强。在讨论安排各部部长职位时，阎锡山想派他的亲信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对此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说，到战区和敌后主要是打游击的，你们的人员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应由八路军方面人员担任。阎锡山难以提出不同意见，便确定由程子华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关于战动总会活动范围，根据同阎锡山达成的协议，最初以雁门关长城内外18县、察南5县、绥远全省为战动总会管辖地域和活动范围（以后又将辖区扩展到绥远、察哈尔全省，山西另增12县，

总计达 69 个县)。

9 月 20 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派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领导战动总会。这一天，在山西大学礼堂召开了山西各界参加的群众性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做报告，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周恩来语音高亢，声音清晰，精神焕发，一连讲了两三个钟头。他就当前政治军事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各方面必须努力奋斗的一些问题，并对战动总会的成立，给予有力的支持。那些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听了这个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的报告之后，不得不惊奇地说：“共产党真不简单，没有讲稿，却能讲得如此生动深刻，头头是道，佩服！佩服！”

同日，周恩来、胡服（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报毛泽东、洛甫，就山西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提出我们的方针：一、向阎锡山提出彻底工作办法，在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均以统一战线的政策打破其公开对立的阴谋，并纠正我们包办一切与不发动群众的倾向。二、我们要以左派出现，来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不论战动总会，动员实施会、牺盟会、教导团中，我们党员除八路军外，应尽量用左派面目团结左派，发展左派，以树立山西及阎的左派力量，便利统一战线发展。三、动员工作，我们要避名取实，尽可能地发动群众，推动左派、教导团、牺盟会及好的县长、特派员出头来，以便于

改革县政并领导筹款。其后，周恩来又和杨尚昆于10月18日致电朱、彭等并报毛泽东：请注意支持与发展晋军中的左派力量，凡八路军驻地及其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无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应积极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有时用他们的名义帮助其发展，如此方能推动阎锡山的进步。

9月21日，朱德和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第二天，周恩来又偕同朱德前去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这时大同已于9月13日失陷，日军主力正由冀晋边境的天镇、广灵向平型关扑来，以抄击雁门关后方。由于晋北前线与平汉前线战局的迅速恶化，9月上旬曾同阎锡山商谈过的、原先决定八路军主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正如毛泽东在9月17日打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首长的一份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这份电报提出了新的部署计划。

根据山西战场的形势变化和毛泽东提出的新部署计划，周恩来和阎锡山重新商谈了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的部署问题，并且取得了阎锡山的同意。

谈判开始时，阎锡山有意要八路军打正面。让八路军正面堵击日军，既打击了日军的进攻，又消耗了八路军的兵力，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对于国民党方面想把我军推到

前线正面，借日军的手来消灭异己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经预料到了。周恩来听见阎锡山这样讲，当即严肃地指出：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因此，我们不能，而且不赞成打正面，只能在敌后侧协同游击。我军有着长期进行运动战的素养，将要发挥这方面的特长来协同友军，发动群众。我军主要的活动地区在敌后，我们要深入敌后，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夺取敌人辎重弹药，使它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配合友军作战，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朱德说，当然，在有利条件下，我们也同意我军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

阎锡山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一阵又说，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贵我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挡住敌人。

周恩来说，是的。我一一五师现已赶到灵丘一带，准备于侧翼待机歼敌，配合友军防守平型关一线；至于我一二〇师，是否开到晋西北地区，向进攻雁门关之敌的后方出击，配合友军防守雁门关？

阎锡山点头答道：就依周先生意见，请将部队迅速开进预定地区。雁门关方面的具体事宜可与杨爱源联系（杨

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当时负责指挥晋北战事)。

这次会商至此结束。9月23日，周恩来返回太原，朱德则于同日抵达五台县南茹村总部指挥作战。9月25日，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一带设伏，经一天激战，歼灭由灵丘西犯的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身处第一线、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对平型关战役的策划和发动起着重要作用。战前，他和朱德同阎锡山研究平型关战役的计划。这次同阎锡山会商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于23日向一一五师下达侧击进犯平型关日军的作战命令。24日，周恩来电告洛甫、毛泽东：八路军主力在灵（丘）、广（灵）待机，宋时轮支队出东北游击。25日，平型关战役就打响了。平型关大捷对于抗战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平型关大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从它身上看到了民族希望的所在。

周恩来每次会见阎锡山的时候，都与阎锡山进行长谈，向他分析战争形势特点及可能的发展趋势，说明我党中央对于各种重大问题的观点、方针，以及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等等。这时由于山西战局更加危殆，在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中间笼罩着悲观失望情绪。阎锡山原就怯懦成性，临敌惊慌，此刻在思想上也充满了失败情绪。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这次会商时又同阎锡山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向他

分析形势，说明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尽管暂时还是敌强我弱，只要坚持抗战，必然是敌人逐渐地败弱下去，我们会天天强大起来。

经过几次谈判，周恩来的谈吐、作风，都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私下里，他对周恩来的政治家风度和伟大人格，对周恩来过人的才智和惊人的精力，无不表示钦佩。初次见面以后，阎锡山就在他的亲信面前说过：“我最近见了周恩来，这个人很聪明，很灵活。”

9月7日，第一次谈判时，阎锡山曾要求周恩来给他写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很快就把这个计划写好了。阎锡山看了非常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感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其后，有一次阎锡山还当众说过：“要是我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个把式就好了，可惜我们没有。”<sup>①</sup>周恩来还向阎锡山介绍了八路军的作战方法，阎锡山很佩服，曾通令晋绥军各部向八路军学习战法。

周恩来跟阎锡山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成功，使得八路军在战局危急的时刻，能够顺利地开赴华北前线，迅速地扭转了山西前线以至整个华北战场的战争局面。

这时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进山西战场，许多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汇集到太原。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这里除了同阎锡山进行谈判，跟开进山西战场

---

<sup>①</sup>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80页，三联书店出版。



的国民党各派军事将领周旋；他还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整个战略部署，指导八路军三大战略部队展开，指导山西和整个华北的抗战工作；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一再指示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此期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主力相继进入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北、以管涔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以太行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南，开始了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山西的抗战形势，从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 (二)

9月23日，周恩来从行营回到太原的时候，山西的战局更加危殆，悲观失望的情绪正在统治阶级中间广泛蔓延，也在人民群众心灵上投下疑惧的阴影。不久，晋北正面战场全线败退，阎锡山和他的行营也撤回太原。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积极地帮助阎锡山和其他高级将领正视现实，耐心地分析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局势的症结所在，指出片面抗战、消极防御已经无力持久，出路在于开放民运，武装民众，尽快地转向全面抗战。同时帮助他们摆脱失败主义的桎梏，直起腰杆来与八路军一起战斗。周恩来到太和岭口行营的时候，就曾接触过不少晋绥军的高级将领。阎军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就经过续范亭介绍，在那里见过周恩来。他说：

“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sup>①</sup>

在山西同阎锡山相周旋时，周恩来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阎锡山又团结又斗争，诚心支持他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措施，同时批评他对抗战的动摇妥协和危害团结的言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战动总会的各级组织也在晋北各县普遍建立起来。当时一些中共地方组织的急躁情绪仍没有完全克服。有些人只愿单干，不善于团结党外左派和中派人士，不善于和友军、同盟者合作；不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运用战动总会名义开展工作，处处想以八路军面目出现。阎锡山本来对共产党的影响忧心忡忡，担心群众倾向共产党，而进入山西作战的中央军又有倒阎的动作，因此他对战动总会和进步力量逐渐采取消极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10月14日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他认为，从大局看，要推动阎锡山前进。在共产党方面，要以团结反对分裂，以信任反对挑拨，以争取合法反对取消。

阎锡山虽然同意成立战动总会，但是始终对它存有戒心，千方百计地限制它的活动，可又对它控制不了，限制也无能为力。及至太原失守前夕，阎锡山竟将他派到战动总会的工作人员撤走，企图使它失掉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

---

<sup>①</sup> 陈长捷：《平型关战役中蒋、阎军对日作战及撤退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1980年1月出版。

而自行解散。这时，周恩来及时告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参加战动总会领导工作的程子华说：“阎锡山撤走他的干部，要拆台，我们不要上当。战地动委会的组织形式还需要，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战地动委会顾名思义，就要活动在敌人占领的‘战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撤走干部也好，便于我们更好地发展。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由于周恩来和程子华的影响，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态度坚决，坚持打游击，坚持战动总会的工作要搞下去。他和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人亲密团结，并且一起团结了国民党和阎锡山方面一些赞成战动总会在战地打游击的人，共同斗争，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得以保留下来。战动总会从日军逼近的太原撤出后，先到汾阳、离石等地，继而北上岚县，深入晋西北敌后，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靠拢，摆脱了阎锡山集团的影响。随着战局变化，在晋西北、雁北及绥远、察南广大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时候，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已有国民党嫡系中央军及四川、云南、陕西等各省的杂牌军队 10 万多人进入山西。国民党军许多高级将领，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后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三军军长曾万钟、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都来到太原。周恩来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来往，其中接触较多的是卫立煌。卫立煌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中一员得力的战将，他和刘峙、顾

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为“五虎将”。1937年10月上旬，卫立煌作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统帅中央军开进山西，就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他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军事部署，准备前去指挥忻口会战时，得知周恩来正在太原，就要马上会见周恩来。卫立煌所以急于同周恩来见面，并非偶然。原来北伐战争以前，他在广州就听过周恩来的演说。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时，周恩来亲自到前线督战，是他敬重的领导。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在第一军第三师当团长。他对周恩来一向敬仰。因此，这一天周恩来来到阎锡山的客厅时，卫立煌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行了室内军礼。握手寒暄以后，周恩来热情鼓励卫立煌决心去忻口迎敌，向他扼要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立场，分析当前形势、前途和战略战术。周恩来着重向他指出：从整个战略战术来说，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地打击敌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使用消极单纯防御的战法。在防御当中，也要好好采取积极的“反突击”。及至忻口会战失利，11月初卫立煌从前方退回太原，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向周恩来报告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于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部队帮了大忙，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向八路军表示感谢。”周恩来还和卫立煌就下一步作战部署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就跟卫立煌相约：待转移到晋南以后再行细谈。当晚周恩来离开太原，卫立煌也在这天夜里略迟一些时间离开。7天后，他们二人又在

临汾见面，这时太原已经失守。卫立煌一开口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周恩来用了较长时间列举了七八项理由，详细地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卫立煌仔细地听了这些分析，觉得这些道理都讲得对，符合实际，大大鼓舞起他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sup>①</sup> 经过多次倾谈，促使卫立煌以后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到共产党抗日的方针政策确有道理，破除了原先他对共产党的疑虑，增强了他抗日救国的信心。

周恩来同傅作义也接触较多。他们曾在太和岭口、大同、忻口、太原有过多次数晤。他到太和岭口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曾和傅作义两次会晤。初次见面，周恩来称赞傅作义在长城抗战和绥东抗战为国家建立了功勋，并且恳切地向他指出：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必须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到了太原，见面的机会更多。11月2日，阎锡山召集卫立煌、傅作义、杨爱源、朱绶光等高级将领开会讨论保卫太原问题，请周恩来参加。阎锡山主张保卫太原，并且提出以太原为据点，依城野战，阻敌于太原以北，以掩护大部队及太原市民和物

---

<sup>①</sup>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第38—39页。

资安全转移的方针。守城部队与城外野战部队，由战区长官部统一指挥。在讨论由谁守太原城时，阎锡山的本意想要卫立煌负责，但又不好明言，想让卫自告奋勇。但卫根本不主张守太原，在会上一言不发。其他将领也都低头不语，谁也不敢承担。这样沉默了好大一阵，经阎锡山一再询问，方才有人提出，要担此项重任，须有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指挥能力，还得有守城的经验才行。意在推举傅作义，这是与会者都清楚的。阎锡山的目光马上转向傅作义，意在征询他的意见。傅作义这时毅然站起来说：“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这样，守城的任务就交给傅作义。会后，周恩来对傅作义表示赞赏，同时关切地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这番诚恳的谈话，傅作义深为感动，终生难忘。傅作义回去后，把这句话向他的左右讲了一遍，并说：“把周代表所讲的话记录下来。”<sup>①</sup>在多次接触中，傅作义对周恩来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衷心敬佩。周恩来在撤离太原之前，又同傅作义晤谈，向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对于周恩来在历次谈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抗战的重大问题，傅作义曾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为应向中国共产党

---

<sup>①</sup> 王雷震：《傅（作义）部四二二团在太原守城》，《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1981年10月出版。

靠拢，团结抗战。同时深感过去老一套的战法已经不行，要学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实行军民合作，发动民众，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周恩来对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对山西新军的创建，代表党中央作过很多指示，并给予具体指导。周恩来住在太原成成中学的时候，多次听取了牺盟会中党组织负责同志的汇报，给予指示。在政治上，阎锡山的态度始终暧昧，对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是戒备的。当时共产党的活动依然处在秘密状态，许多同志只能在黑夜里去看望周恩来。有一次，薄一波、牛荫冠去向周恩来汇报牺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工作。到那里时间很晚，周恩来已经睡了，听说他们到来，立刻起来同他们谈了3个钟头。这次所谈的中心是：全国抗战的形势，日军占领太原的可能，如何通过牺盟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在山西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问题。

1937年9月25日至27日，牺盟会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周恩来正在太原。原来中共山西省委准备请他给党员作一次报告，但是考虑当时太原的政治情况，还不宜于这样作。于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决定由薄一波出面，趁牺盟会这次代表大会的机会，邀请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讲话。

这次讲话的地点定在原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国民师范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可是这天到了4000多

人，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些城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在讲话结束时说：“只要我们前方的民众，都能武装起来，不用说敌人打到平型关、雁门关，就是打进关来，打进太原，打到汾河流域，我们也有办法打出关去，打出华北去，打到东三省去。我希望牺盟会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组织者，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庆祝牺盟代表大会的成功。”

周恩来整整讲了3个钟头。他的声音高昂、宏亮而清晰，连扩音器也没有用，不仅礼堂里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听得清楚。在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得到通知去听讲。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决定，周恩来的报告就是党中央对全体党员的指示，要求所有党员按照党的指示认真讨论，切实执行。所以，听过报告的党员都进行了讨论，认真执行。这次报告影响很大，听报告的同志都十分信服周恩来讲述的道理和主张，对牺盟会的



工作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

在太原，周恩来先后曾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9月中旬，他曾经和彭德怀出席过由文化、教育、新闻各界人士召开的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还曾在太原原国民师范学校礼堂向各抗日救国团体成员和群众讲演，号召大家学会打游击战，到敌人后方去发挥作用。他还在10月22日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10月底会见《大公报》派往山西前线的记者孟秋江等，向他们介绍山西的战局，通过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

他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对他们讲话，同他们座谈，尽力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有一次，他接受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的邀请，参加了部分师生举行的座谈会。他在那里亲切地询问这所学校的历史，在校学生的思想情况，热情地鼓励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以便在斗争中经受锻炼，成为对祖国和民族有所作为的人。过了几天，这所学校的十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来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坚决请求帮助她们上前线打日本。周恩来又在办事处十分高兴地接待她们，认真听取了她们的要求，赞扬了她们的抗日救国热情，鼓励她们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参加战斗，经受锻炼。他的一席语重心长的谈话，

极大地鼓舞了在场的师生。经过她们的宣传推动，太原女师及其他学校一些进步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不少学生走上杀敌战场。

自从周恩来来到了太原，这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就热闹起来。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各界人士，怀着对他无限崇敬的心情请求会见。周恩来不知疲倦地接待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激发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他总是不分昼夜地挤出时间会见他们，有时到午夜12点，有时到凌晨4点钟，他始终精力充沛地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教给他们斗争的策略、方法，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在这些严峻紧张的日日夜夜，他曾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群众亲切交谈。全国各地许多知名人士和外国朋友也不断到太原参观访问。他们倾慕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的名望，也都亲来办事处看望，周恩来无不热情接待。

10月1日，阎锡山从晋北返回太原。同日，他下令北线阎军从内长城全线撤退。日军跟踪前进，直逼忻口。忻口仅距太原90公里，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安危。10月初，忻口战役前夕，周恩来在太原会晤阎锡山和卫立煌商谈战局和作战问题。10月4日，又和阎锡山等人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5日，和卫立煌、傅作义等人商谈忻口会战问题。6日，和阎、黄、卫、傅商定，统一指挥参加忻口会战的部队：右翼晋军10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预备队归傅作义指挥守太原。周恩来同日致电毛泽东、洛甫，说明将率领数

人并带一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中央复电表示同意。18日，他和阎锡山、黄绍竑具体研究在太原不守情况下的分区防卫。10月中、下旬，他曾同彭德怀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卫立煌，商谈作战问题；随后又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对东线作战提出建议。

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周恩来和阎、傅、黄共商作战部署和太原城中居民撤退计划以及山西的持久作战问题。27日，他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罗荣桓转中共晋察冀省委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阐明在不同地区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和开展党的工作原则：一、在敌占区，公开以共产党和八路军名义直接领导群众。二、在八路军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三、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四、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的代表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五、八路军在各地努力扩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参军。六、在游击区要注意筹措经费。

周恩来在太原一直坚持到最后。可是，负有“守土”之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却先悄悄地溜走。太原失守前夕，《大公报》记者孟秋江报道：“阎百川（阎锡山的号）先生这夜里（11月4日）离开太原了，离开他经营二十余年的太原了！”“十一月五日天明后，在太原城里的人物，可以数得清，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周恩来、

彭雪枫五位先生以外，还有一个不负军政责任的新闻记者。”<sup>①</sup>

当太原岌岌可危的时候，山西旧军已经大部垮掉，阎锡山竟然下命令调集新成立的新军决死队“死守太原”，作孤注一掷。周恩来及时向阎锡山提出了建议，向他指出：这些部队都是刚刚建立起来，没有经过训练，缺乏实战经验，参加防守太原起不了很大作用。它的成员又大都是青年学生，不如让他们到各地区去，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并且太原也是难得守住的。正是经过周恩来这样的劝说，牺盟会也表示不赞成阎锡山的这个打算，阎锡山才打消了这个“馊主意”。因此，当时决死队各总队开到太原后，未在城内停留，连夜撤出城外，分别开往预定地区，在八路军领导下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当敌人日益逼近太原的时候，周恩来沉着镇定。阎锡山决定将其第二战区总部和山西省政府迁往晋南重镇临汾，周恩来及时向中央汇报工作，同时亲自部署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南迁。他亲自选定撤退日期，选定撤退路线，还亲自把一批一批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送走，自己身边只留下少数机要、警卫人员，仍同彭雪枫、边章五等一起从容地在危城中坚持工作。敌机逐日轮番低飞侵入太原市空，不停地狂轰滥炸。有一天，敌机频繁地临空施虐时，“八路军

---

<sup>①</sup> 孟秋江：《退出太原城》，《西线风云》（长江编，增订本，大公报馆1937年出版）第280—281页。

办事处的招待所和门卫均被炸中。周恩来同志和办事处留守人员，隐蔽在成成中学内预先构筑好了的简易地下防空洞内，门岗均被炸塌，幸无伤亡。”<sup>①</sup> 10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2日，北线数万守军撤离忻口阵地，退守到太原一带。东线敌人也已逼近太原。隆隆的炮声在市区日夜可闻，与敌机投掷的重磅炸弹巨响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仍日夜操劳。11月4日，他还曾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东线八路军应以一个支队向山西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侧翼的运输和收容散兵。

11月5日晚上——在太原失陷前3天，周恩来才和彭雪枫、边章五等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一批人员撤离太原。这时四面城门都已关闭，只留下南门有一布雷区的通路。他们从城墙外预留的通路，搬开沙袋出城。这时汾河桥梁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争相逃命的人群象潮水般涌来，人喊马嘶，混乱不堪。周恩来看到这种混乱凄惨的景象，马上转身回城，到太原城防司令部找到参谋长，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的措施。然后才重又出城，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在汾河对面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运输汽车向汾阳前进。

---

<sup>①</sup> 岳夏：《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始末》，《山西革命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第136页。

### (三)

周恩来一行撤离太原，11月6日到达交城，7日到达汾阳栗家庄。他不顾连日奔波的劳累，一到这里就召集续范亭、程子华、南汉宸等前来座谈战动总会的工作问题，布置了在晋西、晋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

11月8日，太原沦陷。周恩来给战动总会干部及其创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全体学员作了《太原失守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他说，太原失守，证明阎锡山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阎锡山的军队在太原没有怎么打就垮下来了，他们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一直往大后方撤。他们的军队没有本事在敌后坚持打游击，也不会打游击战。总的形势就是阎锡山一直往后退，日军一直往前追。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战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他专门讲述了战动总会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很需要的。因为日军占领山西以后，第二战区的战地就是同日军打仗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阎锡山把他派来的人撤走了，想搞垮战动总会，妄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敌后抗战。我们决不能撤。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军队，一方面发展自己的组织，在敌后坚持抗战；一方面为部队输送战士，这对国家，对人民都需要。他这次的讲话，

表达了山西和华北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揭露了阎锡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族投降活动，对于战动总会的工作以及我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阎锡山从太原撤出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过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第二战区的两个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和卫立煌。他见日军侵陷太原以后没有马上南进，山西战局暂时稳定，方才转往临汾。

周恩来则按照原定计划，于11月9日到达汾阳，11日到达临汾。他在撤出太原后，沿途看到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的种种状况。11月8日，他打电报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我们各部应迅速派队收集溃兵散枪和一切资财，以发展游击战争。13日，他又打电报给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凡要退过黄河的都是帮助日寇统治华北；强调游击战，并争取和影响友军改造，一致行动；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放手收容溃兵、散兵及资财；加强各军区的工作等。

周恩来到达临汾后，立即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在这里接待各界人士的访问，指挥八路军的作战，指导山西群众组织的活动和武装群众的工作。

太原是华北最后陷落的一座大城市，它的失守标志着华北正规战争的终结。在太原失守后的第5天（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

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sup>①</sup>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阵地。”同时指出：“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他还针对党内外开始露头的右倾投降主义，尖锐地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的严重政治任务。

周恩来在11月11日到达临汾，第二天上海失陷。鉴于上海、南京对日妥协调停的空气抬头，周恩来于11月13日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拍发了《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电报，提出了坚持抗战的9项主张：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以此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改造，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六、加强各军区的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以及于省区；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sup>②</sup>

11月16日，周恩来又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以

---

<sup>①</sup> 这篇文章的全文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2版第2卷第387—400页。

<sup>②</sup> 此电全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9—80页。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sup>①</sup> 为题发表演说，分析了当时抗战形势以及存在的危机。他说：“这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关头。国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因此，必须“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坚持抗战到底”，而坚持抗战又“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他号召八路军要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发挥自己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来抗战。”他还号召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建立民主的政权，实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放民运，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他根据在山西前线的实践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方针，在动员民众这个关系抗战成败的关键问题上，尖锐地指出：“三四月来，不但政权没有开放，民运也没有开放。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因此，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于是，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的活跃，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组织。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他的讲话，道出了华北广大人民的心愿，坚定了大家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这时，中共中央已连电催促周恩来回延安开会。早在

---

<sup>①</sup> 这次讲话全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1—87页。

11月5日，毛泽东就在电报中说：“周须速回延安开会，以便在月底赴长江流域活动。”1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说：“同意周与朱、彭、任、阎、黄、卫等见面回延安。”周恩来在分别同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和朱德、任弼时等晤谈后，就和彭德怀一起离开临汾，于11月25日回到延安。

经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猛烈发展起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从9月到11月，在决定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一直在山西前线樽俎折冲，力挽狂澜，领导人民向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为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立了大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正如续范亭赠给周恩来的一首诗中所赞颂的那样：“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冲冲。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sup>①</sup>周恩来在同阎锡山和蒋系将领周旋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十分成功地挫败了一切破坏抗战、有碍团结的阴谋，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

<sup>①</sup> 《续范亭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0页。

# 博古传略

陈 夕

博古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博古最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

## 一、少年时代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生于杭州市。父亲秦肇煌，字雨农，1869年生，早年攻读法律，毕业于杭州法律学堂。民国初年，一度在上海当助理律师。1915年因患肺病辞职，举家迁居祖籍无锡市。1916年10月，博古9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朱氏携带他及尚在幼年的弟妹寄居在大姑母许家。最初，他在离家较近的秦氏公学里受启蒙教育，以后，他先后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今无锡师范附小）就读。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后，曾报考荣巷工商中学，未录取，后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二工”）纺织科。20年代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

场伟大的革命正在酝酿。当时，革命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青年学生中已广为流传。博古被革命新思潮所振奋，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发。

1923年底，上海大学学生安剑平、糜文浩等（均为无锡人）建立进步社团“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中国孤星社”，并在无锡设有支部。不久，博古经表兄许广圻介绍加入了该社。1924年1月，在上海高校读书的无锡学生缪斌、王启周等成立“锡社”。7月，“中国孤星社”和“锡社”达成相互合作的协议，即以“锡社”在沪社员加入“孤星社”为条件，8月17日，“中国孤星社”无锡支部举行会议，决定加入“锡社”，并确定博古为苏州委员会负责人。博古通过“孤星社”、“锡社”的频繁活动，加强了和上海、无锡等地爱国青年学生之间的联系。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全国各地先后举行悼念活动。3月下旬，无锡进步团体、各界进步人士筹划举行追悼大会。博古由苏州赶回无锡，在大会交际股工作。这时，博古已是“锡社”的活跃分子之一，加入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前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博古立即组织各校采取多种办法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这时，年仅18岁的博古，正患有较严重的肺病，但他毅然写道：“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sup>①</sup>

---

① 《血泪潮》第6号，1925年6月14日。

6月1日，苏州“二工”学生举行声讨大会，担任学生会会长、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的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与会者为之大恸。为发动群众，他又和同学们分头前往桃坞、萃英、显道三校，动员学生联合一致行动。6月2日，苏州20余校共3000名学生汇集体育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他坚持抱病参加，并主持了学联募捐活动。

“五卅”期间，无锡成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后援会，即“英日外人惨杀我国同胞无锡各界后援会”。博古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6月25日，“后援会”在城中公园举行万余人的市民大会，各行业均派代表参加，博古在会上作了简短有力的演说，呼吁必须坚持交涉条件，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不力的蔡廷干、曾宗楷。大会进行期间，他领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随后，他参加了后援会查禁英日货的活动，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从7月3日开始，不顾患病疲劳，提灯笼到通运桥下，登上轮船，爬入货舱，检查仇货。7月5日，无锡后援会继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博古在会上提议三案：一、将所查英、日货一律充公拍卖，所得价银作救济失业工人的捐款；二、声援沙面惨案，实行通电，救济香港工人，出发演讲等；三、举行第二次募捐。会议通过一、二两案，第三案予以保留<sup>①</sup>。会后，博古带领部分学生，四处演讲，并继续查禁了大量仇货。

---

<sup>①</sup> 《江苏革命斗争记略》第135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博古深感到要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义来指导。7月中旬，“锡社”改选领导机构，博古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此后，《无锡评论》几乎每一期都登有他的文章。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唯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他写道：“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8月中旬，博古又写了《国民会议筹备初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表示他是新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并揭露了段祺瑞的国民议会与孙中山的国民议会的根本区别。在爱国运动实践中，博古成为新三民主义的崇拜者，思想上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

1925年夏，博古从苏州“二工”毕业了。这时，妹妹邦范正在苏州女师求学，弟弟邦礼为解决家庭生计困难，不得不辍学到复元钱庄去当学徒。是就业，还是升学、继续探索救国真理？为此，他彻夜不寐，反复思考，最后终于决心不顾一切困难奔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抱负。

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数量极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书籍，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结识，在思想上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他鄙弃那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大学生，认为学术的研究与社会的运动必须相辅而

行。他多次听取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演讲，从思想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校内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博古是该分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方面在课堂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方面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1925年底，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干事。1926年底，博古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被派往苏联深造。从此，开始了他生活中的新阶段。

## 二、留 苏 岁 月

1926年底，博古从上海经过1个多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创办伊始，校方在莫斯科大教堂的对面选择了一所带有花园的大厦作为校舍，室内枝形吊灯光彩夺目，使得一些中国的农家子弟犹如置身于皇宫。然而，更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学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这些对于传统的中国哲学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了解，而且对外国资产阶级的或现代西方哲学也知之甚少，立即被新鲜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迷住了。博古当时曾经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sup>①</sup>他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里的风浪，比太平洋上的台风还要强烈。联共中央卷起的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反复交错的政治漩涡中，塑造了一群年轻人，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27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联共中央，3周后，他们又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斯大林指令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持续数月之久，一些托派学生重者被放逐回国，轻者留党察看，送到工厂去改造思想。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

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怀疑，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王明、博古等人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完全机械地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话，他们常常是手持书本，引经据典，夸夸其谈，言必称马列主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就连他们给反对派起的名字——“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都是从联共党史书本中

---

<sup>①</sup>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找出来的名词。中共“六大”以后，王明又无视党的纪律，把“六大”上争论的问题带到学校中，在同学中挑起了激烈争论。当时，“每周都要召开辩论大会，在辩论中，绝大多数同志反对王明等人的意见，但支部局的这些委员们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广大党员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sup>①</sup>一次辩论会后，一个叫吴福海的同学气愤地打了博古，可见当时这种论战的紧张程度。

1927年下半年，王明在翻译班宣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个反动组织——“江浙同乡会”，结果弄得一部分学生思想极为混乱，江浙籍的学生更是人人自危。1928年初，当国内又有一批新同学入学时，博古多次以支部局领导的名义找新同学谈话，说“校内情况很复杂，有江浙同乡会、托派等组织，过去学生还闹过事，曾经到共产国际去请愿等等”<sup>②</sup>，让大家提高警惕。这在江浙籍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惧，他们纷纷向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写信申诉，要求弄清是非真相。在数不清的申诉信压力下，中共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认为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这使王明、博古等人很恼火。“他们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sup>③</sup>博古当时讲：“要是有人反对我们，我们就必须攻击他，

---

① 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97页。

② ③ 吴福海：《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90页，第100页。

反之，谁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他客气点。”<sup>①</sup>1929年10月，当学校里清党开始时，他们便公开地谴责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

1930年1月，联共中央做出决议，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王明及其追随者成为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宗派小集团。

1926年至1930年间，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就是德波林学派。德波林是苏联著名哲学家。1926年至1930年间，他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德波林学派由以德波林为首的居于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所组成。这个学派在长时间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正值德波林学派盛行。当1928年他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与那里的德波林学派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 *поголеров* 的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着手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认为理论精通了，就能指导实践。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由于“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到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

---

<sup>①</sup> 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代表团《我们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意见》（1930年）。

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sup>①</sup>

### 三、领袖生涯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他先后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这时，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同时革命力量也有很大发展，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根据地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内。特别是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9月9日，党中央为了贯彻立三路线的6月11日决议案，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

---

<sup>①</sup>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义的混合物，结果博古受到家长制的立三中央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批评李立三犯了反国际路线的冒险主义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关于党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决议说：“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sup>①</sup>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博古被指定担任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临时中央常委。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一步步地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未能迅速辨明方向，他们仍然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从而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新的高峰。

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认为“中国

---

<sup>①</sup>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六大以来》（上）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决死的斗争”，<sup>①</sup>因此，他们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等冒险主义计划。1932年4月，他们要求全党“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sup>②</sup>1933年2月，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他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不是首先强调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而认为是“进攻苏联底序幕”。因而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博古在《斗争》第二期上撰文说：日本入侵中国是“增强反苏战争的准备”。“这种反苏战争会进一步加速中国革命直接形势的发展”。从而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的“中心任务”。<sup>③</sup>1930年7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的决议案》中说，中国革命是在“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

---

① 中共中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

② 《斗争》，1932年4月4日。

③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

级民主阶段的任务的”。<sup>①</sup> 并指示中国共产党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sup>②</sup> 博古等人执行了这种“左”的关门主义政策。1932年1月博古主持通过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道：“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一切属于中间势力的在野派，“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sup>③</sup> 博古等人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同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相类似，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到了最后的决战时期，中间阶层反对我们进行这种决战，他们又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在革命的道路上，博古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认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是党在目前的总

---

<sup>①</sup> <sup>②</sup>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sup>③</sup>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六大以来》（上）第198页。

任务了。<sup>①</sup>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城市工人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企图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胜利”，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2年底，博古等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定、上杭，于1933年1月初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有时仍称苏区中央局）。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无正式职务称呼）。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使博古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新政策。

博古在上海主持临时中央工作期间，虽然也曾强调武装斗争，但仅仅是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仿效苏联，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根据地的红军仅仅是配合城市工人起义的力量。当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严峻的现实使博古感到，中国的反动派手中不仅有着“数量上技术上都

---

<sup>①</sup>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六大以来》（上）第198页。

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保存在他手中的，还有极大的物资财源与经济上的优势，而这个武装力量与经济优势，乃是反革命派必然用来进攻苏维埃的工具”。<sup>①</sup>因此，1933年以后，博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话，反复强调扩大红军的重要性，把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作为党当时的一项基本任务。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6周年时，他再次撰文强调：“红军成了苏维埃政权可靠的强有力的武装支柱”，成了解放全国民众的“主力部队”。<sup>②</sup>这时，博古还提出农民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强调武装斗争要发动农民来进行。博古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的，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sup>③</sup>他以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川陕转移为例，指出：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之中所以能够胜利地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是因为它受到川豫边的农民的支持，“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sup>④</sup>

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展开，博古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

---

①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② 《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

③ 《斗争》第17期，1933年7月5日。

④ 《红军中华》第99期，1933年8月4日。



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因此，博古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sup>①</sup> 1933年9月，在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献辞中，博古明确指出：“为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完全胜利，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我们战争动员中的重要的一件事，……是保证主力红军在决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sup>②</sup> 尽管博古这时还没有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长期性，但是思想上毕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转变了。

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临时中央在各革命根据地强行推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由于无利可图而纷纷歇业倒闭。结果造成了根据地与外部的贸易萧条，苏区农副产品无法输出，急剧跌价，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从1933年4月开始，临时中央领导全党广泛开展了关于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大讨论，各级领导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提出了批评和检讨。6月，博古写了《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文章虽然仍然认为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在必要时，要“没收他们的企业”等等，但同时他也指出，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要区别对待，“苏

---

① 《红色中华》第99期，1933年8月4日。

② 《斗争》第27期，1933年9月5日。

维埃政权对于这两个阶级的态度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对于地主我们采取坚决无情的消灭地主这一阶级的政策，……至于对于资产阶级，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适当与不能采用的，所以，‘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文章具体地提出了要利用资本家的“经验”，“利用他们的智识”来为我们服务。<sup>①</sup> 基于这种认识，1933年下半年，博古主持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开始走向恢复”，“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sup>②</sup>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此后，博古主持下的临时中央进行了若干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的工作。1933年8月，十九路军派陈公培事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到延平附近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表示愿意在工农民主政府1月17日提出的三项条件下，进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彭德怀立即电告临时中央，中央当即表示赞同，并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sup>③</sup> 1933年10月，红军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的初期，临时中

---

① 《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④ 《彭德怀自述》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央对十九路军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认为由于十九路军的士兵与一部分下级军官以及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南京政府蒋介石投降出卖的不满”，十九路军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与范围内采取一些‘左’的策略”，“不管这个策略采取时间的久暂，……对于我们党去争取这一时间，开展革命斗争与争取革命斗争的领导权，是极端重要的”。<sup>①</sup>并向十九路军表示，“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sup>②</sup>然而随后不久，临时中央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竟转了180度，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sup>③</sup>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玩弄“欺骗民众的烟幕弹与把戏”。<sup>④</sup>当彭德怀向博古建议援助十九路军时，即遭到博古的批评。由此可见，博古当时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和它订立协定”，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的援助”。<sup>④</sup>这些相互矛盾的态度和政策表明，博古当时在思想上仍然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左”倾关门主义仍占主导地位。

1933年5月8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暂短的，但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了相当

---

① 《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11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② 《红色中华》第149期，1934年2月14日。

③ 《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六大以来》（上）第525页。

④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大影响的一段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敌我双方态势表明，在内线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不可能的，根据地的丧失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决不是说，红军除了失败，就无其它出路了。当时一些有远见的领导人，提出了实行战略转移的设想。可是，博古等人不但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反而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

当时，由于中央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军事工作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而博古对打仗的事尤其生疏，所以，当10月初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便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制定以及红军部队的训练、后勤组织等极重要的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掌管。这样，博古、李德二人的军政联合领导体制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周恩来建议以一部佯攻黎川，主力则转移到敌人背后，“以调动敌军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博古等人命令红军主力分成两个纵队，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以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黎川不但没有收复，红军反遭到重大损失。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彭德怀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竟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

地的冒险主义”。<sup>①</sup>

1934年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顶点，盲目地断言：“中国革命的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sup>②</sup>4月上旬，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央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担任野战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遭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分6路向中央苏区腹地进犯。博古又听信李德采用“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命令红军也兵分6路，企图阻挡敌军的推进，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越来越被动。这时，人们已“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可能”。<sup>③</sup>于是，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

---

① 《彭德怀自述》第184页。

②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六大以来》（上）第513页、51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7页。

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sup>①</sup> 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sup>②</sup>

长征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主要是博古决定；对其他高级干部及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准备工作是仓促的，不仅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三人团”规定了可以随中央政府长征的中级干部数目字，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他们亲自选定。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也多次向博古建议，希望瞿秋白同走，但博古反对。<sup>③</sup>

1934年10月中旬，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长征开始了。李德令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3000多副。这种“甬道式”的搬家方式，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勉强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12月，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

---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③ 《访问伍修权同志记录》，1982年4月13日。

江，仅剩3万余人。这进一步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部队中士气明显地低落，普遍地滋长了怀疑和不满情绪，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和领导问题。

红军遭到的惨重失败，使博古痛心疾首，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待，可又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他常拿一把小手枪，朝自己乱比划，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对自己以前的做法、主张发生了怀疑。

1935年1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sup>①</sup>“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sup>②</sup>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并不让博古交权。但博古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sup>③</sup>，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从而结束了自己3年零3个月的领袖生涯。这是他开始纠正自己“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起点，是他一生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

---

<sup>①</sup> <sup>②</sup>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6页、第84页。

<sup>③</sup> 刘英：《长征琐记》，《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

#### 四、彷徨时期

遵义会议召开时，鉴于当时正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同时，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为不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影响战斗，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在政治上的错误。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却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张国焘出于夺取军权，征服中央的目的，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他认为遵义会议是党的调和主义，要求改换领导，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博古出于维护以前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他表示，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他同志也都表示不赞同。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等同志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影响了他对以前贯彻执行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反思和总结。直到1935年12



月瓦窑堡会议召开，党面临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战略转变的伟大历史使命时，博古仍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sup>①</sup>会上，他“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sup>②</sup>

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极为迅猛，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日益明朗，不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个时候，即1935年11月3日，博古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后，由博古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个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白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36年2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派董健吾、张子华前往陕北送南京方面关于国共双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密函时，博古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接受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并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等人。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博古拍了一封转董健吾的电报，在电报中表示“欢迎南京当局

---

<sup>①</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sup>②</sup>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5条意见。<sup>①</sup>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党的军事战略问题，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晋西会议”。会议在一开始，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时，博古仍然不同意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抗日阵线之内，认为当时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阶级斗争还激烈存在，要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卖国贼。<sup>②</sup>会议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多数人反对博古的主张，特别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张浩等同志都发表了反对性的意见。张闻天在会议总结中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明确指出：中间营垒一部分已经“转向革命”，党当前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这对统一与会者的意见，特别是对博古思想认识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会议结束时，博古基本上同意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博古思想认识的转化。8月2日，他发表了《谈西南事件之教训》一文，指出西南出兵抗日的军事发动，是中国抗日救国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序幕，说明“本身包含着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完全与民众的救亡阵线的原则

---

① 《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晋西会议纪录》（1936年3月）。

相一致的”。<sup>①</sup> 这表明，这时博古已经认识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1936年12月，博古受中央委派同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彻底转变了博古对中间势力政治态度的认识问题，而且开始思考党中央1931年至1935年的政治路线问题。<sup>②</sup>

1937年2月24日，博古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6月，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9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同康泽激烈争辩，“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sup>③</sup> 而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请示中央，则做了一定的让步，充分体现了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同时，博古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当时中央规定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方针；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博古组织办事处的同志一道为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做了大量工作。为宣

---

① 《红色中华》第290期，1936年8月2日。

② 博古：《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③ 康泽：《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传党的统战方针，9月下旬，办事处开始筹办《新华日报》，经过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出版，成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喉舌。为营救政治犯，博古等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反复申明中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从而迫使国民党先后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释放了一批政治犯。经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博古在这期间还亲自领导组建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等党的组织。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博古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撤往武汉。博古不辞辛劳，常常工作至深夜，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表示赞成“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说“当前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队抗日”。<sup>①</sup>

这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

---

<sup>①</sup>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其中完全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完全归结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sup>①</sup>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sup>②</sup>，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抗战初期，博古之所以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其原因，一方面，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去‘左’的错误给革命和党带来很大损失，感觉我们的力量小了，信心小了”。<sup>③</sup>当时八路军的编制仅46000人，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又采取了某些进步措施，“资产阶级的态度转变了”，由内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为统一战线中的盟友，这些情况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博古于18日同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人到达武汉，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八办”设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今汉口长春街57号）4层楼的大石洋行内，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将机关秘密设在这个楼上。12月20日，博古同周恩来、王明一

① 《解放》第30期第10页，1938年2月8日。

② ③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起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21日晚，博古同周恩来、王明又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会议中，博古先将边区状况、国共之间的联络方法、办事处的筹建工作以及国民党代表去延安参观等问题作了说明，然后由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议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建立国际军事工业基地，补充扩大和改造军队等。蒋介石对他们的意见表示同意。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因为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成份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长江中央局；2、长江局委员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组成；3、博古兼任长江局组织部长。此后一段时间内，博古在中共长江中央局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时期博古发表了许多文章，尽管文章中也掺杂有一些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但他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宣传，对于驳斥投降派的“亡国论”，对于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38年6月，博古与毛泽东、王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时被称为“中共七参政员”。此后，博古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坚定性。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出席会议并作了《青年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博古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当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时，博古就同吴玉章、董必武等从延安飞往重庆。这之后，博古除了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外，作为南方局的组织部长，主要负责南方局的组织工作。1939年8月，周恩来因手臂负伤，赴苏治疗。博古又开始代理南方局书记工作。这期间，他先后去了广东的韶关、湖南的邵阳、川东等地，参加中共广东省委、湖南省委和川东特委的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这些地区党的组织工作。他还在重庆多次领导举办党员训练班，集训南方局所属的党的干部，并亲自为学员讲课。

1940年冬，博古由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日本集中了75%以上的侵华兵力与95%以上的伪军，对解放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使解放区处境极端困难。为了度过重重难关，坚持抗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对新闻工作也作了重大部署。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在这些刊物停刊期内，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文章，分别登载在《解放》与《共产党人》上面。同时决定扩大《解放》编委，洛甫、博

古等人参加编委会。<sup>①</sup>为了进一步减少开支,统一党内的对外宣传口径,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开始准备进一步压缩和取消其它刊物,创办一张大型日报,并且责成博古负责筹备。

博古非常热心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仅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几年时间里,他就翻译了苏联理论界的10多篇文章(见1937年至1939年的《解放》周刊)。当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后,便全力投入到筹备工作中。当时,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是极为困难的,没有房子,更缺少印刷设备。博古同筹备组的同志一道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将报社社址确定在延安清凉山。因为没有宿舍,博古仍住在杨家岭,每天一早到报社办公,虽有几里路程,却是风雨无阻。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也无所谓星期日休息的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保证了按时出报。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发出通知,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解放日报》创办之初,在宣传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态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党的机关报,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对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不力,报纸用近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6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3/4 的版面刊登国际新闻。另外，版面安排过死，而不是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进行宣传。博古当时曾主张《解放日报》要向苏联《真理报》学习，每天要有一篇社论。他还说：“每张报纸必须有新闻、社论、通讯报道，缺一便不成其报纸。过去《大公报》、《新闻报》、苏联《真理报》都是如此，好象是天经地义不能变。”<sup>①</sup> 这表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束缚博古，妨碍着他去获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理解。

## 五、追 求 真 理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党报要突出党的政策，报道抗日战争、群众运动和群众生活，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3月中旬，《解放日报》编辑部召开会议，会上一些同志对博古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特别是批评了报纸向苏联《真理报》学习，每天发一篇社论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报社领导人每天为写社论而绞尽脑汁，没有充分的时间深入实际斗争。一些读者也纷纷来信，批评《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和建设边区的实际相距太远”。这些批评，对博古的思想触动是很大的。他自早

---

<sup>①</sup> 陈坦：《回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年投身革命以来，更多的时间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而且参加过多种报刊的编辑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博古于1937年1月被任命为《新中华》报社的社长，1941年2月又开始担任《解放》月刊的编委。不久，开始筹办《解放日报》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写作、编辑到排版印刷，他都精通，常常是集写作、编辑、排版于一身。不仅如此，博古还十分热爱党的新闻事业，他常常对人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sup>①</sup>而且“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然而，《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却未能发挥出党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党中央和广大读者都不满意。这使博古不得不进行认真的痛苦的思索。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请大家对报纸改革发表意见。会上，博古作了自我批评，感到“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对党的路线没有贯彻，登载群众的活动太少，没有起到组织者的作用”。

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发表了博古起草的《致读者》社论，社论对《解放日报》创刊10个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检讨，表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彻底的改革”，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

---

<sup>①</sup> 余光生等：《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

思想斗争，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改版后，博古从多方面入手，贯彻执行党的办报方针，使《解放日报》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首先，博古带头深入实际，每天都坚持到报社各个具体部门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审阅《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尤其注意报纸的社论，凡是空洞无实的社论坚决不发，社论与消息紧密结合。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博古几乎每天都去新华社研究新收到的英文电讯。以后，象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苏联对日宣战这样的重要英文电讯，也都是他第一个见到电文，随后直接送中央领导同志。然后他亲自守在电台边，等待各方面有关动态性的电讯，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此外，每次新闻记者下去采访，博古都要同他们谈话，告诫他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强调“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刻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sup>①</sup>其次，建立业余通讯员网，创造了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好形式。陕甘宁地区大多是偏僻的山区，不利于信息的沟通。在博古的领导下，《解放日报》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业余通讯员网。并通过编辑新闻手册，定期举办训练班等形式，提高业余通讯员的业务水平。到1945年，《解放日报》已“拥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

---

<sup>①</sup> 《解放日报》1946年5月16日。

《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实践，使博古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博古具有很深的理论修养，源于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一有空，就是读书。在延安新华书店里，他是一个基本主顾，凡是外面出的书籍杂志，不论什么，他的一本是必不可少的”。<sup>①</sup>他知识渊博，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闻工作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以前由于他重理论而轻实际，思想方法不正确，而当他一旦认识了这一弱点，注意深入社会实际的时候，精通理论的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这使他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深刻地认识社会实际，更好地总结经验。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工作中，博古运用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去指导实际工作，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每一项工作，都能不时提出精辟的意见。在博古的领导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有了重大变化：在版面安排上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陈规旧套，而变成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思想作风也有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赞扬了《解放日报》的历史性进步。<sup>②</sup>

---

① 《四八烈士》第492页。

②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第18页。

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铺开，对于推动博古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党的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巩固与发展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党中央的指示，对博古来说无疑地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开始博古表现很沉闷，不愿暴露思想情况。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sup>①</sup>报社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他努力去学、领会整风文件，开始了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彻底反省。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

---

<sup>①</sup> 《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第19页。

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 1928 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上，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下被牺牲打击，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小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sup>①</sup>

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1946 年 2 月，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临行前，《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的礼堂举行欢送会。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幻想和平就要到来，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说：“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总是要去的。但有个问题必须清楚，就是去干什么？是去辛勤工作，为人民服务，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物质享受？”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

---

<sup>①</sup>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 年 5 月 3 日。

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sup>①</sup>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深深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欢送会竟成了他和清凉山的同事、战友们的最后诀别会，这次讲话竟成了他留给清凉山同事、战友的最后遗言。

2月13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14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22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23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国民党严重阻挠，为与党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等人冒恶劣的天气，由渝乘美制C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触山失事，机组人员与乘客全部遇难，博古年仅39岁。

---

<sup>①</sup>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万众瞩目清凉山》第239页。

## 一、二战时期的河北农民运动

俞 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河北农民运动（以下简称“河北农运”），自1925年始，先后有直南红枪会、玉田暴动、高蠡暴动、冀南农民武装斗争……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它不仅予当时的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入侵我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还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农村党的组织，团结、教育、组织起千千万万的农民，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培养、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 一、河北农运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1、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导致我国农业、手工业的破产。河北地处华北中心，农业、手工业受到了更为直接和严重的破坏。1929年10月26日《顺直省委扩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河北“近年来粮食进口逐年增加入超”，



“土货出口数目非常低落”，“农村荒田增加”，农村经济凋敝。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激起了华北农村各阶层人民激烈的斗争和反抗。

2、军阀战争。1924年始，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争夺地盘，曾在河北、河南地面发起直奉战争；1927年，在河北境内的张家口、石家庄、涿州等地又发生了晋奉战争；1928年间，为争夺华北地盘，蒋（介石）、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四派联合，发动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1930年4月至11月，蒋介石又和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军阀混战期间，农民除遭受军队过境、驻防时的奸淫、抢掠、抓车、拉伕和溃兵游勇的骚扰外，战争所需的粮食、车马、草料、修路、运输、民伕等等，都是就地向农民进行勒索和摊派。农民除负担田赋、房契等正税外，附加苛捐杂税有数十种之多。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因之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致使成千上万的农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

3、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地主豪绅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农村的基础和代理人。他们把持乡村政权，利用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据1929年以前农商部统计，顺直省（今河北省）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总数20%多的中小地主、富农和官僚大地主手里。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他们还利用“华洋义赈会”、控制金融、发放债券、私设官盐专卖局、承包税

收等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搜刮。“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sup>①</sup>

## 二、河北农运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25年6月—1927年7月）

这一时期为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可以国民党的名义合法组织农运，在广州、湖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河北境内的玉田、张家口等地也普遍建立起农民协会，斗争对象主要是封建军阀。

（1）建立了察哈尔农民协会。1925年6、7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派杨鸿涛等到张家口，在张家口近郊的宁远、七里茶坊、东湾子农林实验场、孤石、万全，还有张北等地，建立起农民协会，发展会员近200人。同年底，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又正式成立了察哈尔农民协会，有农协会会员600余人。自1926年春天开始，察哈尔农民协会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开办农民运动训练班等方式，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并组织领导东湾子、孤石村农民斗争了反动工头胡麻子等。是年秋，奉系军阀占领张家口，贾荣、张好古、赵瑞芝等农民运动骨干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气氛中，孤石、西甸子、乌拉哈达、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3页。

茶坊、崇礼、张北等地农运骨干，继续坚持斗争。察哈尔农民协会的建立及其活动，对以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抗击日寇，收复失地，曾产生一定影响。

(2) 成立了津南农民自卫军。1925年8月，中共党员张隐韬在津南泊镇建立起一支400余人的津南农民自卫军，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镇压土豪劣绅”、“保卫农民利益”、“打倒奉系军阀”等口号。同年12月初，农民自卫军自泊镇出发，占领了南皮县，收缴了地主民团100多条枪。随后，津南农民自卫军在旧县镇经过短期整顿，又向庆云县城进发，守城奉军张宗百的一个营弃城逃跑，自卫军占领县城，收编了100余名地方团丁，名声大震。庆云、无棣两县农民纷纷要求参加自卫军，自卫军很快发展到1200多人。张隐韬将自卫军整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手枪骑兵队，并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全国发出《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宣言》。一大队镇守庆云县城；二、三大队以旧县镇为中心，活动在盐山、乐陵、沧县、南皮一带。1926年2月4日，自卫军主力在南皮县北徐庄附近遭到了弓富魁旅的袭击。敌我力量悬殊，自卫军被冲散。张隐韬被俘，于翌日英勇就义。津南第一次农民武装斗争失败了。

(3) 直南红枪会的发展与斗争。红枪会源于鲁西一带的大刀会。大刀会是当年义和团的组成部分，义和团被镇压后，它便在民间潜伏下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大刀会又活跃起来，并派生出以红枪会为主的许多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村民间团体，如黄沙会、毛蓝会、一心会、硬肚

会等。1927年《顺直通讯》称：“大名道的红枪会，共有七八十万人。”

我党对红枪会甚为重视，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还曾通过一项《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杂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的组织……它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政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据此，中共北京区委下属党组织曾先后委派赵纪彬、李大山、李素若、王子青、杨春霖等深入直南地区的红枪会，团结引导他们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当时红枪会的主要口号是：“反对苛捐杂税，攻占城池，响应北伐。”

1927年间，直南地区的红枪会、黄沙会、大刀会等农民武装团体，曾先后围攻和占领过肥乡、成安、永年、大名、广平、鸡泽、巨鹿、曲周、南和、任县、邢台、邯郸等县城。在此期间，他们不仅处决了孙武奎、刘老佩、宋雅南、程天贵、赵栋、范景兰、张杰三等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还直接和奉系军队及其军阀统治地方的县保卫团、警察局展开斗争。如驻磁县的奉军，曾遭到天门会的痛击；成安的三会（天门会、红枪会、黄沙会）曾缴了郭三村伪保安分队的枪，还击毙了县保卫队大队长林常胜；奉军第七团（直鲁联军直南镇守使谢玉田部）遭到黄沙会的伏击，几

乎全军覆灭；奉军张心源（副军长）率一旅欲血洗魏镇，被红枪会用枪挑死，重创该旅；同年6月，成安、肥乡和邯郸东南乡的黄沙会和邯郸、武安等县的天门会约6000余人，在围攻邯郸县城时，先后占领火车站，炸毁铁路、烧了奉军弹药库，驻邯郸城内的奉军和县长被逐出县城。

同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革命人民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直南红枪会等组织逐步被新旧军阀击溃和瓦解，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

（4）反“旗地变民”。1927年1月至4月，京东地区的玉田、遵化、蓟县等县，曾举行数起反抗“旗地变民”的斗争。这些县的“旗地”，约占各县耕地总面积的70—80%，不仅自耕农、半自耕农，其中部分地主、富农也占有不同数量的“旗地”。

1926年冬，统治河北的奉系军阀政府征催“旗地变民”税款，一方面以逾期不交，加税罚款和没收土地由政府拍卖相威胁；另一方面以提成分红等办法，奖励协助征催的官吏豪绅。仅玉田一县，“旗地变民”款数竟达50万银元之多。其时正值旧历年关，粮价低，银根紧，许多农民如将此项款交齐，就得倾家荡产，沦为乞丐。

是时，中共玉田特别支部（1927年1月改建为县委）的张明远、肖荫堂、杨春霖等人，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农历腊月初八，3000多农协会员（时称“联庄会”后又改称“农民会”）拥进玉田

县议会，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死县议员”等口号。他们搜查不到县议员，将县议会的门窗和一切家俱什物捣毁，并将公文卷宗和议员们的衣服被褥等聚集院中，付之一炬，并将县长驱逐。军阀政府怕实行镇压会激起群众更大的反抗，将玉田县县长以失职罪名予以撤职。对“旗地变民”税款既未明令取消，也不敢再继续催征。玉田反“旗地变民”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玉田反“旗地变民”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与玉田毗邻的遵化县也发生了反“旗地变民”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随之蓟县等部分村庄也发起了反“旗地变民”的斗争。

玉田反“旗地变民”的斗争，曾受到当时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高度评价。他说这是对北方农运的发展、配合北伐战争反军阀统治的一大贡献。并说：要认识中国是个农业国，占全国人口80%受着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对革命的成败极其重要。要根据党中央对农民运动的方针，在抗捐抗税和农民迫切要求的其它各种斗争中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配合南方的北伐战争，争取更大的胜利。

(5) 反“讨赤捐”。1927年5月，北伐军在河南临颖击败10万奉军。张作霖慑于北伐军的威力，被迫将余部从河南撤回东北。在撤回以前，以筹集征讨共产党军费为名，向其所统治地区预征1928年的“上忙税”，并每亩地加征2.5元的“讨赤捐”。麦秋前，正定县发生特大雹灾，不但即将

收获的麦子被砸在地里，玉米、棉花等秋季作物也被砸坏，农民生活无着。在此情况下，中共正定县委在省巡视员解学海的帮助下，开展反“讨赤捐”的斗争，于1927年6月14日，发动组织1500多农民，举行抗预征钱粮、反“讨赤捐”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直奔县衙门，涌入衙内大堂，与县知事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县知事金汪杉贴出了免征“上忙税”和“讨赤捐”的告示，斗争取得胜利。

在此阶段，晋县等地根据顺直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抗缴预征钱粮和苛捐杂税的指示，也都先后发动了抗捐抗税的斗争，大多取得胜利。

## **第二阶段（1927年8月—1933年4月）**

这一阶段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开辟和建立起井冈山等数块革命根据地。其间，党内发生了“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一阶段河北曾举行数起农民武装暴动，但都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

（1）玉田暴动。1927年9月，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到玉田县，向张明远等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顺直省委关于在京东地区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

同年10月间，在京东特委张明远、解学海等人领导下，玉田县2000多名农协会员（其中有200余名为自卫队，他们持有枪支），举行围攻玉田县城的武装暴动，占领了玉田

县城。随后以 400 多名有枪的自卫队员为骨干成立了农民军。

以后，又根据顺直省委指示，以玉田农民军为骨干，成立了京东农民自卫军。

同年 11 月初，京东人民自卫军由遵化的王爷陵向玉田进发，途中因遭到地主武装的“围剿”而失败。于方舟、解学海等人被俘，英勇就义。

(2) 五里岗暴动。1930 年 6 月，中共完县中心县委韩永禄、李永茂、葛占龙等根据顺直省委关于“组织农民暴动，成立红二十二军，夺取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组成了暴动委员会。

同年 8 月 17 日，完县、满城、望都等县 500 余名农民群众前来完县五里岗参加武装暴动。暴动司令部设在完县五里岗村小学。根据顺直省委指示，以参加五里岗暴动群众为骨干，正式成立红二十二军，共 500 余人。总指挥韩永禄，副总指挥葛占龙、高辰，其他领导人李永茂、葛洛尚、刘连元等。司令部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手枪队。战士们臂戴“红军”袖章。手枪队战士红布裹头，又被称为“敢死队”。没有枪的战士手持大刀、长矛。

8 月 21 日，红二十二军分 4 路攻打完县县城。由于城内敌人早有防范，攻城由凌晨开始，一直激战到中午，未能攻克。下午，大雨倾盆，平地水深盈尺，攻城无法继续，指挥部决定，留下部分队伍监视城内敌人，大部撤回五里岗。8 月 23 日，敌驻保定晋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派一营兵



力驰援完县。韩永禄等决定队伍撤离县城，到山区打游击。8月26日，在从河口奔涞源途中，暴动队伍遭到驻保驰援晋军、易县地主武装联庄会和唐县保卫团的四面夹击，激战一天，仍未能突出重围。此时暴动队伍只剩200余人。当天晚上，队伍突出重围，各自分散。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就这样失败了。葛洛尚、韩永禄等于1930年和1931年先后被敌杀害。

(3) 成立阜平苏维埃。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参与冯、阎一方的高桂滋部，由于冯、阎失败，退居山西省平定县。该部中有以赫光为首的中共党的秘密组织，其时已发展党员50余人。据此，1931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高桂滋部发动兵变。同年7月4日，趁高桂滋赴北平为其父做寿和该部军官星期六回家之机，该部官兵10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因未能实施原定计划，遂撤出平定县，经阳泉越过正太路，到达盂县进行整顿。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该部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军政委，窦宗融任副军长，欲在五台县扩充实力后西渡黄河去陕北。后因五台境内敌军云集，于是决定东去阜平，在那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四军到达阜平以后，于7月26日在阜平县衙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宣告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到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

阜平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开始在全县境内清除地主

武装，如解散王快镇一带的反动民团，没收其武器，还逮捕了在县内影响较大的反动地主赵宗周等。与此同时，建立起革命的地方武装——农民赤卫队。阜平苏维埃政府打开官仓和地主的粮仓救济贫苦农民；创办学校，让穷苦学生免费入学。还在县城附近的沙沟、柳树底、苍山等村进行社会调查，准备发动农民平分土地。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政府受到当地群众和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10余天内，报名参加红军的有500人之多。

时隔不久，由于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人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和阜平苏维埃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产生轻敌麻痹思想，从而中了军阀石友三旧部沈克的“诈降”计。军长赫光等受降时壮烈殉难。红二十四军余部离开阜平，转战到陕北，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

红二十四军撤走以后，国民党大肆抓捕革命群众，王修德、张元仁、石德义等一批积极分子远离他乡避难。创建半月有余的苏维埃政府，就这样夭折了。

(4) 高蠡暴动。1932年8月27日，高阳、蠡县、博野等县农民群众，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河北省委派省军委书记湘农前往组织，保属特委成立了以黎亚克等7人组成的“保属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次暴动。

暴动成功后，即着手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支，开仓分他

们的粮食，还袭击公安局、地主保卫团。

至8月30日，由湘农、宋洛曙等组织发动的暴动队伍已有300多人，收缴长短枪120余支，他们在高阳县北辛庄召开会议，宣布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正式成立，湘农任支队长，下设三个大队。同时宣布正式建立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

8月31日，一支队命第三大队留守北辛庄，第一、二大队去西演村打游击。西演村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集镇，那天是集日，游击队到后分了8家地主的粮食和衣服，还分掉了一家盐店的盐。游击队在西演村召开大会，到会群众上千人。他们还在该村成立了村革命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赤卫队、劳动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等。

下午两点左右，一、二大队回到北辛庄。游击队被驻安国白凤翔部的一个骑兵连包围了。激战两个多小时，湘农等人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突围，宋洛曙、蔡书林等17人牺牲，9人被俘。从北辛庄突围出来的部分游击队员，在途中又遭到骑兵连的追捕，在高阳县高家庄与敌经过一场激战，被迫解散。

与此同时，博野县西南区起而响应暴动的40多名农民群众，由博蠡中心县委委员宋怀欣带领，在向北辛庄进发途中被敌包围，激战后部分突围，19人被俘，其中18人英勇就义。再是蠡县北区黎彦昌、李学敏，高阳东北区刘果庄一带的高国贤，高阳东南区河西村一带的侯君梅，高阳城北西陶口一带的翟树功等，其时都组织带领部分群众起

而响应暴动。由于北辛庄暴动队伍遭到镇压，他们都先后解散，有的被捕后壮烈牺牲。

这次暴动历时5天，共牺牲47人。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保属团特委书记马永龄等也相继被敌杀害。暴动主要成员家属也都被当地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逼得流落他乡。高阳、蠡县、博野呈现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一阶段河北境内还先后举行数起规模较小的暴动，如“慈峪暴动”，“水泉暴动”等，也都在短期内被敌镇压。

### 第三阶段（1933年5月—1937年6月）

1933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一协定的签订，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仅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热河的占领，而且承认冀东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反抗，也更加看清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这一时期的河北农运，一方面继续反抗为国民党政府所支持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号。较为典型的为冀南农民武装斗争。

1935年2月至1936年4月，冀南（又称直南）地区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为时

一年零两个月的武装斗争。这一斗争以滏阳河为界，分滏东、滏西两地进行。滏西地区由刘子厚、马国瑞等负责领导；滏东地区由张霖之、郭森、王光华等负责领导。1935年秋，直南地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分为滏西游击队和滏东游击队。1935年10月，滏东游击队在平乡县游家庄受到国民党驻永年县一个营盐兵的进攻。游击队采取“诱敌深入”、“前后夹击”的战术，大败盐兵。

与此同时，滏西游击队趁任县保安队由尧山回任县县城之际，100多名队员埋伏于任县李家屯，待敌进入伏击圈，突然向敌发起猛攻，保安队长被击毙，保安队悉数缴械投降。这次战斗，打死打伤保安队17人，缴获长短枪57支。

游击队还发动群众进行抢粮斗争。如平乡县乞村大地主郑牛子，他家44亩玉米一夜之间被游击队组织领导的农民群众抢收干净。该县马尚屯地主马新开，他家的68亩玉米地也被游击队组织当地农民抢收干净。“分粮吃大户”斗争更为普遍，1935年4个月的时间内，仅平乡县农民，在游击队的组织领导下，即分掉地主粮食12.8万多斤。1936年1月，这两支游击队又联合组成“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任副师长。队伍近千人，有枪800多支。他们利用冀南平原上的“青纱帐”、树林子、沙窝、坟地等地形，昼伏夜出，展开打盐巡、打盐局子、斗地主、分粮吃大户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蒋介石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限期“围剿”。从1936年2月开始，宋哲元命令国民党部队，采取村村驻兵，四面

“围剿”，对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的村则采取“重点围剿”和“各个击破”的策略，对游击队和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的“围剿”，近千名游击队员和群众在突围战斗中或被捕或牺牲。针对这一情况，直南特委于1936年4月通过了插枪（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决定。持续一年有余的武装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阶段，中共河北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还直接间接地领导了农民群众的抗日斗争。如丰润县王承祖组织的抗日民团，它直接受中共丰润县委领导。又如长城抗战失败后，活跃在长城内外（今承德、平泉、宽城、青龙、迁西、遵化等县深山区）由孙永勤创建和领导的农民武装，1934年5月，接受中共京东特委成员王平陆的建议，将原“民众军”改称为“民众抗日救国军”。孙永勤说：“‘民众抗日救国’，这个名字改得好，方向明，旗帜新。”这是中共京东特委对孙永勤这支农民武装一次极为重要的指导，它对这支农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成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孙永勤直接组织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一年间，先后在长城内外拔掉100多个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警及土匪、汉奸1.5万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 三、河北农运的特点及其影响

#### 1、规模小，持续时间较长。

河北农运发起于1925年，10多年间，此起彼伏，持续

不断。它犹如丛林、荆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曾几次想建立江西、陕北等地那样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和组织领导不力等原因，经久未能实现。

## 2、直接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河北农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受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如1927年举行的“玉田暴动”。其时，北方奉系军阀和阎锡山晋军发生战争，中共北方局即在10月26日通过“暴动计划”，决定举行顺直“大暴动”（即在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和京东4县同时举行暴动）。其结果，除玉田，其它诸地均未发动起来。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者认为，只要起义（暴动）就好，不估计敌我力量之对比，不考虑成败和徒然给革命力量造成的损失。有的领导人为了避免“机会主义”和“怕死”之嫌，便去硬拼，盲目组织和领导暴动。

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和河北省委为了贯彻和推行“左”倾路线，相继发动了完县五里岗、高蠡等暴动，给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 3、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斗争大都取得胜利。

在河北农运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共北方局、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在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的同时，还组织领导农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日常的的经济斗争，如反“旗地变民”、扫盐斗

争、“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税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和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大都取得胜利。同时通过这些斗争，发展和巩固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河北农运的成功和失败，都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正确的主张和政策逐步深入农村，农村党组织、农民群众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农运中培养和造就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河北农运应有其光辉的一页。



# 赤石暴动始末

林 强

发生在50年前闻名全国的赤石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监狱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是新四军将士与爱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革命斗争的光辉篇章，它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年伊始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和在东南各省被捕的共产党员、抗日青年和爱国志士共700余人，被分别囚禁在江西省铅山县永平、石塘两镇和上饶南郊的周田村、石底、茅家岭、七峰岩、李村等地。国民党在这里建立起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的上饶集中营，将其称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部军官大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1942年4月，两部分合并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由第三战区中将高参军统特务卢旭兼任主任，少将专员军统特务张超任副主任，下辖2个大队、6个中队。

国民党顽固派在集中营里施展了政治欺骗和高压手段相结合的伎俩，一方面企图诱惑被囚的革命志士屈服变节，

另一方面以苦役饥饿、杖刑毒打，摧残折磨革命志士的身心。但是，广大革命志士并没有低头屈膝，他们在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且用零散的越狱乃至集体的暴动来对付其法西斯暴行。1942年5月25日，茅家岭监狱的26位革命志士，赤手空拳，决死搏斗，夺了武器，冲出了死牢，胜利地举行了茅家岭暴动，极大地鼓舞了集中营难友们的斗志。

1942年6月，日军向浙赣铁路沿线进犯，金华、衢县相继失守，玉山、上饶岌岌可危。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急忙由江西上饶撤退到福建建阳。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也随之被武装押送向闽北转移。

6月5日，被囚人员由江西上饶起程，第二天到达铅山县石塘镇。这时，日军已暂停南犯，仓皇逃命的集中营特工们，便借机在此喘息整顿。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也趁此良机，根据在上饶时确定的暴动计划，拟在迁闽途中伺机行动，由原新四军军事干部王羲亭担任暴动总指挥，并定下铁的纪律：不许个别逃跑，免得惊动宪兵、特务，以保证集体暴动的胜利。

6月15日清晨，队伍离开石塘时，特务突然将被视为危险分子的秘密党支部书记沈韬、支委周奎麟及黄刚培、王铁夫、汤定波等人单独捆绑押解，到崇安县大安乡后即用马刀活活砍死。这5位坚贞不屈的新四军战士，为了严守秘密，保证集体暴动的胜利，首先付出了血的代价。

由于5位同志被杀害，并估计到达目的地后国民党特工们一定还会来一次更残酷的镇压，秘密党支部当即决定：6月17日设法暴动，并确定了以陈念棣为首的新的暴动领导核心成员。

6月17日下午，队伍在崇安县赤石镇崇溪河畔等待过渡时，暴动领导核心成员迅速交换了意见，决定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发起暴动。当轮到第六中队过渡时，夕阳已近西下，先行过河的第一、二、三、五中队都已由特务、宪兵押走，对岸已没有敌特人员，渡河的次序又是被囚人员先行，宪兵压后，这真是难得的好时机。负责暴动指挥的王羲亭当机立断，把手一挥，高呼“同志们，冲啊！”该中队80多位革命战士，立即像弦上的箭一样射出去，向着山岗冲去。这是生死的冲击，冲上去，就是胜利，就是自由，就能重上前线继续杀敌立功！在这生死关头，暴动人员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这个跌倒了，那个过来一把拉起就跑；又一个趴下累得喘不过气来，另一个赶上来拖起架着又跑。年仅19岁的新四军战士瞿祖辉落在队伍的后头，自料难以脱身，就紧紧抱住国民党特务队长不放，任凭他刺刀猛戳，以掩护同志们突围，直至壮烈牺牲。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除13人牺牲，多数同志摆脱了敌特的追击，冲上了树林茂密的山岗，奔向武夷山老根据地。

在武夷山区，有长期坚持斗争的中共福建省委及其自卫武装。赤石暴动胜利的同志奔向武夷山，正是为了寻找

福建省委及其武装，正是为了回到抗日队伍中来。然而，处于闽浙赣边的武夷山区，这一时期也是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重点。在皖南事变前3个月，蒋介石在拟定“围剿”大江南北新四军的计划时，为了防备新四军“南进三山”（天山、黄山、武夷山）建立根据地或“远征闽浙，向南发展”<sup>①</sup>，就把对闽浙赣边区“清剿”作为整个计划的组成部分。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第三战区就在江西上饶召开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会议，进行“清剿”部署。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以急电密令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对闽省共党组织及其武装“即希分别负责彻底清剿”<sup>②</sup>，并在建阳县设立了“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对福建省委中心活动区域——武夷山区连续进行军事围攻。从皖南事变到赤石暴动的一年半时间里，共发动了四期大规模“清剿”，妄图摧垮福建党组织。为此，福建省委机关及自卫武装不得不一再转移。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福建省委在赤石暴动之前，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上饶、铅山一带就先后接应了从上饶集中营零星越狱逃脱出来的十几位新四军战士，陆续充实到省委自卫武装中去，成为其中的军事骨干。

当省委派出的在闽赣边活动的陈贵芳等人获悉赤石暴动的消息后，当即在上饶的禹溪、船坑，崇安的车盆坑、大

---

① 参见1940年4月9日项英致中央军委电；1940年5月2日陈毅、粟裕致中央电。

② 1941年2月21日蒋介石给陈仪密令电。

王垌以及闽赣边界的岭阳关、焦岭关、苦竹关等地设点，布置群众接应暴动出来的人员。

在陈贵芳等人分头寻找接应下，赤石暴动突围出来的人员与先前在上饶茅家岭暴动突围的新四军将士共46人，于6月底陆续集中到上饶禹溪外茶园。大家欢欣鼓舞，悲喜交集，有倒不完的苦水，表不尽的军民情。此时武夷山区正值青黄不接，乡亲们宁愿以野菜充饥，也要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留给婴孩煮糊吃的米，统统献给新四军同志。这些历尽磨难的新四军将士，当端起热腾腾的稀粥时，个个热泪盈眶。

老根据地人民的深情厚谊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他们不顾因受敌特残酷折磨而虚弱的身体，当即与闽北游击队组编成一支近60人的抗日游击武装，在队长沈崇文、党代表于咏皋率领下，活动在闽赣边区，积极准备抗击日军。

这本来给福建党组织创造了发展农村抗日游击战争的极为有利条件，但是，由于顽军的重重围困与连续“追剿”，当时福建省委的主要力量“被迫于建瓯顺昌不能一下集中”<sup>①</sup>，加上主持闽北特委工作的省委常委汪林兴，“本着本位主义”<sup>②</sup>，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想甩掉暴动突围出来的人员不管，因此，强调处境困难，擅自决定让他们自行到建（瓯）松（溪）政（和）地区找陈贵芳的队伍，或

---

① 《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草案）》，1947年1月15日。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1944年。

插到赣皖边去恢复老区工作，未能继续给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同志以必要的帮助，致使其中大部分人员自行分散转移，从而丧失了发展赣闽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良机。<sup>①</sup> 这些新四军同志在转移过程中，由于顽军重重围困，加上人地生疏，给养缺乏，因而在闽赣边的深山密林里整整转战了100多天，历尽艰难险阻，最后才回到了苏皖抗日前线，有的牺牲在途中。

当省委得知汪林兴的错误决定后，当即派省委军事部长左丰美及陈贵芳率部赴建松政地区追寻。部队从崇安出发，经浦城、松溪，过仙山岗到达政和西表村，一路上到处打听这些人员的消息，甚至兵分两路，采取军事行动暴露目标，试图与这些人员接上联系，但一直未能寻找到。只有4位因病留下的新四军同志，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过了阳历年才找到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太阳山。

中共福建省委对汪林兴的错误极为重视。在1943年初太阳山整风学习时，就将其作为党性不纯的一个严重问题提出，在省委领导成员和各地负责干部中进行讨论，并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为了使各级党组织今后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有所警惕，并为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省委在1943年2月5日作出的《第二次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中，还点名通报了汪林兴的这一严重错误，指出：“省委为了党纪的维持，党性的锻炼，特决定撤销汪林兴同志省委常委及

---

<sup>①</sup>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1944年。

基委之工作，请求中央批准，并希望他今后能在实际斗争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后来，省委在总结4年来斗争历史经验时，又重提了汪林兴“不支持新四军暴动出来的同志，故损失了许多良机”的问题，一方面对这一无可挽回的过失表示痛惜；另一方面，再次告诫各级党组织务必引以为戒，增强党性，顾全大局。<sup>①</sup>

赤石暴动的胜利，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趁机进行疯狂报复。1942年6月19日，即赤石暴动后的第3天，集中营宪兵特务从未参加暴动的队伍中抽出一批人，加上暴动后被抓回的共75人，押解到崇安县赤石镇附近的角亭虎山庙侧，分3批集体枪杀。除秦烽因宪兵慌忙开枪，子弹未击中要害，当场昏倒过去，后苏醒逃出外，全部殉难。据这位刑场上唯一的幸存者回忆，志士们临刑时人人视死如归，个个昂首挺胸，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年仅27岁的原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团部书记官王之燕就义前留下一首壮烈的诗：“浩气永长存，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虎山庙大屠杀后，集中营队伍继续南进，在反动基础雄厚、地形上又易于警戒的建阳县徐市镇扎下，作为集中营的新址。1943年7月间，因当地鼠疫流行，病死者日必数起，于是集中营搬迁到相隔10余里的建阳回瑶乡。该处住房狭窄，条件更差，病号骤增。为了躲避鼠疫，同年9月，

---

<sup>①</sup>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1944年。

集中营再次搬迁，移到崇安县城郊老鼠排村。

上饶集中营原先 760 余人，搬迁到福建省建阳徐市时，只 400 多人。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又陆续从东南各地搜捕了 270 余名共产党员和其他抗日爱国进步人士予以补充，包括三元（今三明市）梅列集中营（即“福建青年训导营”）因撤销而转囚过来的 33 名革命志士。迁到崇安老鼠排后，集中营缩编为 4 个中队。敌特继续以灌输反动思想毒素为主，并采取怀柔政策，诱骗自首，同时进行劳役折磨，大肆剥削侵吞被囚人员的劳动成果，以饱私囊。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内外形势发生急遽的变化。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关于和平建国的谈判。经过 43 天的谈判，于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包括释放一切政治犯内容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战时青年训导团”及各分团都宣布解散，释放被囚的政治犯。但是，国民党军政当局违背协定精神，在释放政治犯时又耍了花招，密令“战时青年训导团”电示东南分团：“凡思想顽固不能结训者，均移交当地司法机关办理”。按照这一指令，集中营特务头子卢旭、张超便亲自手喻：“最顽分子”郭大光等 40 人，以“危害民国”等案由移交给国民党崇安县司法处，该处又于 1945 年 10 月 16 日、12 月 9 日，将这 40 人分两批押解建瓯县城，交国民党福建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严加拘押”。其余被囚于崇安老鼠排集中营里的 200 余人全部释



放。至此，这个历时4年零8个月之久、恶贯满盈的人间地狱——上饶集中营，在武夷山下宣告彻底垮台。

##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

夏振铎

苏联红军从 1945 年 8 月 22 日进驻旅大，至 1955 年 5 月 31 日从旅大全部撤退，共计 10 年。这 10 年可分为苏军军管旅大 5 年和苏军驻防旅大 5 年两个阶段。1945 年 8 月 22 日至 1950 年 2 月 14 日，根据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为苏军对旅大实行军事管制阶段。1950 年 2 月 14 日至 1955 年 5 月 31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为苏军驻防阶段。旅顺口地区为苏联海军根据地，苏军解除对旅大的军事管制后，旅大的行政权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掌管。

苏军驻防旅大地区的境界为：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起，向东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陆路之界线，大连市除外。辽东半岛区域西方水面，在下列横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此横线系自北纬  $39^{\circ}$ ，东经  $124^{\circ}49'$  点起，至北纬  $39^{\circ}20'$ ，东经  $121^{\circ}31'$  之点止，将两点连成一线以后，转向东北普兰店方向，至其以南之陆路界线之起点。辽东半岛地区东方水面，

在下列曲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区，此曲线自陆路上界线终点起，向东经过北纬  $39^{\circ}20'$ ，东经  $123^{\circ}8'$  之点起，转向东南至北纬  $39^{\circ}$ ，东经  $123^{\circ}16'$  之点为止。

苏军驻防在旅大地区的部队有：陆军——三十九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5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十七师、十九师、机械化师；第二十五机炮师。空军——第五十五歼击机军及所属3个歼击机师、1个侦察大队和1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1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三十三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十四师。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陆、海、空、炮各兵种队，约30万人。

### **(一)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的政治形势**

苏军进驻旅大后，首先接受日军投降并解除日军的武装，把少将军衔以上的日军战犯集中看押，并忙于各处布防，安营设岗，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地方的治安暂由日伪警察维持。此时，旅大地区交通受阻，商行关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盗匪四起，枪声不断。1945年9月5日至9月22日，仅大连市内被抢劫的就有粮厂、煤场、木材厂、酱油公司、青果会社、油脂会社、山林、仓库、码头、飞机场等19处和24家居民住户。例如：9月5日，三春町汞银行各精米所均被抢劫；9月7日，亚细亚涂料厂被

抢，行抢人约千人，苏军开枪射击，打死 20 多人；9 月 12 日，石道街附近防空洞中有 106 名日本学生持刀、枪，残杀中国人 3 名。

1945 年 8 月 18 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和大地主兼资本家邵慎亭等人，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张本政等急忙拜见大连苏军警备区司令官，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得到苏军的许可，并领到部分枪支。（“自卫会”很快改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8 月 24 日，旅顺伪商会会长刘德智，召集旅顺商会临时董事长及豪绅、地主等地方头面人物磋商，成立了“旅顺地方治安维持会”。8 月 26 日，伪金州商会会长曹世科组织一伙日伪残余分子，成立了“金州民众临时维持会”。此时，旅大地区的政权被“维持会”所掌握。这些“维持会”的头头，过去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时又借混乱之机，夺取政权，残害百姓。

1945 年 9 月初，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派汪渔洋来大连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汪渔洋到大连后，立即求见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要求在大连建立市党部。苏军当局表示同意后，汪渔洋加紧在全市建立分党部，委任区分党部书记，发展国民党党员。9 月 10 日，公开挂出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成立不久，苏军当局发现他们进行反苏宣传，收集军事情报，于 10 月下旬将其以非法组织予以取缔）。9 月 21 日，罗大愚又指定刘启华到金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9 月 25 日，国民党金县党

部成立。该党部成立后，迅速在“维持会”中发展伪官吏、劣绅、伪警察入党，操纵“维持会”进行颂蒋盼蒋宣传。9月22日，刘启华到旅顺组织国民党旅顺区党部，任命郭弘历、刘铭志为执行委员。

随着国民党的活动，各种反动会道门也大肆活动起来。九宫道以“神鬼天机”、“大难临头”等谣言，欺骗群众。一贯道大连帮坛主胜德宝哄骗道徒说：“苏联是寅癸水，中央军是戊己土，日本是丙丁火，美国是庚申金，真金不怕火炼，所以美国打败了日本”。“旅大已成为水湾，四面已被戊己土包围，里面净是些鱼鳖虾蟹（诬指苏联红军）”。在一贯道《快快看》小册子中宣传：“赤猴法轮一转，中国魔王来大乱”等反苏反共言论。

在群魔乱舞的同时，中共大连“抗盟”分会在总支委员会的张世兰、张寿山等共产党员率领下，于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连夜赶写欢迎苏联红军、庆祝解放等标语，贴遍大连市各交通要道。8月26日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决定组织武装，配合苏军维持社会秩序。此时，中共胶东大连支部的共产党员左友文、赵恩光等人，也领导工人武装队伍，与维持会等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日本侵占旅大期间与党失去组织关系的唐韵超等人，在苏军进入大连后，也立即聚集在一起，发动组织工人群众，并于9月2日在唐韵超、张洛书的积极筹备下，大连市职工总会宣告成立。在大连市职工总会的领导下，52个大型厂矿建立了工会，发展会员2万多人；700多工人组成了护厂队，有效

地维护了各厂区的秩序。苏军当局对大连职工总会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发放 500 万元救济金，帮助工人解决口粮问题。9 月 7 日，中共胶东区委派出的长山列岛工委书记郭壮带领 14 名武装战士组成小分队抵达旅顺。郭壮等人以旅顺劳苦群众成立的“民众联合会”的名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虽然共产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领导各群众组织协助苏军维持社会秩序，但由于尚未建立起统一的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机关，仍控制不了整个旅大地区的局势。

## **（二）苏军支持中共旅大党组织建立党、政、警、群机构**

1945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会见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交涉有关中共山东部队乘船到东北，路过大连请给予方便等事宜。同时，韩光与高兹洛夫还对尽快派干部到旅大、建立市委市政府等问题，进行了交谈。高兹洛夫提出要派市委书记，派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公安总局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民政局长、广播电台台长和报社主编等。

1945 年 10 月 12 日，韩光乘高兹洛夫中将派的军用飞机返回沈阳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等做了汇报。东北局领导认为大连形势很好，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迅速开展工作。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并由韩光带领一批干部来大连组建旅大党政警群机构。11 月中旬，在苏军当

局的支持下，旅大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中共大连市委成立。根据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大连市委没有公开。

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后改为大连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局长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选派的赵东斌担任，由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司令高兹洛夫中将亲自签发了委任状。韩光兼任公安局的政委，对外以训练处主任的身份公开活动。11月8日，大连市政府宣告成立。根据对外斗争的需要，苏军当局任命当地大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副市长由中共大连市委推荐以职工总会代表面目出现的陈云涛担任。大连市政府成立后，旅大地区的“维持会”遂告解散。

在组建市政府、公安局前后，中共大连市委还派干部组建了市中苏友好协会、市妇女建国会、市青年联合会，并加强了先期组建的大连市职工总会等群众组织。在搭起党政警群机构架子的前后，中共大连市委又将大批干部派到县、区和各机关、学校、电台、报社和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从此，旅大地区变成由苏军军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 **（三）苏军配合中共旅大党组织粉碎国民党 妄图接收旅大的阴谋**

苏军进驻旅大后，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图谋染指旅大。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同苏军当局会谈，提出：国民党政府决定海上船运军队由大连港登陆，到东北接防。苏军当局明确表示：大连为自由商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10月17日，熊式辉再次与苏军

当局会晤，提出：要在大连设立航空站，通过航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苏军当局予以拒绝。

海上登陆不成，国民党政府又试图派官员来大连接收。国民党政府早在9月任命的大连市长沈怡，拟定于1946年2月初到大连走马上任。为了对付国民党接收大连的图谋，中共大连市委与苏军当局商定，把大连市的区域缩小，成立大连县。以防万一交出大连市行政权时，尽量减少损失。1946年1月30日，在甘井子区召开大会，宣告大连县政府正式成立。这时，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沈怡等人，闻讯大连有8000多人组成的武装纠察队，多次请求苏军在安全上予以保证，但都被苏军当局拒绝。因此，沈怡不敢轻举妄动，接收大连之图谋遂靠破产。

接收大连失败，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中旬通知苏军，准备6月初派“视察团”来大连。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意在寻找外交借口，要求派军队插足大连，并携带大批东北停止流通（仅旅大地区使用）的苏军军用货币，妄图冲击旅大市场。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视察”阴谋，苏军通知中共大连市委，应立即准备“迎接”，并提出旅大地区通用的苏军军用货币，要贴上帖、加盖印章，限5天内限额兑换完，逾期一律作废；“视察团”来后不作任何群众性的表示，反美、反蒋、反视察团的事件不准发生等具体措施。中共大连市委通过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冷静分析，认为：这次反“视察”的斗争，在形式上是苏军与国民党政



府的一次外事较量，实质上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争夺旅大地区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经过分析，中共大连市委决定：对“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办法和“不冷不热”、“明争暗斗”的政策；有效地制止未加盖印章的苏军货币流入市场，保护旅大地区金融经济稳定；整顿市容，布置交通岗，不发生请愿示威事件；调拨库存粮食投放市场，压低粮食价格；报纸上不刊登反美、反蒋、反视察团的文章。

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率“视察团”一行12人，乘长治号军舰抵达旅顺港。中共大连市委与苏军当局密切配合，抽调170多人的工作班子，进行“接待”工作。“视察团”在旅大地区进行10天的“视察”，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铁道工厂、大连船渠厂等处。在中共大连市委的周密部署和巧妙安排下，使“视察团”未抓到任何把柄，他们带来的苏军军用货币一张也未用上，插足大连的阴谋彻底破产，于6月12日灰溜溜地离开了旅大。

#### **(四)苏军支持中共旅大党组织把旅大建成隐蔽的后方基地**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各解放区军民奋勇抗击，急需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要尽快抽调干部到大连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和组织军工生产。先后来大连的各解放区的干部，在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帮助和苏

军的支持下，采购了大批医疗器械、医药、被服和军火，源源不断地运往各解放区。与此同时，中共旅大地委（1946年7月，大连市委改为中共旅大地委）还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大连钢铁厂和大连化学厂，组建兵工厂生产军火，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

市公安局成立后，中共旅大党组织从各解放区来旅大的干部和指战员中，选调大批人员充实市、县、区公安局。与此同时，清除了反动的旧势力。经过这番改造，市公安局及所属的武装警察部队，实际上已变成穿警服的党的军队。这支队伍不断扩充，并不断地调往前线（先后达13400余人），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当时，在中共旅大党组织的请求下，苏军在武器、弹药方面对武警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犯到瓦房店、普兰店一带，因石河驿以南驻有苏军，不敢贸然侵犯，但对石河驿以北，普

兰店、貔子窝以南的解放军根据地曾多次发动进攻。苏军应解放军的请求，以猛烈的炮火予以还击。国民党军队的炮弹有时打到苏军岗哨防线以内时，苏军便提出严重抗议。为此，国民党军队指责苏军违反中苏条约规定，袒护中共部队。苏军对此置之不理。当解放军伤员需要撤到旅大地区医疗时，苏军仍给予支持和方便。

1946年至1947年间，中共山东解放区多次派遣部队和地方干部，秘密从旅大海域登陆，在苏军的支持和帮助下，安全到达了东北解放战争前线。

#### **（五）苏军援助中共旅大党组织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由于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企业纷纷关闭，大批工人失业，致使旅大的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的严峻局面。特别是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到11月间国民党军队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地区，对旅大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旅大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来源被切断，当时有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人民要靠吃野菜和豆饼才能果腹。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旅大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947年初，中共旅大地委做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的《关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

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高，到1948年底，粮食产量达20.8万吨，基本解决了全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此间，苏军为援助中共旅大党组织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海路，经过北朝鲜港口，向大连提供粮食、植物油、食糖、罐头和蔬菜等，由人民政府以固定的价格分售给旅大人民。中共旅大党组织派人从北满采购了7万吨粮食、2万吨煤，运输难解决，苏军及时帮助解决了运输问题。苏军为了帮助政府多开辟一些生产门路，把缴获日本的轮船送交旅顺市政府，从事水上运输，往返于旅顺和烟台之间。此外苏军还派士兵押运食盐去外地换粮食等等。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1947年初，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商定搞中苏合营企业。同年4月，中苏双方签署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盈利按股金比例分成。中苏合营企业主要有以下4个公司：

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经营大连造船厂。当时，全厂有3000多名工人，年修造船能力为30万吨，中方无生产任务给它。苏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的大批船只，正需要修理。此外，苏联为了发展沿海渔业，还需要建造大批500—600吨的拖船。这样，苏方运进钢材，中方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为苏联修船造船。

中苏合营石油公司，经营甘井子石油加工厂，年加工原油能力 8 万吨。苏方运进原油，加工出的汽油、柴油，苏军就地利用，副产品沥青，由地方修路和建筑用。

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包括的工厂除几个发电厂外，还经营金属机械等 30 多个大中型工厂。发电厂供应全地区用电，其它各厂生产的产品有水泥、平板玻璃、麻袋、玻璃器皿、陶瓷制品、搪瓷制品、各种罐头、糖果和豆油等等。这些产品一部分满足旅大市场，一部分销往苏联。

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经营大连、旅顺、金县的几个大盐场。合营前，这些盐场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盐工一度靠政府救济生活。合营后，盐的产量较高，盐工盐民个个喜上眉梢。

4 个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中苏合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

到 1949 年，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并在苏军的援助下，基本解决了旅大人民的温饱问题，物价平均降低了 40%，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 **（六）苏军创办的中文报纸《实话报》**

苏军驻旅大地区总指挥部，为了介绍苏联的各方面情况，反映旅大地区的民主建设，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于 1946 年 8 月 14 日，创办了中文报纸《实话报》（该报历时 5 年，于 1951 年 8 月底终刊）。

《实话报》的新闻报道方针是：为了避免同国民党政府

外交上的麻烦，1948年以前，很少报道中国解放战争的消息，对于中共正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一般不用，在必须报道时亦持谨慎小心的态度。1948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报纸开始更多地刊登新华社的电稿，但在选用时仍有删节，用词也很斟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则不加删节地选用新华社电稿。如1948年11月3日报纸上刊载了新华社沈阳前线2日急电，报道“东北野战军今天完全攻克沈阳，东北全境已庆获解放”的消息。

宣传苏联是《实话报》的主要任务，以比较多的篇幅全面系统地介绍、报道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在报纸中占的分量也很大，通常是采用系统的通俗的连载、讲座、专论等形式。

在国际时事方面，着重宣传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揭露新战争的危险。对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也有所报道。例如曾详细地报道了1949年4月召开的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各国代表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情况。1949年5月9日，以显著版面刊登中共旅大区党委第一书记韩光《拥护世界和平运动》的文章。

宣传中苏友好也是《实话报》的一项重要内容。1947年8月14日，即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周年时，《实话报》用一个整版篇幅，发表社论及有关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在全国掀起反苏反共浪潮，企图转移人民对国内形势的注意，并想把内战扩大到旅大地区，破坏旅大地区人民的和平生活等反动行径。

1949年7月在北平中南海举行的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成立大会，该报也曾作了显著的报道，并发表了题为《中苏人民友谊之生长和巩固》的社论。

《实话报》地方版虽然篇幅有限，但对旅大地区的民主建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情况，也及时地作了简要的报道。

### **(七) 苏军处理同中共旅大党组织关系的基本政策**

苏军军管旅大的5年，处理同中共旅大党组织关系的基本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苏军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需要照顾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所承担的义务，形式上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进行干涉、限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在客观允许的情况下，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尽力支持，帮助共产党在旅大地区发展力量，掌握政权。

苏军进驻旅大的前4年，旅大地区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由苏军过问、审定（包括市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的安排）和同意。对土改问题控制很严，有的地方召开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苏军直接出面干涉。而旅大苏军警备司令部所实行的各项重大措施，都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因此，苏军要求中共旅大党组织作某些事，只能服从和执行，一般不能问为什么，不准拖延，更不准更改或搁置不办。

苏军对旅大的宣传工作监督很严，特别对电台和报纸尤为关注。苏军新闻检查官每天进行严格的审查，他们不同意发的稿件不能发，有的稿件还亲自动笔修改。总的要

求是：在宣传上要以地方自治面貌出现，不得暴露在旅大有共产党，也不得攻击国民党蒋介石。

苏军在旅大军管期间，虽受《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支持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在处理与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关系中，也能注意改正自身的错误，维护中苏之间的友谊。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对其中少数士兵酗酒闹事，强奸妇女等违纪行为经中共旅大党组织多次提出批评后，也极为重视，采取认真破案、严惩不法军人、整顿军纪和从国内调部队换防等一系列措施，到1946年下半年，苏军纪律明显好转。

1948年至1949年末，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美蒋反动派在中国已经日落西山，苏军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更积极的支持。1948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决定将当时在旅大地区通用的苏军军用币改为由关东银行发行的地方性新货币，取得了苏军的谅解和支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旅大区党委（1949年2月，旅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向苏军通报：将旅大党组织向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苏军立即向远东军区司令部做了汇报，3月初回复赞同。4月1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全地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与全市人民公开见面。苏军应邀派了6名中校、2名少校列席了大会。4月，中共旅大区党委对以迟子祥为主席的关东公署提出改组意见，苏军当局对此表示同意。于是，4月27日，召开了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将迟



子祥等人从政权中清洗出去。8月2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决定，当年冬在全旅大地区实行土地调剂（即按新区土地改革），苏军也未干涉。

#### （八）中共旅大党组织处理同苏军关系的政策与原则

苏联出兵东北进驻旅大后，东北问题成为国内外不同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美的外交纠纷，全世界的注目”。“因我党我军在东北之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东北，顺利接收东北政权，美方已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中苏外交发生了危机，这是一个世界性斗争，必须首先取得主动地位，在外交上站稳脚步”。因此，必须“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这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对中共旅大党组织也作出指示：旅大是苏军军事管制地区，中共在大连的工作，对外政策上发言权很小。对内政策上也要和苏军充分协商，取得谅解。因此，既要放手开展工作，又要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总之，要注意大连的特殊情况，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共旅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

①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中，斗争方式不采取戴高帽游行等做法。苏军进驻初期，群众在马路上或场院上公开斗地主，苏军怕美蒋特务或外国记者拍照宣传出去，说苏军违背中苏条约，支持共产党斗地主。因而，出面干涉，

甚至派兵包围会场，鸣枪制止。为不授美蒋以柄，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苏军便再不干涉。

②人民警察着特制警服，戴警衔。旅大公安机关建立初期，人民警察没有统一着装。由于旅大地区的特殊性，公安机关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又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人民警察。为了隐蔽武警是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突出地方的“自治性”，明确地方人民警察与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区别，有利于工作和同苏军联系方便，中共旅大党组织决定：自1946年5月1日起，人民警察按警衔着装。

③中共旅大党组织和各解放区来大连经营的支前军工和“党产”企业以民间“公司”、“商行”面貌出现。当时，旅大地区所有企业都采取公司经营办法，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政有明确分工。

④刑事案件按法律程序处理。当时，其它解放区，对于刑事案件，通常开个群众大会就解决了。而旅大是公安、司法、检察机关联合协作办案，按法律程序处理。

⑤共产党干部都以合法的面貌出现。共产党的干部进城后，改变解放区的着装，西服革履，礼帽长衫，粗布衣裤的军装不见了。

⑥宣传上以地方自治的面貌出现，不授美蒋以柄。

中共旅大党组织在特殊的环境里所采取的这些工作方式，是根据我党与苏军双方均能接受的原则，也充分考虑到苏联政府一旦允许国民党接收旅大政权，能够有利地同国民党周旋。至于中共旅大党组织内部的思想组织建设，

工作方法与作风，完全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它解放区一样。

中共旅大党组织在处理同苏军关系中，还坚持这样几条原则：①对苏军某些人员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不一味容忍迁就，而以同志式的态度，提出严肃认真的批评。②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出现不同意见及时交涉。③认清共同利益所在，求大同存小异。④注意在实践中向苏军方面学习。

中共旅大党组织由于坚持这些原则，虽然同苏军交往中有时发生一些分歧和争执，但最终都较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 **(九) 中苏友好协会的主要活动**

早在1945年9月，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为蒙骗苏军，打起中苏友好的旗帜，在其提议下，成立了大连中苏友好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成立后，解散了维持会，中苏友好委员会便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并于11月中旬，改名为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其宗旨是：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出发点，由各方人士来协助巩固中苏人民的友谊；并由各方将其社会文化生活介绍给对方；以宣传巩固世界和平及远东和平为基础，动员一切力量巩固中苏两国永久和平及友好。1945年底，会员达3500多人。

1946年初，中共大连市委为加强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工作，派中共大连铁路局党委书记陈瑞光到中苏友好协会任副会长兼党组书记，主持工作。1947年4月10日，中共

旅大地委做出《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指出：促进中苏友好，是旅大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党应将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视为实现这一重要政治任务的主要方式之一。4月25日，旅大地区中苏友好协会的统一组织——关东中苏友好协会宣布成立。从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期间，中苏友好协会积极宣传中苏两国人民加强友好合作的重大意义，在全市各行各业中先后建立831个分支会，发展会员22万余人，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苏同志间的友好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4月，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第一本月刊杂志《中苏知识》，它以交流中苏文化为宗旨，促进中苏友谊为目的，在广大群众中颇受欢迎。

1946年夏，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了中苏友好文化交流活动周。中苏双方均派出了由文化艺术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交流活动。苏联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音乐和舞蹈节目，还展出了许多件名贵的油画和各种艺术品，使旅大人民从中进一步了解了苏联。东北文工团演出的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大型歌剧《白毛女》，现代话剧《雷雨》、《日出》及流行于解放区的秧歌剧等，吸引了广大进步青年。

1947年8月，为配合“八一五”、“八二二”等重大纪念活动，中共旅大地委发出了开展“回忆运动”的指示。22日这一天，市政府广场上（今大连市斯大林广场），汇集了无数的群众、秧歌队和中苏友好协会及民主青年联合会组

织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了活报剧《大翻身》，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据 1949 年 9 月统计，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4 年来，共举办图片展览 183 次，参观人数 34 万人次；放映电影 716 部，观众达 208 万人次；组织报告会 2243 次，听众 115 万人次；召开座谈会 2950 次，参加人数 105 万人次；办识字班 58 期，参加学习人数 2 万余人。

#### **(十)中苏组成联合军事委员会共管旅顺口地区的军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从此，苏军根据《协定》规定，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除军事事务外，一切由旅大地方政府做

主，苏军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和睦相处，出现了友好共事的新局面。

1951年3月24日，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军事代表团主席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及全体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中国军事代表团主席肖劲光、副主席贺晋年及全体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军事代表团随员斯维尼英中校、阿布拉莫夫少校；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定，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担任第一年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本次会议主要商讨了以下几个问题：①审议确定旅顺口区域内苏联军事指挥部与中国地方当局相互关系问题。②规定苏联和中国公民与军人以及外国籍人员进入旅顺口区域的手续和由这个区域出境的手续。③确定旅顺口区域和海军根据地海上和陆上的境界。④规定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在旅顺口区域境内飞行的管制办法。⑤制定苏联、中国及其它国家之非军用船舶在海军根据地领水境界内航行手续以及中国军用船只进入海军根据地领水的手续。⑥制定在旅顺口区域内苏联军人和公民与当地中国居民之间所发生问题的公民法权问题的手续。本次会议还研究了其它军事事宜。从此，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务由中苏双方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

### **（十一）苏军帮助中国海军培训潜水艇部队**

为了建设新中国的潜水艇部队，1950年10月8日，毛

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由于中国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和巩固国防，我们已制定中国海军3年建设规划，须向你请求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望提供作战训练用之小型潜艇2艘，并希望来华之潜艇配备1艘的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至1953年期间，在旅顺口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艇员。1951年于旅顺口先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中国艇员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

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口潜水艇分队学习。1951年5月14日，旅顺中国海军潜艇学习队正式开训，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

开训后，学习队的指战员，处处尊重苏军，团结友好，虚心学习，刻苦训练。苏军也积极热情地、毫无保留地从各方面传授经验。开始因语言不通，限制了双方的感情交流。后来，通过双方举办联欢会、座谈会、友谊竞赛等活动，在一起出航，一同操炮的过程中，逐渐密切了两军同志之间关系，加深了两军官兵的友谊。出海时，苏军艇员给学习队学员穿工作服，并站在前面挡风。学习队学员归航后，主动帮助苏军艇员保养潜艇。早晨见面时，互相敬礼，主动握手问好；晚上休息时，互相问候。学习队学员碰伤休养时，苏军教官携带水果进行慰问。学习队学员联

名赠给苏军教官纪念册，正面写着“苏军同志：我们保证将你们教给的技术，永远巩固住，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经过2年多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学习队学员在苏军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潜艇航行和作战的技能。

中国党政军领导人非常关怀旅顺潜艇学习队的学习情况。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秋和1953年2月，两次来旅顺口看望中国潜艇学习队学员和慰问苏军教官、艇员，先后视察了“秀克”艇和G-121艇。1953年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元帅视察了学习队2号艇。同年，彭德怀副总司令视察了1号艇。

1954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旅顺学习队的全体艇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潜水艇部队的开拓者。

## **（十二）苏军加强与旅大人民的团结友谊**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促进了中苏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军为保卫新中国和世界和平事业在旅大地区站岗，在旅大人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苏联，宣传苏联，向苏军学习的群众运动。

与此同时，苏军政治部对苏军官兵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中国人民站岗的宣传教育。苏军在旅大驻防的5年中，广大苏联官兵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模范事迹不断涌现，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诸方面，都给予旅大人民以巨大的帮助。



苏军专家在中苏合营企业中，帮助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绘图、设计、焊接等技术；在李索夫的培养下，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女火车司机。

苏军在驻防的广阔农村和海岛上，与当地农民、渔民友好相处，亲如一家。春耕时节，苏军拨出战马，帮助农民往地里送粪、耕地；夏天天旱时，苏军派出军车运水上山，帮助农民浇灌禾苗；秋收时，苏军官兵和农民一起收割庄稼。农民买了拖拉机不会开，苏军战士手把手地传授拖拉机的操作技术。农民办起畜牧场，苏军赠送良种乳牛，派人传授饲养经验。渔民生病受伤，苏军军医亲自上门诊治。在山村，在海岛，到处都留下了中苏军民深厚友谊的感人事迹。旅大人民衷心感谢苏军的真诚相助，当时流行民间的一首渔歌里唱道：“蓝蓝的海上飘白帆，无边的波浪闪银光，苏军驻在旅顺口，咱年年月月享安康。”

苏军在旅大地区驻防，与文化、卫生、艺术界工作者也有着深厚的友谊。苏军创办的中苏医院，不仅以精湛的医术和人道主义精神为旅大人民服务，同时，对旅大地区的中国医务人员来说，也是一所大学校，这里的苏联军医经常为中国医务人员讲授巴甫洛夫学说，传授苏联的医疗技术。苏军歌舞团经常与旅大文艺工作者同台表演，相互交流艺术。苏军为了帮助旅大地区人民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赠送许多电影放映设备。苏军创办的《实话报》向旅大人民传播了通俗的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苏军驻守旅大，为保卫中国和世界和平事业站岗的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中国艺术家，激发他们进行创作。艺术家卢鸿义教授雕塑的苏军战士铜像，高高竖立在苏军烈士纪念塔上，放发出夺目的艺术光彩。

### **(十三) 苏中军队交接防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中国台湾海峡。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会谈公报，并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报》和《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换文》指出：为了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公报》公布了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等协约。联合公报规定：苏联军队将于1955年5月31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

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担任接收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1月14日，三兵团先遣人员由副司令员曾绍山率领到达大连。不久，三兵团陆续进驻旅大地区，并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的番号。2月至5月期间，中

共中央军委又调铁道公安部队、沈阳市公安总队和公安十一师，并从全国海军和空军部队抽调 10 多个连队和 4 个培训团，陆续进驻旅顺口，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口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部队进驻旅大地区后，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旅大地区的防务，迅速地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 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的协助下，举办了由 15000 多人参加的 200 多个训练班，主要从技术上培训指战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军委组成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淇、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邱创成、刘丰等为委员。

2 月 16 日，中苏接交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在交接过程中，为预防突然事件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和苏联红军三十九集团军共同拟定《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方案规定：4 月 16 日零时前，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的防务由苏军负责，中苏军队统由苏军指挥；4 月 16 日零时后到苏军撤离止，该地区防务统由中国军队负责，中苏军队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指挥。

中苏双方接交防务工作，从 2 月 22 日起到 4 月 15 日结束。1955 年 4 月 15 日 13 时，中苏双方举行交接签字仪

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员罗华生，空军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五十五军参谋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后，一切防务交由中方负责。

接收军事设施与装备工作，在3月7日到5月15日期间进行，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接收的装备有：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自行火炮）357辆。空军——各种飞机328架。海军——依尔28水鱼雷艇39艘和其它舰艇19艘，岸炮66门，高射炮122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以上为有偿设备，由中方付出人民币9.4亿元。交接的无偿设备主要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另有基地所属的仓库、医院、修理所等，约值人民币4亿元。

5月24日下午，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中苏双方有邓华、刘亚楼、曾绍山和什维佐夫、图兰达也夫、库德良乐夫。中苏双方签署了《交接证书》。至此，中苏接交防务全部结束。

#### **（十四）旅大军民热烈欢送苏军回国**

苏军进驻旅大10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当苏军即将回国时，旅大人民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送别活动，表达对苏军的感激和友谊。

1955年2月22日，以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

聂荣臻、郭沫若为副团长的大型慰问苏军代表团抵达大连。当日下午，在人民文化俱乐部隆重举行慰问苏军大会，彭德怀为苏军高级将领佩戴“中苏友谊章”。

2月23日，在旅顺举行了“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彭德怀率领慰问团全体成员及旅大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及驻旅大地区苏军高级将领参加了奠基典礼。中苏友谊塔是国务院决定在旅顺兴建的，目的是感谢苏军驻旅顺口地区10年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纪念苏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和中国居民间的深厚情谊。1956年10月，中苏友谊塔落成。

3月27日，苏军与旅顺人民在白玉山营造了“中苏友谊林”，它象征旅大人民和苏军相处10年结成的友谊将世世代代相传，万古长青。

5月7日，旅大人民募捐7万万元（旧人民币）重新修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在大连市落成。苏联红军那威武高大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旅大人民的心中。

从2月至5月末，旅大人民与苏军开展的座谈、联欢、慰问、送别、会餐和互赠纪念品等友谊活动接连不断。在送别的日子，中苏双方军民都依依不舍，用最美好的语言表达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旅大地区的妇女，纷纷绣制各种精巧的手帕、枕罩、荷包等礼品，赠送苏军家属。中国小朋友听说同院、同校的苏联小伙伴就要跟爸爸妈妈返回祖国时，把最好的玩具、最喜欢的食品送给苏联小朋友，

表达依依惜别的纯真感情。

苏军从3月1日开始，分别从驻地陆续撤出回国。苏军每走一批，都由接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送行。5月8日，旅大各界代表10万多人在大连斯大林广场举行盛大的欢送苏军回国大会。旅大市党政领导人和苏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共旅大市委（1949年10月，旅大区党委改为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在讲话中说：苏军进驻旅大10年中，无论任何时候，都向旅大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旅大人民将永志不忘。

5月26日，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启程回国。旅大各界代表2万多人在大连火车站前广场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陪送苏军最后一批人员到石河车站。至此，进驻旅大地区的苏联红军全部撤离回国。

## 张闻天在东北的知识分子工作

施松寒

抗战胜利以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从1945年11月至1950年2月的4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在东北工作期间，张闻天不仅参与提出了指导东北全局工作的基本方针，对开辟和建设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又及时、系统地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向城市作战略转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里，仅就张闻天在东北的知识分子工作做一些回顾和探讨。应该说，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时期，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楷模。他在这方面的不少感人的事迹，会启发人们去思考，去学习，去借鉴。

张闻天在做东北地方工作中，不论在宁安、在合江、在哈尔滨、沈阳以及后来在辽东，一贯重视知识分子，大胆、正确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发挥他们在各项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建成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也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由于东北的特殊情况，如何认识东北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专家，成了当时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在日伪统治下，知识分子受了14年的奴化教育，又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有盲目的正统观念，对我们党持怀疑态度，应该属于敌伪残余势力。对东北的知识分子状况究竟应该怎样估计？张闻天进行过专门调查，作出了科学分析。他认为，东北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甘当亡国奴、汉奸、特务的是极少数。我们不能把他们都划到敌对势力那一边，而应该争取他们。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提高认识，是可以把东北知识分子争取过来为人民服务的。张闻天还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待俄国资产阶级专家和沙俄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争取东北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当时沙俄的知识分子，是在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持有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怀疑和不满，甚至有人参加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活动。但是，列宁明确指出，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下，是能够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应该争取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这对苏维埃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实践证明，列宁所采取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



的，效果也是好的。

## 热情关怀 积极引导

张闻天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对青年知识分子尤为关怀。他从青年以后要撑大业的高度指出，青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革命事业要由青年来继承。当前，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等一系列工作需要大批干部，培养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我们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否则，不能适应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他主张办短期干部训练班，就象延安时期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那样。通过学习，使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高思想觉悟，加入革命行列。

在指导创建牡丹江根据地期间，牡丹江市按照张闻天的指示，于1946年3月举办了“行政干部训练班”。张闻天在工作紧张繁忙、斗争尖锐激烈的状况下，还亲自到训练班讲课。在讲课之前，他总是准时由宁安途经40多公里来到牡丹江，从不让学员等他一分钟。他坚持每两三天讲一次，一次讲半天，直到一个月训练班结束。张闻天从“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国民党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的卖国行径，讲到在日寇铁蹄践踏下，沦陷区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从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倡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起抗日，转战南北，讲到全国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和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从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对建设新中国的和平诚意，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sup>①</sup>，搞假和平真内战，进攻东北，讲到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对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讲课深入浅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形象生动，道理深刻。讲得青年们眼界顿开，热血沸腾。热爱祖国、渴求真理的东北青年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正确、系统的讲解，受益匪浅。许多青年深切地说，张闻天同志的讲课，给我们指明了人生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是我们走向革命的启蒙导师。学员们不再相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克服了盲目正统观念。他们敬佩共产党为民族、为人民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参加了革命队伍。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短期的教育训练，少数充实到新政权取代了那些表面对我们唯唯诺诺，背后充满敌意的“三朝”（中华民国、伪满、国民党）元老；更多的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成为建设根据地的一支生力军。

在宁安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国民党和我们争夺青年知识分子的斗争十分激烈，宁安学院是双方斗争的一个阵地。张闻天建议创建的宁安学院，是为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废除日伪奴化教育，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而由几所中学合并而成的，除设高中、初中部外，还开办培

---

<sup>①</sup> 指国共双方代表经过43天的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的会谈纪要，即《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养在职干部的干部班。张闻天亲临学院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刘英（时任中共宁安县委副书记）按照张闻天的意见，以宁安学院为基地，做了大量发动、团结、教育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成效明显。

当时，宁安县的三青团、兰星社等反动组织的一些人也混进宁安学院。他们在青年学生中散布谣言：“国民党中央军要来接收牡丹江”，“共产党呆不长”等等。兰星社甚至公开出版油印小报，用短文、诗歌等形式污蔑共产党，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妄图把青年引上反革命的邪路。他们的种种破坏活动受到了我们有力的反击之后，这个反动组织便使出最后一招，阴谋对张闻天下手。他们分头在耶稣教会地下室和江桥附近召开秘密会议，具体策划进行暗杀的各种准备。据罪犯白雪岩 1946 年 5 月 1 日供认：“距离现在约一个半月”，我们几个人把“炸药装在玻璃棒子里，晚上放在教室的讲台底下，炮〔捻〕子通在墙外边，赶到第三天张政委（即张闻天）上政治课的时候，在外头点着，就能炸死他”。他们的罪恶活动，及时被我警卫人员发现并清除了炸药。在场的师生对此非常气愤和吃惊，而张闻天却镇定自若地按计划继续讲完全部课程，给广大青年留下难忘的印象。

除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干部班外，张闻天更加重视让青年知识分子在土改的火热斗争中锻炼成长，把它作为团结、造就青年知识分子的一条重要途径。

青年知识分子热情高，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和革命道理，但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也不太了解。出身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困惑，他们开始下乡搞土改的积极性并不高。在老干部中，也有人存在疑惧甚至排斥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思想情绪。针对上述情况，张闻天指出，对一切可能团结的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接受考验，转变思想，提高觉悟，相信他们的大多数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张闻天还专门作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的报告，强调只要背叛剥削家庭的阶级立场，真正为农民翻身而工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前途同样是光明的。各县土改工作团根据张闻天的指示，采取边工作边集训的形式，认真学习有关土改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讲明工作团员必须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许和地主女儿恋爱结婚；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通过教育，特别是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46年11月17日，依兰中心县委书记给张闻天的书面汇报中说，土改工作团员（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在几个月的群众工作中，参加农民诉苦会、批斗地主等实践活动，看到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倒地主反动势力，全心全意为农民谋利益，很受教育，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原来，他们怕艰苦，怕土匪，工作不安心。现在，他们和贫雇农交上朋友，有了阶级感情，激发起对地主阶级罪行的痛

恨，还自己动手去抓捕恶霸地主。有的青年知识分子坚决地和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立场鲜明。依兰土改工作团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土改，转变思想感情，提高阶级觉悟的基本状况，反映了合江省各地土改工作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思想面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成土改任务后，成为革命干部，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由于合江省委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全省培养了5000多名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这在当时当地是非常可观的。他们为建设巩固的合江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同志经过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现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 坚持原则 灵活掌握

张闻天不仅对青年知识分子关心爱护，而且对伪满遗留下来的专家学者，也给予正确对待，大胆灵活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张闻天刚到合江主持省委工作时，摆在他面前一个非常严肃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对伪满时期佳木斯伪市长段宝坤，是杀还是留？争议很大，究竟何者为上策？

1945年4月日本临近投降时，把段宝坤推出来当了135天的伪佳木斯市市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他被佳

木斯市大同盟<sup>①</sup>组织抓了起来。在讨论对段的处理问题时，一种意见认为，段主要是搞技术业务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失败之前，出于策略的需要，推出他当市长，段的受任并非他四处钻营所致。他任职时间短，民愤不大，我们又急需这样掌握煤炭技术的专家，主张让段去开采双鸭山煤矿，带罪立功。另一种意见则不同，他们认为，比段宝坤小得多的汉奸都镇压了，不枪毙他，群众通不过。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张闻天听取各方的汇报之后，以严肃认真、谨慎持重的态度表示：问题不在任期时间长短，而要看段宝坤到底有没有血债。并指示有关部门迅速查清。与此同时，他亲自查阅段宝坤的档案，得知段于193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煤系，回国后，在新京（长春）伪实业部历任雇员、资料科科长、技师等职，曾于1931年和1935年撰写过《铁矿的浮油选矿》、《东北地质浅说》两本专著，没有发现任何血债。张闻天一贯作风民主，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他决定召开专门会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反复开展讨论。之后，他讲了自己的意见。张闻天说，镇压段宝坤很简单，我们决不吝惜那么一粒子弹。请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既然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就不能把段宝坤改造过来为人民服务呢？他才40多岁，采煤专家，我们的事业急需这样的人才。他还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不是也留用技术专家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吗？我们党

---

① 原系群众性进步组织，后来混进了一些坏人，不久即被解散。

的政策，同样要利用技术专家的特长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他讲完意见之后，本着既要严格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的指导原则，正确处理段宝坤的问题，再让大家认真讨论。最后，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段宝坤是伪市长，是汉奸，属于敌我性质矛盾，应从严处理，但从严处理不等于统统要枪毙。现在有两种意见，哪一种正确呢？可以说都有道理。但权衡利弊，留下来改造的办法对人民好处多，这就是让段宝坤带罪立功，在开采双鸭山煤矿中进行劳动改造，造福于民。不论从当前或长远看，这种办法比镇压的办法较为有利。最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段宝坤终于被留用了。不久，段宝坤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虽然在国外学了一些本事，可我不但没能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反而充当侵略者的工具。共产党高瞻远瞩，胸怀坦荡，非但不杀，而且千方百计保护我，重用我，我决心不能给共产党抹黑。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但能改造好，而且能为人民做贡献。”他到双鸭山之后，既做工又搞技术，在图纸、机器设备一无所有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白手起家，不仅很快出煤，而且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为创建双鸭山煤矿立了功。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连续超产，成绩突出。段宝坤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依靠工人的帮助，不仅改造了自己，摘掉了汉奸帽子，当上了总工程师，而且还带出一批技术人才。当年经他办起的双鸭山工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早已是煤炭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已经成为专家、学者。张闻天

保护和改造了段宝坤，段宝坤也由衷地感激和尊敬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笔者在1983年8月访问段宝坤时，他带着深切怀念的真挚感情幽默地说：“有人死后要见马克思，我没那个资格，但我要用我的实践，死后毫无愧色地去向张闻天汇报！”

对段宝坤问题的处理说明，张闻天大胆而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现出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统一，真是远见卓识，高人一等，令人敬佩不已。至今，这段有关留用段宝坤的“故事”仍传为佳话，影响深远。

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在伪满时期任过一般职务，做了点事的知识分子，张闻天按照教育改造的方针，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去为人民服务，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也是很显著的。民主人士薛绶宸，1917年毕业于河北省保定师范大学，1920年来到东北。在担任依兰县立中学校长期间，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救国活动，支持依兰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唐瑶圃，利用依兰中学教员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为发展党员，建立各种进步组织，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多成绩。依兰中学还为抗日输送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绝大多数成为抗日联军中的骨干。开明校长薛绶宸的名声也在抗联中间流传开来。由于薛校长是当时依兰县城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也成为敌人争夺和利用的对象。薛当过2年伪依兰县教育局长，在日伪统治时期做过4年“兴农合作社理事”。日本投降后，张闻天来佳木斯之



前，原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合江省政府主席李延禄已请知名的薛绶宸校长出来主持合江省教育厅工作。但在1947年土改高潮中，薛绶宸的家庭定为“富农”成份，他本人定为“汉奸”，起了浮财，并离开工作岗位回家赋闲。张闻天得知薛的处境之后，经过详细反复调查，及时纠正了上述“左”的偏差。他对李延禄省主席说，你们是老相识了，这个人以前为我地下党做了好事。后来他做了点违心事，是可以理解的，是个无党派人士嘛，不要太求全了。经过教育他还是能为人民服务的，我看你还是把他请出来做点事吧，我们需要办教育的人。再说薛家庭不该定为富农成份，他本人也不应以汉奸对待。李延禄随即到依兰对薛绶宸说明省委书记张闻天对他的信任与希望，并任命薛绶宸为依兰联合中学校长。薛很受感动，积极工作，成绩显著。他领导的依兰联中在合江各县中学中名列前茅。1948年初根据张闻天的意见调任薛绶宸负责佳木斯联合中学工作，成绩又十分突出。由于薛的工作卓有成效，1955年他被调往哈尔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博物馆馆长、黑龙江省文化局局长，继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薛绶宸对于张闻天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刻骨铭心，永生不忘。这位桃李满天下的薛老先生，生前总是经常地对他的学生讲：土改的时候，若不是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明察秋毫，器重我这个“罪人”，叫我又重返教育界，那我就得在家一直呆下去，可就成了一个糟老头子了；现在你们看我是不是还挺

精神？我还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点贡献哩！

张闻天大胆、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和带动了他领导下的干部。他们也正确地把握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许多十分感人、发人深思的事情。

当年在合江担任过地委书记的王新三同志，对张闻天大胆、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分敬佩。在张闻天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他自己也有正确对待和处理技术人员的感人事迹。在土改高潮中，有位出身不好的留学生，受到群众的批斗，还挨了打。当时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势头正猛。王新三同志坚决按党的政策，制止了这种“左”的行为，保护了这位知识分子。这件事受到张闻天的赞扬。随后王调往鹤岗矿务局工作，面对一些技术人员，特别是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不知如何对待。他请示张闻天后得到明确指示：要坚决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于是，他大胆地解放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有个工程师是大学生，很能干，名叫北村，王新三同志把他留下来继续工作，他很感激。北村衣服单薄，就发给他一件大衣；他吃不惯高粱米，又送去一些大米，他很受感动，连声说这是“银饭”，工作很卖力气。后来王新三同志调到抚顺工作时，也把他带去了。通过他团结了其他日本人，他们为恢复矿山出了大力，作出了不小贡献。北村的儿子在抚顺长大，叫王新三同志“中国爸爸”。北村回日本后对我们很友好。他儿子还来过中国，专程去看望王新三同志。这都说明政策的威力，这种威力，有时要到几十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这也说明张闻天的远

见卓识。

东北全境解放后，进入了经济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张闻天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他说，工人操作机器需要技术，工厂改进机器设备需要技术，农民改良种子、改善土质肥料，也需要技术。科学技术一天比一天重要了。要教育干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深刻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新时期，“技术是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条件”。<sup>①</sup>而重视科学技术就必然要重视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然而，有些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总是疑虑重重，不敢使用，甚至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对于这种不能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倾向，张闻天批评说，如果“不争取教育这些人，那就不是科学的头脑”<sup>②</sup>，而是愚昧落后和宗派情绪的反映。

对于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张闻天是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宝贵财富加以爱护的。虽然东北解放不久，物质条件比较困难，他仍主张尽可能地对专家“在物质方面加以优待”<sup>③</sup>，努力创造有利于他们专心致志工作的环境和友谊合作的气氛。在政治上要关怀信任，既要教育他们改变轻视工人的思想，同时要教育工人尊重技术，使他们在改造

---

① ②张闻天 1949年6月4日在辽东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③ 张闻天 1949年6月12日在辽东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逐步做到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把掌握的知识转化成为人民造福的社会财富。

张闻天不但重视和正确使用知识分子，而且主张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大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造就各种专门人才。“没有大批的有现代科学知识与掌握现代技术的专业人才，东北经济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是不可能的”。<sup>①</sup>除创办各类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短期训练班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培养外，他还主张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下，“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大胆依其能力提拔”<sup>②</sup>，应该向工农干部讲清楚，如果一个人成份再好，没有能力，还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培养输送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其中不少同志经过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现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专家。

后来，对知识分子问题，张闻天在理论观点上又有新的发展。经他修改审定的辽东省安东（现为辽宁省丹东市，当时是辽东省会）市委于1949年8月关于国营工厂建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国营工厂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中指明：“有的地方对职员缺乏正确的分析，没有把工厂中的职员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夸大职员成份的复杂性；认为：‘职员靠不住’、‘工人反对职员’，而没

---

① 张闻天：《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张闻天东北文选》第228页。

② 张闻天1949年6月12日在辽东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有积极的吸收先进的革命职员入党。实际上，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在工厂中的反映。”东北解放后，知识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的实践，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至于国营工厂职员，则是掌握生产技术和技能的管理技能的从事生产的脑力劳动者，尽管劳动方式同工人还有差别，但从取得生活来源的方法和为谁服务来说，应该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全国解放前夕，张闻天的这种新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仍然使人倍感亲切。

张闻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一贯重视知识，尊重人才。早在30年代，他挽救过险被错杀，生命危在旦夕的著名医学家傅连暉同志；他“包庇”过著名学者、教育家成仿吾同志，使他免遭错误批斗。在延安的艰苦年代，他亲自批准给专家以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东北知识分子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应该很好地加以爱护。建国以后，他在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中，又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得他们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施展才干。对于已经错划的右派，他也主张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要浪费人才。应该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张闻天是有远见的。他所作出的贡献意义深远，不可低估。

# 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商谈

## 对华经济援助问题纪事

(1952年9月—1953年5月)

陈 志 凌

### 受到热烈欢迎

1952年8月下旬，中国政府应苏联政府的邀请，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副团长陈云、李富春，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工作人员有沈鸿、钱之道、吴俊扬、袁宝华、陈平等。

9月中旬，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从北京出发，途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至莫斯科机场，受到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欢迎。

斯大林接见了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并作了极其热情的谈话。他首先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问了中国党政领导人工作、身体状况，接着说：你们国民经济

的发展，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应当是飞机、汽车、军舰都能制造；你们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做计划时，应留有余地，要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要有后备，不要造成五年还完成不了计划指标；我们对中国的援助，不仅技术上是头等的，而且价格是便宜的。<sup>①</sup> 斯大林接见后，举行了盛大的、隆重的宴会，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琼尼等出席作陪，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领导人祝酒，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致词答谢，气氛极其热烈友好。

9月底，周恩来同陈云、李富春商讨了与苏方谈判的方针与重点，向代表团人员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后，同陈云先行回国了，留李富春领导中国政府代表团，主持与苏联政府的谈判工作。

### 商谈援助项目

周恩来、陈云回国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由苏联国家计委主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布洛夫负责。他在苏联国家计委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了欢迎会，计委有关局长参加，并宣布从现在起，苏联计委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搞第一个五年计划。

李富春将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

---

<sup>①</sup> 宋劭文的回忆。

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有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建等七个五年发展计划材料，交给对方，并作了说明，请他们提出意见。按照苏联国家计委和李富春商量的计划，9、10月，苏联政府有关部和国家计委有关局着重审查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要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研究中国政府代表团带来的地质资料，同时中国代表团成员分头到有关部、局介绍情况。

李富春鉴于苏联政府对援助中国工业建设项目，一时难以答复，在莫斯科无事可做，便写信给莫洛托夫。经莫洛托夫提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同意，暂离莫斯科到南部海滨养病。代表团各成员与苏有关部、局联系情况由宋劭文收集向李富春汇报，并转达李富春对各项具体工作的安排意见。

从11月开始，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分头找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提出哪些项目需要建，哪些项目暂可缓建，以及他们有能力承担和无条件承担的项目，双方展开了讨论和研究。

11月21、22日，苏联外贸部组织有关部门约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钢铁、有色金属、煤矿、轻工业等设计项目。

11月底、12月初，苏联电工部邀请东北电工局副局长白扬谈话两次，就东北电工四厂第二期建设、该厂自动控制设备车间、包头电机厂发展规模、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和水铝整流器厂的改建扩建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10日，苏联汽车拖拉机制造部约我政府代表团



成员宋劭文、孟少农商谈北京汽车装配厂问题，该部表示能够担负中国政府新提出的华北汽车厂、拖拉机厂、滚珠轴承厂三个建设项目，但不同意建设北京汽车装配厂，并再三说明华北汽车厂的厂址应设在北京。

12月13日，李富春回到莫斯科。12月23日，李富春接待苏联汽车拖拉机制造部的同志商谈长春汽车制造厂扩大生产规模问题。谈话后，李让陈祖涛提出扩大规模的具体意见。

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委会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小组会谈，由沙布罗夫、李富春主持。会谈中，苏联国家计委各副主席、局长、专家均分组参加。会谈的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全盘建设计划，但重点在“一五”计划的发展速度，重工业、铁路的发展规模。他们对资料（包括各工业现状、资源、平衡、干部与技工、进口技术）很重视，询问很详细。李富春按照对方的要求，电告陈云、薄一波，请在1月18日以前补送：硫磺及硫化铁、石灰石、工业盐、磷、钾五种原料的资源（在什么地区）与数量，阿莫尼亚、硝酸、硫酸、烧碱、纯碱五种产品五年平衡材料，现在坦克修理厂的全部资料，铁路五年计划新修各线的坡度、弯度、桥梁负荷、机车牵引吨数、旧车与新建线路号志情况与计划，五年分类的技术人员平衡表等13种资料。<sup>①</sup>

---

<sup>①</sup> 1953年1月7日，李富春、宋劭文给陈云、薄一波的电报。

苏联国家计委还成立了包括李富春、苏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总顾问等5人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他们提出总的要求是：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任务要紧张，但要有把握，一定要超额完成，同时必须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以备预见不到的情况的变化影响计划的完成。年度计划，根据情况可高于五年计划规定年度生产水平，以保证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他们认为，中国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铁路运输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指标、工人和干部指标等都过高，恐完成不了，必须相应地降低，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煤矿、石油、电力的产量，机器制造、兵工等工业的设计、工厂扩建改建规模、资料平衡、厂址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2月1日晚，沙布罗夫约李富春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苏国家计委各副主席和有关工业局局长均到会。他首先说明，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不好。并说：我们再三研究你们的五年计划，认为有些任务太紧张，资料根据不够充分，很有必要反复研究几次，最好现在提两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查决定。

沙布罗夫还提出：你们地质资料很不健全，设计工作落后，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不足，是你们五年计划中的薄弱环节。李富春对这三个问题，详细作了说明和解释。沙

布罗夫重申，你们提的五年计划速度是快了一点，有可能受挫折，如果受到挫折，中国党和人民都会感到很痛心。把地质资源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暂缓，这样中国建设速度将是很快的。他建议用两三天时间，再分组审查一次。李富春认为沙布罗夫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表示完全同意。<sup>①</sup>

李富春与沙布罗夫商谈结束后，同宋劭文、叶季壮进行了研究，并与驻苏大使张闻天统一了思想。他们一致认为，沙布罗夫总的意见是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材，积累建设经验，搞清资源，如此，则日后的速度可快。”根据这一精神，他们议定了几点意见。这几条意见是：

实事求是。没有资料、力量做不到的决不勉强，该推迟的建设项目一定推迟，从战略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联系上考虑，必须建设的重点项目；亦应说明理由，力争苏方帮助设计。

钢铁是工业的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于资源不清、地区布局等关系，石景山和本溪钢厂建设可以推迟，争取先完成大冶、包头的设计并开始建厂。水电站的建设，着重于包头、兰州两点，其它如轻工、农业、交通等；听取苏方意见，原则上可以酌情减少。

我们计算的工业总产值，有些项目可能有错误，如计

---

<sup>①</sup> 1953年2月3日，李富春给周恩来、陈云电报。

算 1957 年煤、纱布、烟、食油等的产量估计高了，机器产值也算大了，应照原方案改正计算上的错误。大冶钢厂建设可能推后一些，1957 年铁产量即可减少。这样，工业发展的速度，将为每年增加 15% 左右。

李富春随即布置各组与苏方举行了第二轮商谈。

2 月 9 日后，李富春综合各小组商谈的情况，摸清了苏方援助中国工业建设第二方案的主要指标：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13—14%；钢铁工业，铁产量减少 60—70 万吨；机器制造业，包括兵工在内，1957 年的总产值约 27 亿银元（原方案 45 亿）；煤炭 1957 年的产量较原方案减少 1000 万吨；石油 300 万吨的炼油厂分期先建设 100 万吨；电力，1957 年的发电量约有 150 亿度（为 1952 年发电量的 200%）；铁路运输，原方案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增长率的 100%；苏方认为 70% 较妥。另外，苏方认为总产值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其他职工的增加速度；农业增长速度太快（原方案农业 1957 年比 1952 年增长 40%）。<sup>①</sup>

这是极为重要的情况，李富春当晚电告了中央。

2 月底，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给李富春的复信说：“我们研究了 2 月 9、10 日的电报和白扬带回来的材料，2 月 15 日听取了白扬的汇报，2 月 17 日、23 日与朱总司令、仲勋、伯达、曾山、拓夫、有关部

---

<sup>①</sup> 1953 年 2 月 9 日，李富春给周恩来、陈云转毛泽东的电报。

部长、计委委员、计委各局局长讨论了两次，意见如下：一、我们认为苏联国家计委对我们计划的意见是正确的，苏联国家计委所介绍的计委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对我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巨大的帮助。二、长期计划中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拟定为13—15%、年度计划中根据实际可能情况再定20%左右，以保证长期计划的提前完成，这样办是有好处的。三、苏方对各工业计划所提出的具体意见，我们基本同意，有关部部长还提出一些意见，兹一并送上供你参考。”<sup>①</sup>

这些意见，主要为钢铁、电力、石油资源等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要求苏方协助解决。

本来中苏商谈可以继续加紧进行，但这时斯大林病情恶化。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沉痛地开展悼念活动，中苏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谈判也暂时停下来。

10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葬礼。11日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对中央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的意见。这份意见书分“五年计划和工作制度”、“关于计委、财委工作”两部分，提出了制定计划的条件，分析了五年计划初稿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对财委、计委的建设提出了建议。周恩来认为这些建议很有参考价值，回国后整理成文，打印分送有关领导同志。他在写给高岗的信上

---

<sup>①</sup> 1953年2月，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给李富春的电报。

说：“在莫时，富春同志曾对我提过关于中央五年计划指标初稿的意见……现将我笔记稿整理出，送你参考，富春在原稿上的注语，亦送你阅。”

### 同米高扬会见

3月17日下午，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同李富春会谈，参加会谈的苏方有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中方有宋劭文、袁宝华。米高扬说，关于中国的五年计划问题，我们现在交换一下意见，以便向政府提出报告。我们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李富春介绍了我方和苏联国家计委商谈的主要问题。他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很好计算各方面的平衡，因而计划的发展速度高了点；由于地质资源资料不足，地区部署有不适当处，有些建设项目作了改变；钢铁工业主要是铁与钢不平衡；有色金属工业钨、锡、锑没有问题，铜资源勘测不清；石油工业原打算在兰州建设300万吨炼油厂，现改为先建100万吨；化工方面，推迟吉林肥料厂、人造橡胶厂的建设等10个方面的问题。接着，李富春又提出了3点要求：钢与钢材不平衡，鞍山第二初轧厂的连轧机望能早交半年，以便提前于1956年底建成，以减少钢锭积压；电力须保有储备能力；石油炼厂在第一个五年建成200万吨。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一边听李富春介绍情况，一边提出问题，他从工业交通问到农业手工业、马匹车辆，李富春都一一做了说明和解释。他

们从下午3点开始谈至5点半，交谈了两个半小时。<sup>①</sup>

3月30日，米高扬、库梅金、郭维尔一起会见李富春，中方宋劭文、袁宝华在座。米高扬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我们全部都研究过了，政府委托我谈一下给中国提供援助的意见。我的这些意见除了你们在国家计委会谈的项目，以及苏联过去援助的项目外，还可以承担设计、设备交付以及其它方面的援助。这里有三张表：一张为民用工业的表，一张为国防工业的表。关于企业规模、设计日期、交付设备的日期，都印在表上。还有一张表是有色金属的几个项目，我们帮助研究地质资料，搞设计；之后，再商量建设有关企业提供部分设备或全部设备问题。米高扬当场将这三张表亲自交给李富春，全场热烈鼓掌。

接着，米高扬就帮助中国发展工业问题，作了几点说明。首先他指出企业规模不应太大。炼油厂搞100万吨就不算小了。苏联现在还没有这样大的炼油厂，如有必要还可扩建。你们要在一个地方建设300万吨的炼油厂是不经济的。钢铁厂也一样。你们提出建设两个年产200万至300万吨的厂，太大了。苏联在经济建设初期，没有这样大的厂，马克尼托高尔斯克厂已建设了20多年，现在刚刚超过300万吨，其它厂都是120—150万吨左右的。1936年，美国最大的钢铁厂只有250万吨，相当于鞍山钢铁厂大小的

---

<sup>①</sup> 1953年3月17日，李富春给周恩来并转中央的电报。

规模。从经济合理看，建设 120—150 万吨的厂，比建设 300 万吨的厂费钱少而时间快，比较好管理。大冶地区如将来有扩充的条件，再行扩建。扩建改建都比较经济合理，少走弯路。

米高扬指出，工厂与工厂应该配合，不能期望一切产品都在一个厂生产。中国所提的设计项目，有些厂可以不建新厂，用改建、扩建现有厂代替就可以了。这样，投资少，收效也大。

关于设备供应问题，米高扬强调，不能完全依靠进口，哪怕是生产规模相当大的工厂，也有些机器是简单的，可以自己生产。例如，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冶炼，甚至机器制造等，有许多设备自己完全可以生产。他建议，供应设备比例数，苏联供应 50—70%，中国自己制造 30—50%。这样，既减少进口，又培养了人材，提高了技术。

米高扬表示：苏联对设计工作、派遣专家、接受实习生、留学生等都提供优惠条件，允许无偿的给予中国以新产品的制造许可证。还同意派出 5 个综合组：即电气化，黑色、有色冶金；机器制造，造船工业，黄河、资水、嫩江总体设计等的专家。

米高扬最后说，请你们把三张表研究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

李富春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对米高扬说，我们是小兄弟，你们是老大哥，谢谢老大哥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我们的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米高扬说，哥哥走过的



路，走错了的，弟弟不要重复。<sup>①</sup>

4月4日上午，米高扬约李富春第二次商谈。米高扬说：今天谈谈对中国五年计划的建议。你们的五年计划草案，我们的经济专家已仔细地精心地研究过了，时间拖长了一些，但对你们的情况、要求摸得比较透，因而意见有可能切合实际一些。

米高扬首先肯定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速度快了些，发展重工业的主要困难是专家太少，地质资源缺乏，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地质资料建设。五年计划需要注意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这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农业上，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任务提得很好，但办法不具体，根据不充分。他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地质、钢铁、煤矿、石油、电站、机器制造、冶金、化学、水泥等工业诸方面的问题，及其改进的办法。最后说，这些是我们的看法，请研究并提出意见。

米高扬讲完后，李富春接着说：米高扬同志的几次谈话很好，实事求是，对我们帮助很大。第一次交给我们的文件，研究后提出了一些问题，昨天请宋劭文同郭维尔交谈了这些问题。关于我们的五年计划，经过苏联同志7个月的研究，给我们提了极其宝贵的意见。由于事关重大，我们拟派宋劭文回去请示中央，汇报我们商谈的情况。大约15日左右可以回来，请考虑我们在15日前还要做什么工

---

<sup>①</sup> 1953年3月30日，米高扬关于中国五年计划对李富春的谈话。

作？苏方援助中国的协定草案是否可以考虑研究一下。米高扬说，协定要考虑。苏联供给中国以设备也要求中国供给苏联以相应的东西。我们计划从1954年到1959年，要从中国取得钨砂16万吨，锡11万吨，钼砂3.8万吨，铜2.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羊毛2万吨，麻6万吨等，至于1953年交付的物资，则按已经决定的来做，没有什么改变的了。

4日下午，李富春写信给周恩来和毛泽东：

总理并报主席：

米高扬同志于3月30日及今日约谈二次。第一次谈话交我三个建设项目的清单及说明苏联帮助的主要内容（亦即是订总协定的主要内容）。今日谈对五年计划的同志性的建议，希望我们研究，早作答复，以便苏政府作最后决定。对于三个清单，我们初步研究后，昨日约苏外贸部成套设备司长郭维尔谈了一次，提出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与要求解答的问题。这一切均由宋劭文、钱之道同志详细面报。我已当面与米高扬同志约定劭文同志于15日左右回莫，请中央对方针、规模（三个清单）及总协定主要内容（米高扬同志第一次口头的谈话）迅速讨论决定，有何指示交劭文同志于15日带回莫斯科。因此，劭文同志在北京只能有三、四日的停留，望中央抽出时间讨论。

方案决定之后，如何在组织上、工作上迎接这一方针的实现，首先是设计工作的资料收集工作。在组织与准备工作方面，我有些建议亦由劭文同志面报，提供中央考虑，并望迅速采取行动。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中相当力量，进行收集设计资料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第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总协定的主要内容，请中央予以审查与批准。至于细节及文字上的问题，由苏联起草，并望能授权给我，只要不违背中央决定的主要内容，由我负责与苏方商谈签定，以免往返请示延搁时间，是否妥当，亦请指示（重要问题，还需请示）。

在此商谈的工作，快要告成，切盼中央迅速给予指示，使宋劭文同志如期来莫，以便我们早日回国参加工作。

敬礼

富春

四月四日下午七时

宋劭文于4月10日回国，16日返回莫斯科。中央于4月14日写信给李富春说：赞成苏联对我们五年计划所提同志性的建议，赞成苏方所提一、二、三号清单设计项目。砍掉部分，砍得好！因砍掉的主要属于以下三类：没有地质资料的，自己办得了的，过几年才能办的。除以上三类被

砍掉外，其余设计项目苏方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应感谢他们。

中央的信对扩建改建重工业厂矿、派遣专家、供应有色金属矿砂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李富春与苏方商酌。同意他代表中央签字，并授权他对协定可作文字的斟酌。

至此，中苏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取得了一致意见。

### 学习计划经济的理论和经验

苏联国家计委根据李富春的要求，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开办了一个计划经济学习班。他们一面谈判，一面上课，请了著名经济学家讲课，每次讲四五个小时，共讲了十几次课。重点学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理论、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理论以及积累和消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比例等。

李富春听课次数不多，主要是看讲课材料，写笔记。在他的督促下，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做笔记。重要内容及时整理电报中央，记录稿也整理出来寄回国内，让国内自学同志学习参考。他们寄回国内的笔记本中，记载了讲课内容、讨论提纲、学习体会、苏联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等，圈圈点点，内容非常丰富，反映了代表团成员在理论学习上的刻苦钻研精神。

李富春和代表团同志的笔记，很注重联系中国建设实

际，写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学习心得。一篇《谈平衡》的心得里写道：“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平衡方法”，“平衡问题很复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五年建设中在工业上必须注意新厂与旧厂、大厂与小厂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即是现有厂与新建厂的平衡问题，只重视新的、大的，忽视旧的、小的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第一，现代化工业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协作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把一种产品的所有部件与零件都组织在一个工厂内生产，而且为了使新厂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必须组织其它若干厂与之协作配合；第二，旧厂都有一定的基础，改建旧厂比新建厂容易，投资少，见效快，掌握易；第三，建设大厂是重要的，但大厂必须有小厂作补充，在目前我国手工业对于现代化工业的补充，特别是在农具的制造与农民用具的制造方面作用是很大的。”

一篇《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中写道：“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是密切结合和相互制约着的，其中有主导部门，也有配合部门，因此，必须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脱节。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区别。”“要掌握比例，首先就要研究各方面的需要，同时计算可能的条件。不了解需要与可能，不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就没有辩证地按比例办事。”根据苏联的经验，统计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定额是对各种计划指标进行核算的根据。因此，加强调查研究 and 统计工作，研究技术经济定额，才能搞好各部门的

比例关系，做到有计划地发展，减少盲目性。

在《抓重点》中写道：“国家整个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中的重点是重工业，在重工业中也有重点。”“平均发展、样样都要、分散力量的作法，就是没有重点。”“国家建设也象作战一样，如果分散力量，分兵把口，或者四面出击，就会顾此失彼，陷于被动，并遭到失败。”

在《稳步前进》中写道：“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均有限度，建设的经验与知识也很不够，因而前进的步骤一定要稳当，不能一步登天。”我们在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发展规划过大，速度也过高，有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苏联在帮助我们研究建设项目时，一项一项地都要研究根据，并做精确的计算，特别在地质埋藏量、机器设备的制造能力、建设安装力量、干部和技术力量的来源等的资料上研究的很认真”，其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设计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避免走回头路，“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

李富春等写的这些心得笔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光辉，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他在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过去学的太少，应该当小学生。工作多则粗、浮，专则可细可精，回忆延安时代，主席的谆谆教诲，虽有所得，也有小的进步，总是粗与浮，何其愚钝。”<sup>①</sup>

---

① 1953年3月26日李富春给毛泽东的信。

## 协 定 签 字

4月25日，米高扬约李富春会面，表示了以下意见：关于新建厂问题……现在先不谈，今后还可回过头来商量；中国供给苏联的东西减少的部分我们没有意见，铜取消了，钼砂减少3000吨，钨、锡维持1950年2月议定书中规定的数字；中国缺乏的备件、配件，如电子管等，苏联负责供应；同意你们在莫斯科建立三个机构，在你们提出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协定草案交给你们，双方都可提意见，我认为协定草案是符合我们商谈的精神的。希望在三四天之内答复我们。<sup>①</sup> 米高扬这些意见是针对我国在协定签字前提出问题的回答，基本解决了我方要求明确的问题。

李富春表示，马上请示中央。协定签字可在5月4日前后进行。李富春4月25日致电中央说：“今日米高扬同志约我谈话，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很简要，已另有电报报告不赘），并面交我总协定草案及附件（即清单），我们赶将协定草案及原第二清单的补充议定书译出，由白杨带回”。“对于协定草案在内容与文字上有何指示，望审查后电告。”“我们研究了协定草案后，认为在协定中完全表现了苏联的全面的援助我国建设的精神。在工业的生产建设上从新建、改建以至与现有工厂的配合；从新建工厂上是

---

<sup>①</sup> 1953年4月25日，李富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

从设计、设备供应、施工、安装以至开工；从技术援助上是从地质设计专家、实习生的派遣、技术资料的供应等，以帮助培养我国自己的人才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是全面的、总体的援助，在内容上正如米高扬同志今日所说的‘完全符合我们商谈的精神的’。”

在具体问题上，李富春提出了下列几个问题，请中央考虑：

关于设备交付问题：苏联承担设备总价值的 50—70%，而由我国自制 30—50%（按价值计算）。此问题，看起来，我们的负担很重，有点力不胜任。但我们再三考虑，认为：其中有 20% 的商量余地，将来在具体谈判时如果确有困难，在 30—50% 的范围中，苏方是可以考虑我们意见的。由于我们分担制造的部分，有苏方给予专家的指导与技术资料的帮助，有人撑腰，大部分的困难是可克服的；在苏方帮助之下，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是完全要有此种精神的，因此，我们意见，此条不再提出意见，可以同意。

关于以部分外汇偿还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规定每年经过双方协商，多少即不受约束，是可以同意的。照最近情况看来，苏联需要我们的外汇，因此外汇来源及使用问题，我们需作全盘考虑才行。

关于每年 1000 名实习生问题：我们想提出请苏方解释每年的计算方法问题，如实习生只实习半年，是否可派两批人，因为估计到 1955 年以后，可能每年要超过 1000 人。

李富春请求中央审查上述意见是否适当，并予以回复，



如果协定草案无大问题则可以在5月4日或5日签字。

4月30日，李富春接中央电示：你4月25日来电及白杨带回你致主席和中央信并文件6件，俄文原稿3份均收到。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提到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及“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协定协议书”及“议定书的附件”等6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些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各种文字即由你们作最后的斟酌”。

5月6日，李富春电告毛主席和中央：昨晚我将中央上月30日电示转奉米高扬，并决定协定的签字在我由捷返莫后进行（约在14日）。米高扬面告我，关于苏联政府对中中国五年计划的同志性的建议，与过去所谈的内容一样，将以书面形式经驻华大使转交我中央。

5月15日晚10时，举行《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签字仪式。签字后，米高扬设宴庆贺。苏方出席者除米高扬外，有沙布罗夫、白尔乌辛、各工业部部长、计划委员会的葛罗米柯、库梅金以及贸易、外交部人员共30余人。中国出席的除政府代表团以外，有叶季壮、戈宝权、李强及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使馆人员共20余人。宴会

开始，米高扬讲话，他说：“今天签订的协定，是一个极庄严的协定，是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工业的协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的协定，为此，我们表示热烈祝贺！”<sup>①</sup>

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予以衷心感谢！席间，宾主十分亲热、诚恳、愉快。交谈中，米高扬表示，为此协定的发表，拟发一公告，公告内容双方尚可商酌。

宴会后，李富春电告中央，汇报协定签字情况，并提议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请一次客，出席人数与今天大体相同，只增加苏联计委为中国政府代表讲课的专家，表示我方对苏方的感谢！

5月21日，米高扬约会李富春，告诉他：两个协定议定书及附件正在进行文字校正工作，完成后即可签字；关于货单中我方所提四点意见，他建议在签订具体合同时商量；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国民经济的公报稿，于23日议好后与我方商量。

5月30日，中国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到会的有米高扬、苏方四个工业部长、国家计委主席、对内对外贸易部人员，苏计委教课的12位专家及普希金、费得林等外交人员。

6月4日下午，李富春和米高扬代表中苏双方在两个“协定议定书”上签字。同时，中国政府收到了苏联驻华大

---

<sup>①</sup>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使库兹涅佐夫交来的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以及中国政府提交的对苏联政府这两个文件的回文。这些文件表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已用条文形式固定下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

## 胜 利 归 国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领导下，经过近10个月的艰苦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果，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委托的历史重任。这些成果表现在：1953年至1959年内，苏联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这些企业是：两个钢铁联合企业（包括采矿、选矿、炼铁、炼钢、轧钢）即大冶钢铁厂与包头钢铁厂，这两个企业每年钢的生产能力均在120万吨左右；8个有色冶金企业，其中包括制铝厂、铝合金加工厂、云南个旧锡矿厂、镁厂、钨矿厂；9个煤矿，3个洗煤厂；1个石油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包括5个重型机器制造厂，1个汽车制造厂，1个拖拉机制造厂，1个滚珠轴承厂；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7个化学工厂，其中包括两个氮肥厂，1个合成橡胶厂，还有几个国防工厂；10个火力电站；两个生产磺胺、盘尼西林和链霉素的医药工业企业。

上述91个项目，加上1953年4月以前3年中苏联援助我国新建与改建的50个项目，共有141个项目。

自 1953 年至 1959 年的 7 年期间，这 141 个项目建成后，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不论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属方面、煤炭、电力、石油方面、机器制造业、动力机械制造方面、化学工业方面，都超过当时 1953 年生产能力 1 倍以上，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 1937 年的水平。

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新建与改建的企业，大力协助培养技术人员，解决工业技术上的困难与问题，苏联政府决定每年接受我国派遣为着新建厂生产的 1000 名实习生，派出 5 个专家组、200 名设计专家、50 名地质专家来中国。

为了帮助我国新建企业的设计，苏联各级设计院增加很多设计人员。为交付上述企业的设备，他们把主要工厂的生产计划算到 1960 年。在我国政府代表团 1952 年到苏联商谈我国建设问题的时候，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快完成了，并开始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生产指标，但为了帮助我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他们在自己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加进了很多的任务。这一切都表现了苏联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政府在对苏联政府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的回信中指出：苏联政府对建设和改建中国的 141 个项目的援助，以及其它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技术援助，派遣专家来华，给予中国贷款等等，将使中国人民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

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都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谈判结束后，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分别于5月24日、6月3日乘飞机回国，李富春因蔡畅患病住院延至6月9日乘机离莫回国。

#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

——回顾酒泉导弹、卫星发射基地的创建与发展

李福泽 李元正

酒泉导弹、卫星发射基地是我国建设最早的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承担着多种型号地地、空空、地空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测试、发射、指挥、测量、安全控制和陆上落区的观测、回收、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等任务。基地组建3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国防科（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全军，特别是甘肃、内蒙、新疆等省、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以及航空航天工业部（包括原国防部五院、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密切协同下，经过7169部队这支建设大军的顽强拼搏和基地几代官兵、科技人员长期艰苦奋斗，在茫茫戈壁建成了一整套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导弹、卫星发射试验体系，完成了许多在世界上具有较大影响的科研试验任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迄今为止，我国发射31颗人造卫星，其中有20颗卫星是从这里升起遨游太空。这个基地艰苦创业的历史，基本反映了新中国航天事业崛起与发展的历程。

忆往昔，基地从组建到今天，步步足迹都渗透了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饱含着创业者的艰辛，闪耀着国防科研战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我国航天事业无私奉献的生命之光。

## 组建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我国的航天技术是在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 50 年代中期，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咄咄逼人的核讹诈及军事威胁，为了增强我国的防御能力，保卫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我国经济、技术还很落后的条件下，决定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改进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技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武器。1956 年 2 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由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和国防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元帅组织制定的《1956 年—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把国防新技术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5 月 26 日，周总理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我国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并批准组建导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1957 年 8 月 31 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导弹武器的战略部署和中央军委关于建设以导弹试验为主，结合进行其它新式武器试验的综合性靶场的决定，组织炮兵、空军、总后勤部、总参作战部和军械部、国防部五院等单位

召开专门会议，集中研究了组建导弹试验靶场的条件、规模、区域、经费等问题，之后成立了以炮兵政委邱创成为主任的靶场筹建委员会。

10月15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航空工业委员会（1958年10月与国防部五院合并后，改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为团长，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简称“10·15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供应我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勘建导弹试验靶场。11月2日至12月4日，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为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时，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苏共基本同意帮助我国发展“两弹”技术，建立军事航空工业及建造舰艇等。从此，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列入了中央军委、国防部的议事日程，各项筹备工作迅速展开。

开始时，国防部把靶场的组建和建成后的管理维护交炮兵负责。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炮兵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对外称“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由于导弹试验是现代化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综合性试验，靶场规模较大，因此国防部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筹建靶场机构。1958年10月20日，国防部决定停止使用第二十兵团番号，对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训练基



地”。

1958年1月18日至2月7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军委军械靶场场长张贻祥等人与以苏军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组长的专家组，先后对我国东北、西北等地区进行了选场勘察。勘察组向中央军委汇报后，军委向党中央写了选择导弹试验靶场的报告，建议在鼎新以北地区（内蒙古额济纳旗）和葫芦岛地区设置陆上和海上导弹试验靶场。2月26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处理”。3月3日，邓小平总书记在报告上签署：“书记处已同意”。陈毅、陈云副总理均圈阅。

建设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是我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按照苏联专家组拟制的《火箭武器试验靶场的地区选择和设计的战术技术要求》，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率领中苏勘察组，又对鼎新以北地区和新疆部分地区进行了工程勘察，确定了首区、弹着区各个场地建筑设施配置。4月11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召开靶场工程建设会议，决定由工程兵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由陈士榘司令员统一指挥，负责靶场整个工程建设。于是，以志愿军十九兵团、志愿军工指、志愿军后勤二分部、铁道兵十师、六十五军一九五师组成的7169部队和北京建筑公司、兰州建筑公司66000余人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戈壁滩，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

由于靶场工程规模大，工艺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紧，

国务院将靶场第一期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工程所需一切物资、器材、经费，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委、全国各行各业都全力支持，保证供应。提起这项工程，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7169部队。这支曾在朝鲜战场上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队伍，他们在大戈壁住的是帐篷、地窝，吃的是碱水沙拌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日夜轮流作业。干部、战士、职工顶酷暑，冒严寒，斗风沙，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两年半的拼命苦战，在戈壁瀚海中建起了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每当我们看到导弹腾飞的壮丽情景，欣喜之余都会想起这支默默奉献的队伍，更怀念那些在施工中英勇献身、长眠在戈壁滩的英灵。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靶场工程建设与组建靶场机构同时进行。为了尽快建立一支承担导弹发射试验的技术队伍，1958年3月，二十兵团机关从朝鲜回国后就进行了改组，着手筹建靶场机构，由孙继先任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由于靶场需要的干部数量大，政治条件和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央军委及各总部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决定采取由炮兵、空军、海军包干和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选调的方法，为基地配备干部。总政治部、国务院高教部又从全军军事院校和技术学校、全国各大专院校为基地分配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到1959年底，基地组建了领导机关及其一部（地地）、二部（空空）、三部（地空）、四部（岸舰）、五部（飞行勤务）、六部（航区和弹着区）和勤务保

障部队。

全军为基地输送的干部多数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有的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从大城市来到人烟荒芜的戈壁滩；有的随部队刚从朝鲜回国，征尘未洗就踏上了新的征途；有的从各级领导岗位来到基地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毫无怨言。大家都认为能从事国防尖端事业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这批干部给基地带来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带来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靶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从全国、全军各大、中专院校选调的青年学员，满怀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把党的事业与个人的命运、前途溶为一体，立志要为国防科技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正是这些朝气蓬勃的知识分子，奠定了导弹、卫星发射试验的技术基础，成为我国第一代科研试验技术队伍。

## 历史性的新起点

万事开头难，我国发展导弹技术是从零开始的。根据中苏“10·15协定”，苏联先后分3批派往基地163名专家，参加靶场勘察、设计、技术培训、设备安装等工作。为了迅速培训技术队伍，开展技术训练，二十兵团党委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边组建，边训练”和“以我为主，力求外援”的方针，突出强调打好思想桩、组织桩、技术桩，要求干部随到随学。1958年9月，国防部明确指示二十兵

团各试验部的专业技术训练由各军兵种承担。国防部五院、炮兵长辛店教导大队也分别承担了为基地培训技术干部的任务，由苏军官兵讲课、示范，组织演练，进行导弹初级点火演示。空空、地空导弹试验部还参加了空军、五院等单位组织的“543”防空系统和C—75苏制地空导弹的实弹射击。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基地编成3个训练大队进行自训，邀请专家讲授《靶场性质任务概述》，请五院派人讲授《导弹概论》及各系统的专业技术知识。参加训练的人员尽管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基础参差不齐，但大家都有一种勤学苦练、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啃书本，钻图纸，熟悉电气线路，认真向专家、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学习。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学通了导弹原理，掌握了试验方法和操作技术。就这样为基地培训了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

为了迎接导弹发射试验任务，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基地人员分3批进驻靶场，投入试验任务准备工作。许多同志从祖国的首都来到“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滩，不免感到寂寞、荒凉。基地党委及时对部队深入进行“以场为家，以苦为荣”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响亮地提出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口号，打牢了扎根戈壁，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思想基础。

部队进场后，靶场工程正好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基地党委动员广大技术人员跟班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起启封、清点、安装、调试、联试，千方百计掌握设备性能和工作原

理，学会操作使用。这期间，基地还举办了各种文化学习班和专业技术训练班。训练中，从将军到士兵，从技术干部到军事行政干部，学习精神都非常刻苦，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许多工农干部实现了由外行到内行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技术素质。

正当我们按计划对各项任务进行紧张准备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方原答应援助我国的设备要么不配套，要么不给技术资料，一些专用测试仪器则有意拖延交付或干脆拒绝交付。试验任务临近了，专家组故意刁难我们，先在发射批准权上节外生枝，提出中国发射苏联的导弹需经苏联国防部长批准。这种妄想控制我国的企图遭到严正拒绝后，又在导弹推进剂上作文章。当我们拿着我国生产的液氧经化验完全合格的化验结果约见苏联专家组长时，他们硬说我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连初级点火都不让用。我们据理力争，他们说要派人回苏联复核，最后答应由苏联提供。我们及时派人到东北绥芬河接燃料，他们又以各种借口拖延，最后中止合同。这时，国防科委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苏联想用卡燃料的办法，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1960年8月初，总参谋部、国防科委通知基地：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即将撤走在场区的全部专家，靶场的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自己去拼搏的基础上，不要存在任何外来援助的幻想。8月18日至24日，苏联专家分3批全部撤离场区。面对苏联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大家义愤填膺。基地党委号召广大指战

员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导弹送上天，一定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

9月3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用国产燃料发射导弹的方案。基地立即组织广大科技人员日夜奋战，安装调试设备，狠抓薄弱环节，反复进行合练和模拟演练。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虽然经过专业技术训练，有了一定基础，但毕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能否保证发射成功心里没有把握。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大家心里都憋上了一肚子气。因而在测试操作中精益求精，沉着冷静，一丝不苟。9月10日7时42分，苏制P—2地地导弹从我们手中点火起飞，飞行正常，弹头准确命中弹着区。这是苏联专家撤离靶场的第17天，我们独立操作、测试发射的第一发地地导弹。这次试验的成功，不仅获得了组织实弹发射的初步经验，考验了试验部队，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广大科技人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导弹试验事业的信念，完全证实了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办到，中国人民是卡不住，压不服的！

继苏制导弹发射成功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又下达了发射我国仿制的1059地地导弹（东风1号）试验任务，发射两发战斗弹，一发遥测弹。在导弹测试过程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指示：“试验工作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各级党组织要对每个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和采取组织保证措施，只能搞

好，不能搞坏。”11月4日，聂荣臻元帅亲临靶场，参与组织指挥我国第一发导弹的发射试验，这对于正在紧张从事发射前准备的试验部队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当晚，导弹运到发射阵地，承担加注发射的全体参试人员，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顶着凛冽的寒风连夜奋战，个个精神振奋，严谨操作，使导弹各项参数指标处于最佳状态。

5日晨，基地在发射场举行了导弹发射剪彩仪式，聂帅亲自为发射剪彩。上午8时，导弹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当天下午，聂帅在基地祝捷宴会上高兴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

接着，12月6日、16日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第三发1059地地导弹，都达到了预期试验目的，为我国导弹事业和试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 尖端技术的迅速发展

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基地的物质生活发生严重困难。许多人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身体浮肿。这时场区附近的老百姓生活更加困难，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度过难关，基地党委决定从1960年10月起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救济场区周围的灾民。在困难面前，基地党委动员全体官兵大搞增粮法，挖野菜，打沙枣，捕野兽，采集马连草根、

骆驼刺、沙枣等制成代食品充饥。中央军委非常关心基地的实际困难，周总理专门指示有关部门：不能让我们的科技人员饿着肚子搞导弹，要保证试验基地的军粮供应。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各大军区求援，给基地调拨主、副食，使基地的生活有了好转。

聂帅在基地组织第一发1059导弹发射试验时说：在戈壁滩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先解决水的问题，如果有了水，生活、种粮、种菜、绿化都可以解决。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战胜困难，1961年冬基地发动全体官兵掀起了一场向戈壁滩要粮、要菜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不畏严寒地冻，与大自然进行顽强搏斗，开垦荒地，打井种树，种粮种菜，绿化营区，以百折不挠的毅力战胜了困难，经受了考验。广大官兵怀着对祖国尖端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扎根戈壁，心向北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帐篷里啃书本，吃着野菜、沙枣搞训练，没有叫苦害怕困难的。至今追忆那时艰苦的生活情景和干部、战士的精神风貌，仍令人感慨不已。

在戈壁滩上建设发射试验场，远离城市，偏僻艰苦，广大干部、战士、职工的生活及家属就业、子女入托上学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军委、各总部都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基地立足自身创造条件，逐渐办起了幼儿园、中小学校、俱乐部、服务处、邮局、银行、粮食局等。与此同时，结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批转的聂荣臻《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国科



学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基地党委提出了“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科研试验服务”的口号。各级党组织关心和帮助科技人员解决住房、配偶、入党、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使广大科技干部真正体会到党的温暖。那时，大家的学习劲头非常旺盛，许多人夜间学习时间太长，单位领导到办公室、实验室催着休息都不肯走。训练时器材不足，就土法上马自己制造。为了促使大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战胜由于经验不足和国外封锁带来的困难，基地还掀起了科研革新热潮，制定了试验工作条例、细则、规程等，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靶场试验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靶场第一期工程交付使用后，以后各期工程由基地组织实施。基地党委在经费紧张、技术力量不足、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本着“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突出重点，保证试验”的原则，组织部队相继完成“东风2号”、“东风3号”、“东风4号”导弹初期试验配套工程，新建了发射阵地，完善了测试、发射、测控、通信、气象等系统的工程设施，扩建了弹着区，满足了新型号导弹试验的需要，靶场规模不断扩大。

1962年3月8日，基地迎来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发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的飞行试验。但是，在21日点火发射时，导弹仅飞行41秒就失去了控制，落地爆炸。钱学森同志立即乘专机赶到靶场，传达了聂帅的关怀和鼓励，要大家吃一堑长一智，从失败中奋起。基地同五院的技术人

员从遥测参数和光测胶片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很快找到了故障原因。搞导弹、火箭这样复杂的尖端技术，挫折和失败总是难免的。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只能使我们的经验更加丰富，技术队伍更经得起磨炼。

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是关系国家战略防御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全局。1962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从此以后，导弹、火箭的研制、试验就一直在中央专委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1964年6月，经国防部五院重新研制进一步改进的“东风2号”导弹重返靶场进行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接着，又连续进行10次实弹发射，完成了“东风2号”导弹定型试验，装备了部队，从此我军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

1964年至1966年，是基地发射试验的黄金时代。先后完成了空空“霹雳1号”导弹的定型试验和“霹雳2号”导弹的初期试验；完成了“红旗1号”、“红旗2号”导弹研制性试验和定型试验，并于1967年9月4日击落了美国U-2侦察机；协助二炮进行了实弹演练和发射；完成了“和平2号”探空火箭和T7-A探空火箭及30固体弹的发射试验任务。大家在繁重的试验任务中，边试验边探索试验规律，改进试验方法，提高了操作水平，缩短了发射试验周期。原来打1发地地导弹需要20多天，到1965年只

需6至8天，还创造了44天连续发射8发弹的纪录。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基地建设和科研试验工作。从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薄一波、李富春先后到基地视察，了解基地各方面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1966年6月30日，周总理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后在基地视察一天。总理听取了基地领导同志的汇报，参观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和地空导弹实弹发射，在空中视察了场区附近的居延海、黑城子、乌苏木等地。总理指示：开发这一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把它建设成解放军大寨式的科学试验基地。遵照总理指示，基地广大指战员大力发展生产，植树造林，使场区建设日益完善。

1966年初，经中央专委批准，国防科委向基地下达了执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任务。在本国国土及其上空进行带有核弹头的“两弹”结合试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为了确保试验成功，周总理多次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反复研究试验方案、组织指挥、安全防护等问题，一再强调“试验应绝对可靠”。这次任务是以20基地东风靶场作为发射试验首区，20基地罗布泊核试验上空作为核弹头爆炸落区。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展了诸项准备工作，广大参试人员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在“冷”试之前，周总理指示：“你们一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认真对待，大力协同，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冷试后再汇报一次，报主席。”

10月7日，我们进行了以考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为主

要目的的空爆试验。13日、16日又进行了以考核核弹头控制系统为目的的“冷”试验，证明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和弹头引爆装置性能可靠，完全符合技术要求。

在“热”试测试检查中，全体参试人员密切合作，大力协同，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完全做到了不误发一个口令，不误做一个动作，不错读一个参数，不放过一个疑点，严格把好质量关。10月20日，中央军委听取了导弹、核弹头测试检查情况的汇报。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过五关斩六将，这是最后一关，要检查得更仔细”。周总理指示：“这次试验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人为的误差坚决消灭掉。”

10月25日，聂帅乘专机来到发射首区，他在首区试验临时党委会上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周总理都跟我谈了话，对这次试验抱有很大希望，总理指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广大参试人员群情激动，表示一定要沉着勇敢，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发射时刻临近了，聂帅一直在发射阵地组织指挥，周总理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27日9时10秒，核导弹腾空而起，按预定弹道飞往弹着区，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非常成功。聂帅在首区敖宝山指挥所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谁说我们搞不成核导弹，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两弹结合”试验，前后只用了两年，比美国少了十几年。外国

评论说：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就好象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 航天事业在动乱中崛起

当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毛主席就预见到航天技术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在中央专委的领导下，1965年我国就开始了人造卫星的研制。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单位陷入瘫痪，基地在这场政治动乱中也受到冲击。1967年1月24日，聂帅亲自起草了“20基地坚持正面教育，稳定部队，执行好试验任务”的3条指示。6月13日，针对基地出现的混乱局势，经中央军委批准，毛主席圈阅，聂帅又向基地下达了3条指示，才使部队保持了稳定。

为适应新型号导弹试验和战备的需要，早在“文革”前夕中央军委就要求分散选建导弹试验靶场。邓小平总书记在基地视察时指出：你们这个地方离边疆太近，属于一线了，应该再到三线选择靶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杨成武代总长汇报作战问题时明确指示：“20基地应逐步搬家”。从1966年6月开始，基地在国防科委、五院等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相继在山西、吉林两地勘选、建设了地地导弹发射场，组建了试验部队，并在新疆库尔勒组建了反导弹导弹靶场。为了实现1970年发射我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计划，聂帅提出将卫星测控系统的研制、总体设计、设备抓总、机构组建、管理使用全部交基地负责，于是基地组建了卫星测量部。1970年，基地勘建了四川西昌宇航发射场。至此，基地发展成为一个多场区、多射向、多落区的综合试验基地。

“文化大革命”中，基地党委顶着政治风浪的冲击，团结一致，排除干扰，使靶场建设和科研试验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工程建设方面，先后在山西、吉林、新疆建成3个新的试验场区，满足了“东风3号”、“东风4号”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和反导导弹初期试验的要求。在各大军区的支持下，组建了遍布全国11个省、自治区的11个卫星地面观测站，为执行“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试验作好了准备。东风靶场新建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试车发射新工位，逐步更新了测试、发射、测量、通信、数据处理各系统的设备，提高了试验能力。同时，勘建了新的弹着区，参加了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海上测量船的研制与工程建设。在试验方面，进行了“霹雳2号”、“霹雳3号”空空导弹的定型试验和研制性试验；完成了“红旗3号”地空导弹定型试验及“和平”系列气象火箭试验任务；进行了“东风3号”、“东风4号”地地导弹的研制性和全程飞行试验及“反击1号”反导导弹的初期试验；协助二炮进行了多次实弹射击，训练了使用部队。这些试验的成功，对于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国防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0年2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发射我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试验方案。当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运到东风发射场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卫星和运载火箭出厂前测试情况的汇报，要求“一定要把这件工作做好，鼓舞第三世界人民”，并要求发射基地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基地全体官兵的光荣任务，大家怀着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认真操作，精心检测，排除了各种故障和隐患，顺利完成了星、箭各系统的单元测试、系统匹配及3次总检查。4月14日晚，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听取了卫星、运载火箭在技术阵地测试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在运载火箭内观察时发现有多余物，周总理严肃地说：这些东西不应当有，好比医生动手术时病人的伤口不能留脏东西一样，产品中也不应该有这些东西。16日，周总理批准卫星、运载火箭转往发射基地。

4月24日，参试人员完成了星、箭发射前各项检测，加注了推进剂。下午3时50分，周总理电话告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毛主席已批准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总理的指示通过调度迅速传到了发射场，传到了各个岗位。大家心情激动，决心做到一次成功。21时35分，运载火箭喷着桔红色火焰冉冉升起，各测量台、站及时发现目标，“跟踪良好”，卫星入轨。周总理接到报告高兴地说：“准备庆祝”，并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当

晚，周总理在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文稿上把“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改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表达了我国在现代化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意志和决心。

卫星入轨后，各系统工作正常，以20.009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4月25日，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团体和友好人士纷纷发来了贺电。这次试验的成功，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乱军的罪恶阴谋，制造思想混乱，使基地建设和科研试验受到很大影响。1969年下半年，把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要求基地赶快战备疏散，于是基地搬迁到西安、渭南、商洛一带，正在建设的新疆反导导弹靶场搬迁到云南某地。1972年5月，根据周总理指示，基地又搬回东风场区。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人到基地“放火烧荒”，打击陷害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基地党委陷入瘫痪，部队陷入一片混乱。

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国防尖端技术战线上搞大计划、高指标，违背科研规律，破坏正常的科研试验秩序，废弛各种规章制度，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使我国航天事业在这场动乱中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1972年12月26日，第二发“东风5号”遥测弹点火发射，因点火线路



设计不合理，导弹点火 1.4 秒后自动紧急关闭 1 级发动机。1973 年 4 月 8 日再次组织发射，导弹仅飞行 43.2 秒即在空中爆炸。同年 9 月 18 日，第一颗“长空 1 号”卫星发射试验，运载火箭飞行 154.4 秒自毁，造成整个试验失败。1974 年 7 月 12 日再次发射“长空 1 号”卫星，由于工艺质量问题，运载火箭 2 级主发动机推力下降，卫星未能入轨。11 月 5 日发射第一颗“尖兵 1 号”返回式遥感卫星，运载火箭飞行 20.3 秒在发射台上空爆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国航天事业带来的惨重恶果。

在十年动乱中，周恩来总理对航天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他在极度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基地建设和试验任务，认真听取历次试验任务的汇报。总理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那一套，针锋相对地多次强调，要安定团结，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加强管理，严谨细致地做好工作。基地广大科技人员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力排干扰，坚定地战斗在试验第一线，一心扑在试验任务上。1971 年 3 月 3 日，基地成功地发射了“实践 1 号”科学探测和技术实验卫星；9 月 10 日，又完成了第一发“东风 5 号”洲际导弹低弹道飞行试验。在执行“风暴 1 号”运载火箭发射试验任务时，由于产品质量差，故障多，大家日夜连续奋战了 118 天，排除了 189 个重大故障和隐患，才使试验获得基本成功。与此同时，第五试验部协助二炮完成了“东风 3 号”导弹的定型试验。1971 年组建的第八试验部进行了“东风 4 号”导弹的全程飞行

试验。第四试验部进行了“反击1号”反导导弹独立回路遥测弹的飞行试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成为基地历次执行试验任务的座右铭，在整个航天工业战线深入人心。

1975年，在认真落实邓小平副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之后所形成的的大好形势下，基地连续成功地发射3颗卫星。11月26日发射的“尖兵1号”返回式遥感卫星，在空中运行47圈首次回收成功，卫星返回舱顺利返回地面。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回收，使我国继美国、苏联之后成为第3个掌握航天遥感技术和返回技术的国家，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 “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

1975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撤销第20训练基地，将其所属的各试验部组成新的试验训练基地，归国防科委直接领导。新编第20试验训练基地是在原第一试验部及其直属团、站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主要承担战略、战术导弹及低轨道人造卫星的测试、发射、测量、数据处理及落区回收等任务，部队仍驻在地处戈壁的东风场区。

第20试验训练基地党委组成后，一边抓部队的精简整编和体制调整，一边抓试验任务。广大干部战士自觉服从党的需要，安心场区，安心本职，表现了崇高的思想觉悟和为我国航天事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1976年7月27

日，“长空1号”卫星及“风暴1号”运载火箭运抵场区进行发射试验，基地全体参试人员全力以赴，加倍努力，严谨测试操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射前各项工作程序。8月30日火箭点火，飞行正常，卫星入轨。接着“长空1号”卫星再次进场进行发射试验，因这批产品生于乱世，工艺质量较差，运载火箭2级游动发动机推力偏低，造成试验失败。12月7日12时38分，“长征2号”运载火箭托载着“尖兵1号”卫星，点火发射，星、箭各系统工作正常。12月10日，测控部队在四川盆地顺利回收了卫星返回舱。

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为了迅速消除“文化大革命”对部队建设造成的恶果，基地党委组织部队深入开展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揭发批判，认真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拨乱反正。广大科技人员长期受到压抑的献身精神又重新焕发出来，大家决心把十年动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基地领导因势利导，加强专业技术训练，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岗位练兵，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有设备进行调整布局和技术改造，开展技术革新，改扩建相配套的试验设施。通过几次“风暴1号”运载火箭和“东风5号”导弹低弹道飞行试验任务的考验，增强了部队的试验能力。1978年1月26日，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尖兵1号”卫星。29日卫星携带着试验和探测资料安全返回地面。至此，我国已完全掌握了这种卫星的发射、测控与回收技术，结束了返回式卫星的试验阶段，开始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

根据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原则，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利用“风暴1号”改装的“新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实践2号”、“实践2号甲”、“实践2号乙”3颗实验卫星，再次进行空间物理探测和技术试验。1979年6月13日，星、箭运抵发射场进行射前检测。7月28日5时28分，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由于火箭2级游动发动机涡轮泵故障，造成箭体姿态失稳，起飞了19.9秒在空中自毁，发射失败。在这次任务中，基地完成了外测和遥测数据处理报告，为研制部门进行故障分析提供了试验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促进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决定从1979年上半年起东风场区有限度地对外开放，称为“酒泉卫星发射场”（以后改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79年5月24日，基地首次接待了以安东尼A·凯里奥博士为首的美国空间技术代表团。接着，国防科委组成以基地司令员徐明为团长的“中国航天技术考察团”赴日考察访问，参观了日本的卫星发射场、测控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究所等。从此，酒泉卫星发射场这块神秘的土地受到了全世界关注，基地也陆续接待了许多外国参观团，为促进靶场建设和我国空间技术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出现的新形势，为尖端技术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77年9月，国防科委制订了战略火箭和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规划，确定80年代的

主要任务是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发射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从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党中央批准这个规划后，国防科委决定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从东风发射场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试验代号为“580”任务。

根据国防科委的统一部署，基地于1979年底作好了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1980年1月，邓小平在国防科委《关于上半年进行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请示》上批复：“拟同意，如准备来得及，以5月试为好”。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圈阅。因为这次试验是我国首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而且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所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国防科委派马捷副主任为驻试验首区的代表，七机部副部长任新民为副代表。

这次试验任务，共准备了4发“东风5号”遥测弹，技术阵地必须并行、连续测试3发弹体、4个弹头、6套平台、8套单元仪器；发射阵地两个发射工位要同时展开，两套队伍同时上阵。从3月25日技术阵地对6套平台展开测试后，基地从上到下，从干部到战士，从职工到家属，形成了一种一切为试验着想，一切为试验服务的浓厚气氛。基地和七机部试验队的各级领导、总师一直在试验现场与参试人员共同加班加点，现场指挥决策，解决各种问题。广大参试人员牢记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严守规程，精心操作，仔细观察每个测试现象，综合分析每个试验数据，排除大量故障。

经过 50 多天的昼夜奋战，运载火箭各系统、各单元仪器的技术指标都达到了最佳状态。

5 月 2 日，兼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副总长，李耀文政委，陈彬、钱学森、朱光亚副主任，七机部郑天翔部长等领导同志到基地检查首区临射前的各项工作，基地借此召开了“580”任务动员大会，部队士气高昂，斗志旺盛。5 月 18 日 10 时 0 分 23 秒，第一发远程火箭点火升空，陆上和海上各个测量台站跟踪良好，火箭各系统工作正常。弹头在预定海域准确入海，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5 月 21 日，第二发远程火箭点火发射，由于 2 级发动机实际关机时间比理论关机时间提前 6.4 秒，致使弹头未打到预定海域。但运载火箭飞行中，测量系统取得了弹上仪器工作状况和分析故障所需要的各种数据。

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的公报后，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这次成功的发射，标志着中国在完善制导系统和增大发射距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影响。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我国远程运载火箭的试验成功，表明中国人民在掌握现代化精密技术的道路上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表明我国的国防实力有了新的提高和加强。

## 新时期航天技术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航天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地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从严治军，大力恢复和发扬基地组建初期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步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试验上来。在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诬蔑，评定了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和健全了科研试验管理体制和各种规章制度，重新制定了试验条例，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通过一系列恢复性的整顿，使基地以试验为中心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的轨道。

“580”任务中，张爱萍主任在基地视察时就明确指出：20基地要树立长治久安的思想，要有一套长治久安的办法，全面规划，综合治理。1981年陈彬主任再次到基地检查工作时又郑重强调：20基地不能动荡，要长治久安，搞好既适应试验又方便生活的城镇化建设。1983年9月，杨尚昆副主席、杨得志总长到基地视察时指出：要巩固20基

地，20 基地要在建设大西北中作出贡献。为此，基地党委不等不靠，大胆改革，开拓创新，一方面对部队反复进行长治久安的教育，引导大家牢固树立长远建设基地的思想，把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无私奉献这个传家宝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努力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综合治理。从 1981 年起，基地组织部队改建、扩建了部队营房，淘汰了“干打垒”，改善了办公、住宿条件，基本解决了边远点号取暖、用电、洗澡等问题；动员首区所属部队整修道路，治理环境，把东风场区建成了一座新型的航天城；同自然抗衡，与大地搏斗，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扭转了基地的副食品长期靠调运的状况，部队长年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大规模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果木，种植花草，绿化戈壁，使场区成为人烟罕至的大漠上的一片绿洲，先后 3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军绿化工作先进单位”。由于场区地处戈壁，缺乏社会生活依托，基地干部和职工家属安置、子女上学、青年就业以及老有所归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市的大力支持下，基地逐渐疏通了场区征兵、招工、教育、公安、交通、物资供应、离退休职工管理的业务渠道，设立了相应的社会性机构。同时，基地还创办了农工商联合服务公司，进一步拓宽了就业门路。所有这些，对于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改善场区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稳定部队，保障试验，促进基地的全面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地的科技干部队伍，大部分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毕业生。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已步入中年，为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青春，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年动乱期间，大学生又没有来源，使基地科技队伍后继乏人，出现断层。到了80年代，随着新一代大、中专毕业生的到来，科技干部队伍又面临着新老交替的问题。为了尽快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技术业务素质，基地在加强对青年技术干部思想教育的同时，大胆使用，精心培养，通过课题论证、科研革新、设备改造、学术交流、岗位练兵、综合演练、下厂学习等措施，加快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步伐，使基地的试验技术由过去只是“吃老本”到逐步实现了更新提高。尽管现在场区条件好了，没有老一代住帐篷、吃沙枣那样艰苦，但同样需要无私奉献的精神。新一代广大科技人员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已经接过了开辟航天事业第一代人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我国航天事业试验技术的中坚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满足“尖兵”卫星和运载工具各系统对测试发射的要求，基地按照“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调整布局，挖潜改造，完善提高”的方针，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组织广大科技人员自己动手对靶场各系统的试验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加强总体技术研究，调整设备布局，使发射场在总体技术、测试发射、指挥控制、测量与数据处理、技术勤务等方面，逐步实现了自动化、网络化、科学化。李凤洲等同志改造翻

新的 320 计算机，运算速度比原机提高 7 万次，稳定性由 10 几小时提高到 500 小时，还甩掉了两台 717 计算机。发射团胡世祥带领所属技术人员研制的靶场电子化自动指挥系统，优于日本种子岛大崎控制室指挥系统，比法国圭亚纳空间中心的指挥系统略有提高，与美国航天飞机发射基地的发射程序控制系统相近，极大地增强了发射场的试验能力。基地科研人员和干部、战士以改革创新精神，硬是闯出了一条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路子。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航天事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1981 年 9 月 20 日，基地成功地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实践 2 号”、“实践 2 号甲”、“实践 2 号乙” 3 颗卫星，使我国继苏联、美国和欧洲空间局之后，成为第四个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1985 年 10 月 21 日，基地又成功地发射了返回式国土资源普查卫星，所获得的照片已用于国土普查、地质调查、石油勘探、地图测绘、水源利用、农林开发、地震预报、环境监测等方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 年 8 月 5 日，基地发射的“尖兵 1 号”返回式卫星，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搭载了 2 件微重力实验装置；1988 年 8 月 5 日发射的“尖兵 1 号甲”摄影测绘定位卫星，为联邦德国 3 家公司搭载了 5 件 30 公斤重的微重力实验装置，为我国的航天技术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到 1990 年，基地创造了连续 12 次成功地发射、回收

返回式卫星的好成绩，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60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叫三个大国之一，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90年代，在党的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的航天事业正以跃进的步伐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逯守标整理)

72

## 所谓整理江青“黑材料”的始末

陈虹

“文革”期间，“杨、余、傅事件”发生时，林彪于1968年3月24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宣布杨成武的所谓“罪状”时说：“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林彪这句话才讲了一半，江青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打断林彪的讲话，对着话筒大声说：“还要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

林彪顿时大吃一惊，思路被打乱，不知说什么好，于是顺着江青说的话，随意编造说：“噢，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林彪讲的所谓搞江青的“黑材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至今已经过去了25个年头，要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还得从十年动乱时期讲起。

## (一)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那时，总参首长有一些临时任务，也常常交给我们去执行。

1967年4月12日深夜，忙碌了一整天，我正准备休息，床头柜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拿起耳机一听，就听出是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的声音：“陈虹同志吗？首长要你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放下电话，我坐车直奔京西宾馆。深夜的北京街道，沉静，车少人稀，一出复兴门大街，司机加速行驶，10多分钟就到了京西宾馆。

在宾馆等我的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他对我说：“陈副部长，你先休息一下，杨代总长在开会，会一完就来。”这时屋里已有一个同志在那里坐着，那就是后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王成恩同志。他虽然也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位副科长，但我们从未见过面。随后，又来了两位穿空军服装的干部，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的，当时我一无所知。

我们4个人坐等了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江青一进门，手里拿着一个小纸条，按照纸条上早已写好的名字，挨个地叫着：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叫到谁，谁就按军人的礼节回答“到”，并站了起来。当她点过名，确认该来的人都来了，就摆出一个领导的架势，威严地对我们说：“现在我宣布，由

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收到一个名叫王徵民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

江青叫我们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查找，并说已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去上海。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向上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去上海取材料的介绍信，江青早已写好了，由戚本禹拿着。信里写的什么内容，我们没有看见，因为信已封上了。戚本禹将信当面交给我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徵民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又交给我一个便条，是张春桥写给他的秘书何秀文的。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叶群马上插了一句：“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我们说，出差连牙刷、牙膏，简单的洗漱用具都没有带。叶群命令似地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说完，她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她们到门口，回来又对我交代：“你们到上海后，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用电话和我联系，不便时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任务，我们4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由

空军三十四师著名女飞行员王云驾驶的伊尔 14 专机，已做好了起飞准备。我们一登机，飞机就发动起飞了。这时我看了看手表，已是 13 日凌晨两点了。

这次出差与以往的外出执行任务不同，任务来得突然、神秘，人员互不相识，情况又不了解，能否完成，心中没有把握。对于到上海如何开展工作，小组人员在座舱中议论了一番。

飞机在空中经过 3 个半小时的飞行，安全降落在虹桥机场。下飞机时，在那里接我们的是驻上海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他将我们安排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住宿。

吃过早饭，我请翟处长先把何秀文找来。何秘书见到我给他的介绍信就说：“这信封是本禹同志亲自写的！”他看信时，我看到信的落款是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何秀文看完信说：“这要把警备区的副政委李彬山请来，因为政法系统由他管。”何秘书和李副政委是很熟的，通个电话，李很快就来了。李彬山是位老红军，办事认真负责。听完我们介绍来上海的任务后，他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大部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我们去仓库与负责保管材料的同志联系。

弹药库远离市区，我们坐车走了 1 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四面有电网，警戒严密的军火库区。李彬山首先把我们向公安局负责管理材料的朱品涛作了介绍，然后我们又说明了来意。朱同志说：“这里存放有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现在监守看管的就我一个人，其

他的同志都不在。”然而他还是很负责地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为我们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我们正在查找材料的时候，老朱扶着一个箱子对我说，这是市公安局领导交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我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日中午，我回到巨鹿路招待所，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北京杨成武打了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我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当晚，我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问题，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它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我们接到杨成武传达周恩来、江青的指示后，随即去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这一箱材料带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们还高兴地说：“这一箱材料，是意外的收获”。因为来时没有这个任务。

17日早晨到北京后，材料原封未动地存在我们办公室，20日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那时杨成武在总参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我们的办公室设在京西宾馆12楼。我和王育民按时到了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室。杨成武对我们说：“找你们



来，谈一件事，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提出一个报告。”

我们二人回到办公室，找了一间房子，关起门来，将箱子搬来，打开一看，原来是1954年一个人写的由上海寄往杭州交际处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侦察破案的材料。所谓一箱，并非像江青后来夸大说的“一大箱黑材料”，而是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共计23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

一、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证明是华东文委机关的办公用品。信的第一页内容，主要是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似有恐吓性质。至于始何堕落的，有什么事实，也许在其它页上，但第一页上没有写。

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经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

三、侦情简报。案子自1954年发生立案侦察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及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报告。侦察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

看，案子从 1954 年至 1962 年，已侦察了 8 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对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则列为侦查对象，进而重点侦查。他们曾找到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即予以否定。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人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就被列为侦查对象；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因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而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侦查时间最长，吃苦也最多的，要数曾任上海市文化局长赖少奇的妻子曾菲同志。因为曾菲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笔迹很相似，其次是侦破小组展开调查后，了解到曾菲对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她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特别对 1952 年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也觉得不尽合适。而赖少奇又在上海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等。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后，认定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确定对她长期进行侦查，甚至把对敌侦查的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

后来赖少奇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也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察并没有放松，仍象在上海时一样，坚持进行着，由此而形成的曾菲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

五、江青的卷宗。关于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侦破小组为了破案，曾搜集江青的必要的历史资料，卷宗上写着“若干历史材料”6个字。所谓历史材料，仅两种：一种是文字的，另一种是照片。文字共3篇。一篇是江青（即当年的蓝萍）30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破案人员是从那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这封信现在已有好些书刊不止一次地公开转载了，我不再转述。因为人们已经清楚，那是江青自己写下的一段丑闻。尽管她多次声称：“我的一封公开信，是抗日的……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但终究改变不了历史事实。另外两篇均为剪报，一篇是江青到延安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并和毛泽东结了婚，上海一种小报发的一篇报道；还有一篇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照片共两帧：一帧系江青扮演电影《王老五》里王老五的妻子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中间坐着主婚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

我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之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详情搞不清楚，因为此事过去是公安系统管的。因此，我们写了一个建议，由公安部组织专人负责处理的报告。

报告送上去，江青看后大为不满。她跑到林彪那里去闹，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听了，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的指示，随后传给杨成武去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我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去。杨说：“报告送上去，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也自杀身亡，材料保存没有必要了。她要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说完还特意用征询的口气问道：“你们看怎样？”我们说：“既然案子已经破了，材料保存也没有用了；而且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不搞侦查，收集那么多党内同志的笔迹，传出去也不利团结，毁了也好。只是这个报告怎么写呢？”杨成武想了想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作的记录，在文字上作些整理即可。7月7日，将我和王育民署名写的报告上报中央。林彪看过报告后，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4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

周总理阅后，除了同意林彪的批示外，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傅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毛主席看后，虽然没有在报告上面留下他的笔迹，但却说过：“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这个报告和批示传下来后，正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没有在京。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均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这个销毁材料的事就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说：“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

实情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并请示如何处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

王育民将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对材料进行了核实，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谢富治由于动手点了火，自以为与别人不一样，说了一句得意的话：“谁说我不亲自动手啊！”烧完后，3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9月27日下午。这个报告和批示的原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处。

由此可见，林彪说杨成武“整了江青的黑材料”，完全是肆意歪曲事实。因为这个小组当初去上海取档案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任务，是江青自己布置的。到上海在工作中碰上了那箱“通天”材料，我们只是按照江青的指示（“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向上报告”），及时向北京请示的。杨成武得知后马上报告了周总理和江青，是周总理、江青要我们拿回来的。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当时她并不认为取回这一箱材料就是杨成武和专案组的同志整了她的黑材料，立了她的黑专案，但后来她却无视事实反咬一口。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省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过去整过我的材料，这一次才发现。”她说：“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时说，其中有一箱材料是我的。我说拿来嘛，拿来以后我也没有过问。”江青是故意隐瞒真情，借以蛊惑人心。但是，她尽管说谎，可毕竟不

得不承认这箱材料是她叫拿回来的，并不是我们去收集整理，更不是杨成武要拿回来的。到196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江青这篇讲话时，她又说什么“你们看，一大箱黑材料，谁晓得是些什么东西”，绝口不提对这一箱所谓“通天”材料处理的前前后后，完全是根据她的指示办理的这一事实，反而无中生有说别人整她的黑材料。

## (二)

江青除诬称整她的“黑材料”之外，还指责我们“提审杨帆搞黑调查”，搞她的黑专案。这一事实真象又是怎样的呢？

196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杨成武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他交给我一个纸条，上写“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杨帆，搞清他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并对我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杨成武布置任务时，吴法宪也在场。关于杨帆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是怎么回事，要弄清什么问题，布置得不清楚，我便向杨成武提了些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给了这个任务，我负责办理就是了。

接受任务后，第二天我和王育民、王成恩去秦城监狱，提审杨帆。由我和王育民问话，王成恩负责记录。

警卫战士将杨帆带到审讯室。我们开始审问。我首先说：“杨帆，你把向中央发电报的事交代一下。”杨帆过去

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上海解放后，是第一任的公安局长。他对于审讯这一套，是内行，有丰富的经验，思想敏锐，回答问题很注意分寸。他听了我问的问题，定了定神，然后回答说：“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王育民说：“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王育民故意把问话的范围拉得大些，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经过并不清楚，心里没有底。杨帆说：“如果你们问的是指1938年的事，那么我1954年被关起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我。”我们就要求他把1938年向中央发报的事交代清楚。

杨帆说：“1938年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他跳下马来边走边问我有关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我来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江青的前夫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一个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江青那时叫蓝萍，在我们协会下边一个‘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自已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回答。”

杨帆是个聪明人，想了想，心里自然清楚，他过去讲的上面的那些话，尽管是历史事实，其份量与他现在身陷囹圄的处境，该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因此他说：“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杨帆还承认讲的那些话，是提供了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炮弹”。杨帆非常细心，

交代问题时没有敢提江青的名字，我们按他的讲述作了记录。这份审讯记录抄清经杨帆看后，他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我们将记录先报送杨成武，他看后批给吴法宪，转送了江青。

江青看到杨帆的文字交代，很是得意。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休息室，找我们汇报工作时，江青亲口对我说：“你们送来杨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杨帆在上海时的笔名），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但事后我们再也没有去审杨帆。当时我们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杨帆已经交代清楚了。

“杨、余、傅事件”发生两个星期后，我于4月12日离开了专案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1968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二办”专案组给我打电话，说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通知让我立即去京西宾馆。当时，我想，离开“二办”已两个多月了，走时移交手续办的清清楚楚，已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了，突然要我去干什么呢？一路上心里很不安，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事。

当我走进宾馆六楼会议室一看，邱会作、王育民和接替我在“二办”工作的北京军区炮兵师政委齐路安，已在那里坐着。见面时，谁也不说什么，互相间好像不认识似的，气氛显得相当紧张。等得时间不长。吴法宪从另一个会议室走进来，坐下就是胡乱批评一通：你们提审杨帆压根儿就不应该作文字记录，后又指着我说：“现在你们把这



个口供整理成材料，放在那里，一旦被人看了，扩散出去，这个后果你要负责！”并宣布立即烧毁。随后由邱会作点火，将杨帆这份口供记录焚烧。

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有编号、登记，随便缺少一份，事后移交时，无法交代。因此要求我们留下一个字据。王育民当即用一张白纸，写了饶案××号口供记录，经军委办事组决定销毁。监销人邱会作，执行人王育民、齐路安，见证人陈虹。下边是年月日。这份简单的字据，吴法宪是代表军委办事组来宣布决定的，不属于监督者，没有在上面签字，我们都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我起身回家，在车上总是想着，事情是你们叫办的，为什么都成了我的错误呢？

所谓搞“通天”材料，审杨帆，这两件事都是江青要我们去办的。“杨、余、傅事件”发生时，江青却反咬一口，大做文章。她首先发难，在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从这以后，所谓整江青的“黑材料”，立她的“黑专案”，就成为我们的重大“罪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1968年初，江青亲自出马，编造谎言，对我们进行诬陷。那时潘汉年在狱中写了一份“认罪书”，我们报给江青，她看后签了字。2月潘汉年又写了“认罪书”之二。江青看后，就在这份“认罪书”的标题旁边写上：“为什么不将认罪书之一送给我看？”并多次叫嚷说饶案是她亲自抓的，但是现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给我们扣上了对她“封锁”的

罪名。

在1968年4月20日中央专案“二办”全体人员大会上，江青又当众点我的名，大声问道：“陈虹来了没有？”下面有人说，他已经回原单位了，江青凶相毕露地说：“回去了也跑不了，我已叫人对他进行审查了！”不久，就给我扣上“不是好人”的罪名。

1968年12月14日，他们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罪恶活动”为借口，宣布将我逮捕，送进监牢，一蹲就是6年零5个月之久。

那时抓人，总是先定性，然后编造材料，罗织罪名，逼你承认。若是坚持真理，就采取法西斯方式，训斥、体罚、打骂，大搞逼供信。他们诬害我不仅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而且还说被杨成武派去广州搞阴谋，要把黄永胜打倒。此计不成，又生一计，说关锋插手广州，也是由我去搞的。妄图把我们打成“王关戚”一伙。由于我对关锋从来不认识，也没有单独和他说过一句话，我据理驳斥了他们的种种谎言。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借机制造谣言，说黄永胜包庇了“坏人”陈虹，并将这莫须有的罪名，搞成材料，在总参散发供大家批判。然而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批准抓我的，就是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黄永胜和吴法宪，哪有这样的包庇呢！

江青在整我的过程中，同时整杨成武。1970年1月24日，江青对负责审查杨成武的专案人员说：“我同杨成武斗

了几次，杨成武与戚本禹勾结起来搞黑材料。杨成武假借搞饶漱石的专案，立了我的专案”。这纯属歪曲事实。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好再攻击杨成武“反对林副主席”了，她腔调一变，又诬陷杨成武“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集体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利用这一时机，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杨帆搞黑调查。”江青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简直把自己吹上了天。

周总理听江青这么一说，很生气，当即严厉地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杨帆还是在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江青又问王育民：“杨成武是怎么布置你们整我黑材料的？”王育民在周总理面前，只能如实地将杨成武传达江青的指示，审问杨帆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具体情况作了汇报。江青一听王育民揭她的底，立即矢口否认。以后，她狠整了王育民，撤销了他“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令他交代问题，回空军劳

动改造。还指示空军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最后硬是让他转业。“四人帮”垮台后，王育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回到了军队，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到了1974年，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业已开过，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不少被审查的老同志已得到了解脱。这时，毛泽东对林彪过去所揭发的那些人的问题，已有新的看法。毛主席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

但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仍然揪住不放。1974年2月7日，中央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时，江青说：“报告的第2页对我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这实际上是借故将杨成武的事继续拖着。幸亏周恩来总理主持公道，说：“我认为杨成武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他自己可以写出材料。”不久，专案组将整理的杨成武的材料上报政治局讨论，决定予以平反。这样，江青的诡计终于没有得到实行，杨成武也于1974年5月23日恢复了自由。

历史是无情的，尽管江青他们能得逞于一时，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四人帮”终于被人民推翻，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 中共中央洛川会议

王 秀 鑫

## 一、洛川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 7 月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已经走过 16 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这期间，取得了两次胜利，也经受了 1927 年和 1934 年两次严重失败的考验。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在主观上则是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它脱离中国国情的许多原则指示常常是错误的，也给中国革命造成种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做过许多探索，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1935 年 1 月在党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新的中央领导的确立，不仅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当时的危难之中

解脱出来，也为其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日本侵略者准备独占全中国的新形势，于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即着手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作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于1936年上半年停止了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敌对行动。接着，正式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平处理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基本结束反共内战。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促使会议通过实际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决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接着，中共派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中共代表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协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7月17日，周恩来、

秦邦宪、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江西庐山举行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

这时，蒋介石对抗日还很动摇，他虽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又声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蒋介石政府仍在和日本侵略者继续谈判，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尽力拖延，迟迟不予公布。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中，蒋介石集团千方百计要限制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并计划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 2/5。

要抗战，就得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共产党仅仅掌握着陕甘宁根据地的政权。但是，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因而实行只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他们宣扬“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改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限制群众抗日运动，甚至解散抗日团体。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军队不断后撤的败局。在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五个步兵师、二十一个独立步兵旅和骑

兵炮兵等部队共70余万人，却抵挡不住日军十二个半师团约30万人的进攻。1937年7月底，相继丢弃了北平、天津。随之，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在华中地区，日军进攻上海后，日本侵略者企图以3个月时间击败国民党中央军，速战速决地解决中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一方面，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身上；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军队后撤，又极其不满，担心抗战难于取得胜利。

## 二、洛川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方针

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必须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指导全国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任务紧迫，许多红军干部在前线，来不及返回延安，因而会议是在陕西洛川县城附近的冯家村（红军总部所在地）举行的。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亦称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



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共 23 人。

首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以及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深刻地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强调指出：单纯从共产党和红军的数量，不能解释领导权问题。但从共产党的声威和红军作战能力，全国人民的瞩望来看，共产党必须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中日双方都有其弱点和长处，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的胜利。（2）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原则，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条件，即我方技术贫弱，但在其他方面，如军队素质等方面，敌人弱于我们来考虑。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箝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以挫败日寇亡华方针。（3）红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所谓游击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作战着重于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主力兵团与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山地游击战要达到创立根据地。红军在抗战初期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晋察冀三省边界山区。（4）必须扩大中共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的任务是：领导主力红军，领导苏区与游击区军事和义勇军工作；与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情报工作。过去只注意红军工作，现在义勇军和国民党军队

的工作，也是大事，因此军委组织应健全起来。现在只有参谋部，政治部与统一战线部也要建立起来。战略方针的制定，要集中在军委。(5) 后方是基本立足点，必须巩固。后方主要是陕甘两省。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发展陕甘苏区。(6) 扩大红军并加强军事教育。为着扩大红军，可以成立补充团，每师一个，军部设两个补充旅。军事教育，连长以下，由前方负责；连长以上，由后方负责。

毛泽东的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共产党必须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周恩来、博古等已和国民党谈判了4次，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的独立性问题。在共同委员会与总指挥部问题上，我们准备有所让步，采取不决裂的方针，以通过政治纲领为原则，现在要催促国民党发宣言。同时，还要作地方军阀的统一战线工作。山西有进步，桂李（即李宗仁）已公开提出联共，同意催促蒋介石抗日。现在推动抗日的工作即将过去，而是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战的胜利。(2) 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阶级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应提醒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从根本的阶级利益上看，国民党是敌人，对国民党应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国民党的方针，一是限制我们，二是破坏我们。因此，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这种独立性包括政治上和组织上两个方面。1927年春夏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教训，必须吸取。(3) 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

的绝对领导。限制红军，对红军派参谋长来，是万万不可能的。红军的调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决定，红军开赴前线作战，必须根据战局的发展，选择有利时机，分批进行，并须留一定兵力，担负保卫后方的任务。

接着，出席会议的人员围绕毛泽东的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博古、关向应、张浩、张闻天等。他们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提出的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认为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且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红军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持久抗战，去争取胜利。

朱德说：争取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从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布置，才能争取。持久战，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发动游击战争。争取华北持久战，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林伯渠说：红军在抗战中，负民族复兴的责任。军委组织很重要，红军的人员要补充，应有补充团。

任弼时说：最近中央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代表不同阶级，且在斗争着，合作要经过斗争的过程。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要保持我们的力量，队

伍的补充是很大的工作。

彭德怀说：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才能抗击日军。陕甘宁三省的工作非常重要，要成为将来转变的核心。要阻止日本前进，基本条件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因此，应用一切可能实现十大纲领。

刘伯承说：抗日战争是持久、困难、曲折的，保存力量是自然的事，但最中心是扩大力量。号召全民族抗战，就是争取领导。

周恩来说：国民党对抗战的战略方针，总的是怕群众起来。我们的作战地区是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加强全国组织群众工作，做到国民党的战略方针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我们能在华北进行持久战，群众的积极性可能更大地调动起来，我们的部队能壮大起来，敌人就愈增困难。今日我们要加强三方面工作：（1）加强政治警觉性，取得合法地位；（2）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3）上层统一战线的开展。

聂荣臻说：同日本作战，应时时顾到我们不要吃亏，因此战略上采取小区——游击战。小的游击队要繁殖，在敌人后方发展，还是依靠当地。

张闻天说：抗日战争中的危险性，主要是国民党限于政府抗战，而压抑人民，控制群众运动。我们的总方针是发展全民族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如何使抗战得胜，大家都仰望我们，指出胜利的道路，是争取领导权的基础。抗

战是持久战，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指挥问题是独立自主的方针，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正确的领导，模范的工作，谦逊的态度，艰苦的作风，准备打持久战，是我们争取领导的要害。

毛泽东在8月24日的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主要内容是：(1) 关于形势，现在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半年左右）；另一可能是相当迅速起变化。红军的使用，应根据此两种情况。如第一种情况，红军则为策应任务；如第二种可能，我们准备着迅速起变化，山西河北之间是我们主力之地。(2) 关于红军出发问题，无根本不同意见，只有搁到前方去一种意见，无原则分歧。(3) 关于战略原则，目前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游击支队，起箝制作用，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我们要把抗日战争变成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4) 关于苏区和白区，苏区要巩固，扩大白区工作。(5) 关于前方和后方，要双方顾及。(6) 关于经费问题，要在全中国号召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还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会议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实行党的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意义。所谓全面抗战路线，即主张全国人民和军队总动员，改革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

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所谓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是说中国人民的抗战，必须经过一个转变敌强我弱的过程，才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贯彻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以下几个具体决定：（1）决定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党领导抗战的纲领。（2）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3）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4）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

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5) 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共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书记。军委的书记、副书记，实际上是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制定了指导全国抗战的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作出了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人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共产党成功地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洛川会议期间，在蒋介石打电报要八路军迅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会议在讨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机、陕甘宁边区是否要留兵、红军出兵后的作战原则等三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

(一) 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机问题上，一部分同志主张晚出兵，认为红军的出动，必须在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解决行政经费武器补给和共产党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条件下；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晚出兵不如早出兵，认为形势紧迫，战局严重，早出兵对我

党政治上将有好的影响，对我军军饷武器弹药的补给有好处。

(二)在陕甘宁边区是否留兵问题上，一部分同志认为，鉴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鉴于国民党尚有 10 个师的兵力在边区周围，必须留一部分部队保卫党中央，主张红军出动 1/3、1/2 或 2/3；另一部分同志出战心切，主张全部出动兵力上前线。

(三)在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上，一部分同志认为，红军出动后主要是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另一部分同志主张部队开出后，实行“运动游击战”，集中打几个大仗，以振奋军民斗志。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要出兵又要留兵和边出兵边争取条件的一致意见。由于形势紧迫，对究竟留多少兵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及红军的作战原则，未能深入讨论统一认识。以上 3 个问题的讨论，是对具体行动方针问题的交换意见，是正常的讨论和争论，不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有的同志对从国内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的转变，一时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来，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从 9 月 12 日起，按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



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全军编制 4.5 万人。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1937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 9 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在前方军委分会领导下，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事、政治、党的工作。第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周昆、萧华组成，林彪为书记；第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为书记；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为书记。接着，八路军总指挥部率各师，先后出师山西前线抗日。八路军主力东进后，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于 1939 年 9 月以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洛川会议以后，为了更好地贯彻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9 月 12 日至 29 日，连续地给朱德、彭德怀等发出了 5 个电报。主要内容是：（1）强调红军坚持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2) 阐明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和有执行国民政府战略计划之自由；红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3) 指出红军出师后的具体任务是处于敌之侧翼，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并对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第一二〇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第一二九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规定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的锐气并掩护友军的退却；另一方面，伺机深入敌人占领区，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八路军出师后，主要是从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于是，国共两党首先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周恩来说：“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进行了对日军的伏击战，一举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



2 022 6766 1

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平型关伏击战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国民党进行忻口战役。忻口战役历时 20 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1937 年 11 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八路军着重执行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虽然敌后抗战，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事业，不仅要向日占区夺回已沦陷的国土，在日军的包围中建设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首先建立在穷乡僻壤，物质条件的恶劣是罕见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打开了局面，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实践证明，洛川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三辑

作者 =

页数 = 2 5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